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

月刊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 Work

2023年第2期(总第224期)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叶 菁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孙建军 仲建忠 刘晓清 汪东波 陈 红

吴建中 李国新 柯 平 胡海荣 徐益波

章云兰 鲁东明 程焕文 褚树青

主 编 褚树青

副 主 编 赵继海 屠淑敏 郑秀花

编 辑 部

编 辑 李 芳 王晓琳 孙晓清

编 务 徐越人

英文编译 鞠 婧

刊名题字 沙孟海

封面设计 黄海晶

主管单位 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

主办单位 浙江图书馆

协办单位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

编辑出版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编辑部

地 址 杭州市曙光路73号

邮 编 310007

电 话 (0571) 87988086

在线投稿 <http://bjb.zjlib.cn>

编读往来 lsrw@zjlib.cn

刊 号 ISSN2096-2363
CN33-1398/G2

定 价 22元

印 刷 杭州长命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23-2-10

图书馆研究

(月刊)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 Work

目录 2023年第2期(总第224期)

■ 学术论坛	
《马拉喀什条约》跨境交换义务对我国阅读障碍者文化服务机构的挑战及对策分析	张倩 杨阳 5
《个人信息保护法》视野下的我国图书馆读者个人信息保护	
——法理思考及实现路径	东方 10
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用户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	倪伟宸 16
■ 探索与创新	
设计思维在新型公共图书馆建设中的应用研究	
——以东莞图书馆为例	王金丽 25
基于4C营销模型的公共图书馆古籍文创产品推广研究	冯耕 32
“双减”政策背景下公共图书馆协同育人实践与探索	廖晓飞 38
■ 工作研究	
标记本图书的著录及应用探索	
——以复旦大学图书馆捐赠图书为例	蔡闻桐 赵睿杰 苗青 43
中文图书情报学期刊受论文中介及假冒期刊网站干扰状况探究	
	段玮弘 马爱芳 50

同行评议期刊

A Peer Reviewed Journal

文化资本视域下的公共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策略研究 田 利 56

■ 异域采风 -----

英国志愿者组织运营管理社区图书馆的实践及启示* 朱 敏 傅文奇 61

国际图联报告《图画书中的世界》解读与启示 舒 睿 68

■ 阅读文化 -----

文化传承背景下红色文化资源VR阅读推广研究 范新美 72

公共图书馆红色文化传承的实践与思考

——以“东海小小图书馆”红色阅读空间为例

岑 映 方 芳 柴 玥 孔 奕 77

元宇宙+阅读: 图书馆数字阅读空间发展的新样态 田一斐 82

■ 文献学研究 -----

《酒小史》非宋人著作* 邱志诚 87

鲍廷博迁居桐乡新证 夏春锦 沈思佳 93

本刊载文已被中国知网系列数据库、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超星学术期刊“域出版”平台、博看网、龙源网期刊收录, 凡作者向本刊投稿并同意发表论文, 均视为作者将该文著作权授予本刊, 其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不再另行支付。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 请在来稿时向本刊声明。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 WORK

CONTENTS

No.2 2023 (Serial No.224) Monthly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Challenges of Cross-Border Exchanges Facilitated by the <i>Marrakesh Treaty</i> to Cultural Service Organizations for the Print-Disabled in China and Relevant Strategies	Zhang Qian Yang Yang	5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of Library Reader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i> : Legal Thinking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Dong Fang	10
A Study 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User Satisfaction of Health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Public Libraries	Ni Weichen	16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Design Think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Type Public Libraries: Taking Dongguan Library as an Example	Wang Jinli	25
Research on the Promotio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of Ancient Books in Public Libraries Based on the 4C Marketing Model	Feng Geng	32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in Public Librar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Liao Xiaofei	38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Describing Books with Marks: A Case Study of Fudan University Library Donation Collections	Cai Wentong Zhao Ruijie Miao Qing	43
On the Disturbance of Paper Intermediary and Fake Journal Websites to Chines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Journals	Duan Weihong Ma Aifang	50
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Public Libra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apital	Tian Li	56
Practice and Enlightenment of British Volunteer Organizations in Operating and Managing Community Libraries	Zhu Min Fu Wenqi	61
Interpreta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IFLA's Professional Report <i>The World Through Picture Books</i>	Shu Rui	68
Research on VR Reading Promotion of Red Culture Resources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Fan Xinmei	72
Practice and Thoughts on the Transmission of Red Culture in Public Libraries: Taking Donghai Little Library as an Example	Cen Ying Fang Fang Chai Yue Kong Yi	77
Metaverse + Reading: A New Mode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Reading Spaces in Libraries	Tian Yifei	82
<i>Little History of Wine</i> not Written by Song Boren	Qiu Zhicheng	87
New Evidence of Bao Tingbo Moving to Tongxiang	Xia Chunjin Shen Sijia	93

· 学术论坛 ·

《马拉喀什条约》跨境交换义务对我国阅读障碍者文化服务机构的挑战及对策分析

张倩 杨阳

(中国盲文出版社 北京 100050)

摘要:旨在为视障人士等印刷品阅读障碍者消除书荒的《马拉喀什条约》于2022年5月在我国生效。文章总结了部分《马拉喀什条约》缔约国对跨境交换义务的规定与实践、我国阅读障碍者文化服务机构履行《马拉喀什条约》跨境交换义务的工作基础,分析了我国阅读障碍者文化服务机构面临的挑战和相应的对策建议,目的是帮助阅读障碍者文化服务机构在《马拉喀什条约》实施的背景下提升服务和管理水平,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关键词: 阅读障碍者文化服务机构;《马拉喀什条约》;跨境交换;中国盲文图书馆

中图分类号: G258.81

文献标识码: A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Challenges of Cross-Border Exchanges Facilitated by the *Marrakesh Treaty* to Cultural Service Organizations for the Print-Disabled in China and Relevant Strategies

Abstract The *Marrakesh Treaty*, which aims to eliminate book shortages for people with print disabilities such as the visually impaired, entered into force in China in May 2022. The article summarizes the regulations and practices of some *Marrakesh Treaty* parties on cross-border exchange obligations, and the working basis of cultural service organizations for people with reading disabilities in China to fulfill the cross-border exchange obligations of the *Marrakesh Treaty*. At the same time, the article also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cultural service organizations for dyslexics in China an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 suggestion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help cultural service organizations for people with reading disabilities improve their services and management in the contex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rrakesh Treaty*,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s and enhancing the cultural soft power of China.

Key words cultural service organization for the print-disabled; *Marrakesh Treaty*; Cross-border exchange; China Braille Library

1 引言

书籍是人类文明的主要载体,阅读书籍是获取知识的最佳途径,也是实现个人发展的重要基础。每年,全世界有数以百万计的图书出版,但其中仅有1%~7%的出版物被制作成能够为盲人和视力障碍者获取的无障碍格式版。目前全球视障人士总数约3.14亿,他们中90%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阶层^[1],我国

目前约有1 700多万视障人士,其中盲人数量超过800万,这使得我国成为了世界上盲人最多的国家。多年来,视障人士面临着严重的书荒,限制了他们接受教育的机会、融入社会的能力以及实现个人发展的权利,降低了他们的生活幸福感,影响了社会平等,给完成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造成了阻碍。

为了消除全球书荒,保障视力障碍者和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学习文化和接受教育的权利,2013年6月27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成员国通过了《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以下简称《马拉喀什条约》),条约于2016年正式生效,是全球版权领域的首部人权条约。目前已有80余个国家和地区批准加入了该条约。该条约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负责管理,并通过其牵头建立的无障碍图书联合会(Accessible Books Consortium, ABC)与多个组织进行协作。我国于2013年签署该条约。2021年10月23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马拉喀什条约》的决定。2022年5月5日,《马拉喀什条约》对中国正式生效。

2 《马拉喀什条约》中关于无障碍格式版权的主要内容

《马拉喀什条约》规定了“受益人”^①和“作品”^②范围,明确了“无障碍格式版”^③和“被授权实体”^④的定义,要求缔约方在国家层面实施条约时履行两项主要义务,第一项义务是提供一个版权的限制与例外,以便使“受益人”和“被授权实体”能够进行必要的修改,将作品的复制件制作成无障碍格式提供给印刷品阅读障碍者。第二项义务是允许这些依据《马拉喀什条约》规定的限制与例外或依法制作的无障碍格式版“跨境交换”^[1]。根据《马拉喀什条约》第五条,一国的“被授权实体”可以向另一国的“受益人”和“被授权实体”合法地提供其依法制作的无障碍格式版作品。为了便于开展跨境交换,“被授权实体”一般应申请加入无障碍图书联合会全球图书服务(Global Book Service),并将其无障碍数字图书资源目录添加到该服务的数据库中。该在线数据库汇总了“被授权实体”上传的图书目录。在跨境交换中,每个“被授权实体”既是接收者也是传递者:既可以根据本国“受益人”的需要在全球图书服务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并请求获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无障碍数字图书,以补充其馆藏资源;也可将其无障碍数字图书资源传输给其他提出请求的“被授权实体”或“受益人”。如果跨境交换的双方均为已经批准和实施该条约的国家,交换无需征得著作权人的授权;但只要有一方未批准并实施该条约,那么无障碍图书联合会就需要在交换之前向图书的著作权人寻求授权。截止到

目前,已有109个被授权实体加入了无障碍图书联合会全球图书服务,全球图书服务数据库中有超过75万多种无障碍格式图书,8千余种盲文乐谱,涵盖了80个语种^[2]。

3 《马拉喀什条约》缔约国对跨境交换义务的规定与实践

2016年,为了庆祝《马拉喀什条约》生效,加拿大盲人协会(Canadian National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CNIB)通过无障碍图书联合会向澳大利亚视觉障碍协会(Vision Australia)传输无障碍阅读音频文本^[3]。此后,《马拉喀什条约》的各缔约国开始针对跨境交换修改国内法律,创设工作标准,建立工作流程,积极开展实践。跨境交换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牵涉大量的国际合作,需要图书情报、知识产权、信息技术、外语、编辑等多个领域专业人才的参与,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加之各缔约国的具体国情和国家利益各不相同,因此这项工作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各缔约国的工作进展参差不齐,总体而言,跨境交换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以下列举几个主要缔约国目前对跨境交换义务的规定和实践情况。

作为美国的被授权实体之一,美国国会图书馆全国盲及残疾人图书馆服务部(National Library Service for the Blind and Print Disabled, NLS)采用了双管齐下的跨境交换方式:一是使用无障碍图书联合会全球图书服务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分享无障碍格式版本图书,目前已将存储有太字节的可共享无障碍格式版本图书的驱动器发送至无障碍图书联合会;二是与加拿大公平利用图书馆访问中心等其他被授权实体直接建立合作关系,进行大规模图书交换。由于NLS的有声读物采用一种特殊格式,不完全与美国以外使用的阅读设备兼容,因此加拿大公平利用图书馆访问中心和加拿大盲人协会正在将NLS的有声读物转换为DAISY2.02格式,便于加拿大受益人在各种阅读设备上阅读^[4]。NLS不向非本机构借阅者的个人提供服务,其他国家和地区有需求的读者需要联系其所在地或本国相关机构协助获取图书。

作为日本的无障碍格式图书跨境交换主要执行机构,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也采取了与NLS相似的做法。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无障碍图书数据跨境传输

包括两种路径：“视力障碍者/被授权实体—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无障碍图书联合会—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视力障碍者/被授权实体”和“视力障碍者/授权主体—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海外被授权实体—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视力障碍者/授权主体”^[3]。

英国已有的立法对残障人士的保护水准较高。为了充分保护著作权人和出版业界的利益，英国创设了“双重标准”以限制用于跨境交换的无障碍格式作品类型和国外受益对象。适用《马拉喀什条约》规定的其他缔约国从英国引进无障碍格式作品时，受益人仅限于盲人和其他因为残疾而患有阅读障碍的人群，实施主体仅限于指定实体；而在英国国内则对所有的残障人士无歧视对待，沿用同时允许受益人和指定实体实施著作权例外的高覆盖做法。同样地，英国国内的著作权例外适用于所有作品类型，但用于跨境交换和出口的无障碍格式作品仅限于条约中列出的具体类型^[5]。

加拿大于2016年根据《马拉喀什条约》的规定修改了本国的《版权法》，允许加拿大的非营利机构将作品的无障碍格式版出口到境外的非营利机构，删除了对作品作者国籍的限制，即不再要求作品的作者必须为加拿大居民或《加拿大移民和难民保护法》所指的“永久居民”或是出口国的居民或永久居民，有力地扩展了跨境交换作品的范围。此外，加拿大《版权法修正案》新增的规定与NLS的做法类似，加拿大的非营利机构可以向其他国家的知觉障碍者提供无障碍格式图书，但个人应当通过非营利机构提交申请^[6]。

俄罗斯国立盲文图书馆是俄罗斯的被授权实体之一，该图书馆已经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主持下与无障碍图书联合会达成一项协议，计划以MP3无障碍格式向无障碍图书联合会发送部分图书的简介。但是截至目前，这些图书还不具备完全兼容的目录格式，因此尚未被列入无障碍图书联合会全球图书服务的总目录中。该机构虽然尚未开展实质性的跨境交换，但也已迈出了有益的第一步。

4 我国履行《马拉喀什条约》跨境交换义务的工作基础

《马拉喀什条约》在我国正式生效不久，具体实施细则正在制订当中。中国盲文图书馆是我国唯一

家为广大盲人群体提供公益性借阅服务的专业图书馆，将在我国实施《马拉喀什条约》的具体工作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盲文图书馆已经积累了丰富的阅读障碍文化服务经验，具备一定的履行跨境交换义务的工作基础。

目前，中国盲文图书馆为全国盲人和盲人服务组织提供到馆借阅、邮寄借阅、文献查询、教育培训、信息化产品等多种文化服务，依托在线阅读、数字图书馆、远程教育培训、盲人社区等八大服务平台，通过互联网、阅听终端等传播渠道，使全国城乡盲人能够便捷地借还盲人读物，参加远程教育培训，在线听赏文化讲座和口述影像等。

“十三五”期间，中国盲文图书馆数字图书馆资源总量已超过20T，覆盖中国图书馆分类法20个大类，114个子类，包含5 755种电子盲文，15.7万种电子图书，6万小时有声读物，5 500小时视频资源等。中国盲文图书馆在全国建设了132家分支馆，累计与208家图书馆签订分支馆协议；累计个人会员55 223人，集体会员186家。

中国盲文图书馆的实体馆藏及数字资源与我国大部分视障人士的普通需求相匹配，盲文出版物主要包含时事政治类、教材教辅类、文学经典类、社会读物类、音乐艺术类、医药保健类等；大字读物主要为义务教育教材和教辅，低视力人群就业需要的按摩、钢琴调律、心理咨询等方面的自学教材和辅导材料，法律、医学、计算机普及读物，保健养生类读物以及名家名著；有声读物则涵盖医学、心理学、音乐、文学、社会科学、计算机等领域，无障碍影视题材包括主题教育、少儿动漫、动作战争、现代都市情感、欧美经典、喜剧、古装历史等。

中国盲文图书馆通过线下、线上两种渠道传播实体馆藏和数字资源：线下面向全国盲人和盲人服务组织开展文献阅览、外借、查询、复制及专题咨询服务，为各级各地公共图书馆盲人阅览室提供免费循环借阅；线上通过听海网和中国盲文图书馆数字图书馆网站、移动应用等五类渠道传播数字资源，服务盲人等相关人员和机构。

履行《马拉喀什条约》跨境交换义务将有助于我国阅读障碍者文化服务机构提供更多优质的海外无障碍格式作品，更好地满足视障人士的阅读需求。同时，这项工作也将促进我国在阅读障碍文化服务领域

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助力中华文化“走出去”,增强我国在残疾人服务领域的文化软实力。

5 我国履行《马拉喀什条约》跨境交换义务所面临的挑战及对策建议

5.1 借鉴国际经验建立双重跨境交换渠道

如前文所述,美国和日本的被授权实体都采用了双管齐下的跨境交换方式,两种方式互为补充,有利于提高跨境交换的效率。我国的阅读障碍者文化服务机构在无障碍格式图书国际合作方面的经验比较欠缺,在实践初期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这种方案,一方面,应尽快加入无障碍图书联合会全球图书服务,将本馆的无障碍图书目录及时按照要求上传至全球图书服务数据库;另一方面,应针对我国阅读障碍者的阅读需求,与海外的重点被授权实体直接建立合作,以便大规模引进我国阅读障碍者所需的读物。也可参考国际馆际互借的做法,通过国家图书馆或地区性公共图书馆等完成无障碍格式图书的交换和域内统筹^[7]。跨境交换是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缓解印刷品阅读障碍者面临的“书荒”问题的最佳措施,我国阅读障碍者文化服务机构应当把握时机,积极与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相关机构合作,畅通跨境交换的渠道,从而提升服务的质量。

5.2 结合无障碍格式特点与阅读障碍者需求进口作品

中国盲文图书馆目前的馆藏资源虽然可以解决大部分视障人士的一般阅读需求,但相较于发达国家而言,供给总量还远远不足。随着科技进步、经济发展以及社会文明水平提高,视障人士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知识水平得到了提升,在学业和就业中面临更加多样的选择,对生活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对图书的种类、格式、语种等方面的需求变得更加个性化,但多年来,因为受到版权、资金、人员等方面的限制,我国的阅读障碍者文化服务机构为阅读障碍者提供海外出版物的能力较为有限,中国盲文图书馆的馆藏资源中外文图书占总资源数的比例较低,种类有限,无法充分满足多样化的阅读需求。笔者在调研中发现,近年来阅读障碍者对于海外图书的需求逐渐旺盛,这一点在视障学生群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他们或对外国语言和作品有浓厚兴趣,或因学业和深造的需要产生了相应的需求,需求领域包括音乐、社会

学、文学等。随着《马拉喀什条约》生效,我国阅读障碍者对海外出版物的新老需求将得到释放,相关机构应当尽快对我国视障读者对于海外无障碍格式作品的需求进行全面、深入的专项调研,为跨境交换中的图书进口工作提供现实依据。同时,考虑到不同的无障碍格式作品特点不同,阅读障碍者文化服务机构应当有重点地、分步骤地进口无障碍格式作品。例如盲文读物制作专业性强、成本高、周期长,各国使用的盲文体系不同,但盲文是盲人的专用文字,尤其适合各年龄段的在校盲人学生学习使用,而且我国相关机构已经能够提供英语二级盲文(目前国际出版物最常用的英语盲文形式)培训课程,因此可以优先安排进口学生急需的、优质的盲文版学习材料。有声读物则是一种无需专门学习且有趣味的阅读方式,既适合一般的学习,也适合娱乐消遣,适用人群和场景比较广泛,可以适当扩大进口规模和范围。无障碍影视能够满足广大视障人士的文化娱乐需求,在进口时应当注意影视作品的上映时间,使我国视障人士有机会享受更具时效性的影视作品。

5.3 推动制作符合国际标准的无障碍格式作品

跨境交换包含无障碍格式作品的进口和出口。出版物出口是我国塑造国家形象,提高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的一种途径。我国阅读障碍者文化服务机构在出口无障碍格式作品时应当确保作品在内容上能够充分体现我国的优秀文化,在制作标准方面与国际接轨。目前,我国阅读障碍者文化服务机构的某些无障碍格式图书的制作标准与其他国家存在一定的差距,例如,有声书制作中的图像描述是一项重要且难以避免的工作。英美等国的相关机构对无障碍图像描述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布了训练工具和最佳实践指南等。罗斯于2017年通过了相关国家标准。细致且规范化的图像描述能有效地提升有声读物的可理解性,便于视障人群形象、直观地了解信息、学习知识。但我国的阅读障碍者文化服务机构目前对这方面的关注不足,尚未形成相应的规范,影响了有声读物的质量和视障读者的阅读体验。为了改善此类状况,我国的阅读障碍者文化服务机构应对无障碍格式作品的质量予以高度重视,推动制作机构建立相应的制作规范,生产符合国际标准的无障碍格式作品,使我国能够通过履行跨境交换出口义务在海外残疾人群体中树立积极的形象。

5.4 强化复合型专业队伍建设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英语国家的无障碍格式图书资源较为丰富,他们在履行跨境交换义务中掌握更多的主动权。跨境交换要求我国与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相关机构开展合作与交流,对工作人员的外语水平和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在图书编目环节,工作人员应当拥有图书情报专业背景和良好的外语能力,能根据相关要求编写外文版图书元数据;在进口各类无障碍格式图书时,工作人员应当熟练掌握外语和编辑相关知识,能对图书的意识形态和质量进行严格把控,因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不为无障碍图书联合会图书目录中的图书做背书,目录中的图书也不代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任何观点^[2]。建议阅读障碍者文化服务机构在必要时建立多语种专项审核小组,以便准确、及时地完成审核工作。此外,由于各国的盲文体系存在较大差异,进口外文版盲文作品是一项更为复杂的工作,掌握中外双语以及双语盲文的专业人才是完成这项工作的理想人员。由此可见,阅读障碍者文化服务机构应强化建设复合型外语人才队伍,为顺利开展跨境交换各环节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5.5 完善馆藏资源的数字化管理

根据无障碍图书联合会的要求,各缔约国的被授权实体在使用全球图书服务时,应向无障碍图书联合会提交馆藏资源的相关信息,即图书的元数据,包括作者姓名、出版机构、出版年份等,向请求跨境交换的其他被授权实体传输图书的电子文件,并且需要

统计为本机构读者提供的全球图书服务数据库中的图书的数量,在此过程中应充分注意图书管理的方法和流程,并留存相关图书管理工作的记录^[2]。这就要求我国阅读障碍者文化服务机构进一步提高数字化管理水平,建立统一的无障碍格式资源数字化管理平台,同时完善馆藏资源及相关信息的数字化管理流程,设置专人负责跨境交换工作相关资料予以妥善记录和保存;对跨境交换的图书资源采取有效的技术保护措施,利用数字化手段建立一个高效的版权管理机制,防范无障碍格式作品在跨境传播过程中产生的侵权风险^[7]。

6 结语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阅读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途径。对于印刷品阅读障碍者来说,书籍不仅是进步的阶梯,更是黑暗中的一丝光明,绝望处的一缕希望。批准加入《马拉喀什条约》是中国人权保障事业和版权事业中的里程碑事件。通过履行跨境交换义务,我国的阅读障碍者文化服务机构不仅能将优质的海外读物“引进来”,帮助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更加多样化的阅读资源,共享人类文明的丰硕成果,还可以向世界各地的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输送展现优秀中华文化的作品,以图书为桥梁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我国的阅读障碍者文化服务机构应当把握契机,应对挑战,积极提升服务和管理水平,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注释:

- ① “受益人”是《马拉喀什条约》规定的服务对象,包括盲人、视力障碍者、有阅读障碍的人或者因身体残疾而不能持书或翻书的人。
- ② “作品”指《马拉喀什条约》规定可供“受益人”使用的内容,包括文学、科学和艺术领域内的一切成果,不论其表现形式或方式如何。
- ③ “无障碍格式版”是《马拉喀什条约》规定的作品向“受益人”服务的形式,包括盲文版、大字版、有声读物、无障碍影视等。
- ④ “被授权实体”是得到政府授权或承认、以非营利方式向“受益人”提供教育、指导培训、适应性阅读或信息渠道的实体,以及主要活动或机构义务之一是向“受益人”提供相同服务的政府机构或非营利组织。

(下转第15页)

· 学术论坛 ·

《个人信息保护法》视野下的我国图书馆读者个人信息保护 ——法理思考及实现路径

东 方

(衡阳师范学院图书馆 湖南衡阳 421008)

摘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颁布为图书馆读者个人信息保护提供了新的指引与法律保障。研究图书馆读者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文章首先对我国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概况予以梳理,列举《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内容框架;然后以《个人信息保护法》为指引,对图书馆读者个人信息保护进行法理分析与思考;最后探讨《个人信息保护法》视野下我国图书馆读者个人信息保护的实现路径。结论认为,应从4个方面探寻我国图书馆读者个人信息保护的实现路径:争取读者个人信息保护与个人信息服务利用之间的平衡,彰显图书馆核心价值;立足《个人信息保护法》,完善图书馆读者个人信息保护的法规体系;设立读者个人信息保护馆员,加强专职管理;区分读者群体,注重读者个人敏感信息的保护。

关键词:《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图书馆;个人信息保护;法理基础

中图分类号: G252

文献标识码: A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of Library Reader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 Legal Thinking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Abstract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ovides new guidelines and legal protection for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library patrons.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guidance to study the protection of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library patrons. The article firstly reviews the legislation on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in China and lists the content framework of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 After that, guided by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 the research analyzes the jurisprudence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library patrons. Lastly,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path to achieve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library patrons in China under the vision of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 It is concluded that we should explore the path to achieve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our library patrons from 4 aspects: striving for a balance between the protection of patrons'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the use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services to highlight the core values of libraries; improving the regulatory system for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library patrons based on the Law; appointing librarians responsible for the protection of readers'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and classifying reader groups to focus on the protection of readers' personal sensitive information.

Key words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ibrary;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egal basis

1 引言

大数据环境下,数据挖掘与利用极大地促进了数字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便利,但个人信息遭泄露、被盗用现象也较为突出^[1-2]。图书馆收集并保存了大量读者的个人信息,在分析、利用过程中隐含着泄露、侵犯个人信息的风险。如何有效保护读者的个人信息、维护读者的人格权,对于图书馆来说显得重要而迫切。放眼国外,美国国会图书馆^[3]、英国国家图书馆^[4]、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5]、澳大利亚的高校图书馆^[6]等都制定了读者个人信息保护政策和详细细则。然而我国图书馆界保护读者个人信息的意识薄弱,政策法规不够完善。值得欣慰的是,我国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正式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已于2021年8月获准通过,并于11月1日起正式实施^[7];这部法律对于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作为社会文化服务和教育机构的图书馆,对读者个人信息的利用、处理等行为理所当然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法律规制范围之内。笔者认真研读该法律全文条款,并联系图书馆的实际进行思考:在《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制下,我国图书馆读者个人信息保护的法理基础和依据是什么?究竟保护读者的哪些权益?又该如何寻求一条实现读者个人信息保护与个人信息服务利用之间平衡的有效路径?这正是本文的研究主题。

2 图书馆读者个人信息保护的法理分析与思考——以《个人信息保护法》为指引

2.1 我国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概况及《个人信息保护法》内容框架

我国学术界一直致力于“个人信息保护”的理论和立法探索工作,并取得一定成效。原有的相关法律未对公民的个人信息作明确界定,一般认为包括姓名、性别、年龄等基础信息和受教育水平、家庭情况、婚姻、从事职业等个人状况信息。按照施行时间的先后排列,迄今为止我国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有四部(不含条例、指南):《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8]、《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9]、《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10]、《个人信息保护法》^[7]。详情如表1、表2所示。

表2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内容框架一览表

章次	节次	法律条款数目
第一章 总则		12条(第一至第十二条)
第二章 个人信息处理规则	第一节 一般规定	15条(第十三至第二十七条)
	第二节 敏感个人信息的处理规则	5条(第二十八至第三十二条)
	第三节 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特别规定	5条(第三十三至第三十七条)
第三章 个人信息跨境提供的规则		6条(第三十八至第四十三条)
第四章 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		7条(第四十四至第五十条)
第五章 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义务		9条(第五十一至第五十九条)
第六章 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		6条(第六十至第六十五条)
第七章 法律责任		6条(第六十六至第七十一条)
第八章 附则		3条(第七十二至第七十四条)
总共: 八章		总共: 74 条

表1 我国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概况一览表

施行时间	法律名称	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规定	简要评析
2017年6月1日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侧重从网络安全角度监管公民个人信息保护责任及收集、处理行为(第30、32、42、44条)	约束范围局限于网络侵权,应拓展相关配套制度
2018年1月1日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	规定了公共图书馆保护读者个人信息的义务及法律责任(第43、50条)	缺少保护读者个人信息的具体细则
2021年1月1日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明确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主要民事权益(人身权、财产权)(第1194、1165条)	个人信息保护力度不足,系统性不强
2021年11月1日起	《个人信息保护法》	明确了个人信息保护的总则、职责部门;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及跨境提供规则;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法律责任等	形成了我国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完整法律体系,有力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2.2 保护读者个人信息是图书馆应尽的法律义务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五章“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义务”、第六章“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对相关主体部门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义务和职责作了详细的规定^[7]。《个人信息保护法》为图书馆保护读者个人信息提供了很好的指引和法制保障,保护读者个人信息是图书馆应尽的法律义务。

受《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启发,可将图书馆读者个人信息界定为:在整体图书馆范围内,以电子方式或以其他方式记录、并据此识别某特定读者的各类信息。一般来说,图书馆读者个人信息的范围包括个人基础信息、借阅信息、敏感个人信息,这三类信息具有某种关联性,但在实质上存在差别^[11]。图书馆为了提升服务层次,推动全民阅读和公共文化服务进程,不可避免地将进行读者个人信息的收集、储存、传输、公开、加工、利用等信息处理活动。图书馆读者个人信息处理面临一定的困境,影响图书馆核心价值的体现^[12]。《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五十一条明确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依据有关目的、方式、影响、安全风险等因素,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依法进行,防止个人信息泄露及被非法篡改等^[7]。图书馆对读者个人信息的处理应当遵守《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尽义务保护读者个人信息。如:一方面,图书馆要遵照《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法律条文规定,主动履行读者个人信息保护义务。图书馆对读者个人信息进行处理时,要按照《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精神,发挥自身职能,根据读者的申请要求,坚持“个人同意、合法使用”的基本原则^[13],有效开展个性化服务和深层次服务,满足读者的信息需求。若不作为或泄露读者个人信息,损害读者权益,图书馆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另一方面,图书馆有义务提醒读者自觉保护个人信息。在图书馆网站显著位置标明读者保护个人信息的提示和声明,注意个人信息安全,引导读者树立“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律意识。

2.3 尊重人格权是图书馆保护读者个人信息的法理基础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十八条指出,公民个人信息特别是个人敏感信息如果遭到泄露或侵犯,将导致其人格尊严和人身、财产安全受损^[7],法律强调了人格尊严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也规定,公民个人信息保护需建立在尊

重和保护公民人格权、人格利益的基础之上^[10]。图书馆也在这些法律条款规定的约束范围之内,尊重人格权是图书馆保护读者个人信息的重要法理基础。图书馆读者通过图书馆的借阅、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个性化服务等途径,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和文化素养,进而求学深造或参加工作,这本身就是人格尊严价值的社会体现。图书馆在保护读者个人信息的前提下进行必要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进行数据挖掘,给予读者人格关怀,帮助读者实现人格发展^[12]。图书馆读者个人信息维系着主体的人格尊严,也是其人格利益的重要载体;图书馆实行读者个人信息保护首先应尊重和维护读者的人格权。国际图书馆协会与机构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 IFLA)的解释认为,尊重读者的人格尊严方能彰显图书馆的核心价值^[14]。保护读者个人信息,给予读者人格关怀,促进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这是新时代图书馆社会价值的集中体现。

2.4 图书馆读者拥有法律赋予的个人信息知情权和自主决定权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公民对自身个人信息的处理享有知情权、决定权,有权限制或拒绝他人使用;第十四条规定,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处理,必须事先征得个人的知情同意^[7]。可见法律赋予了公民对个人信息的知情权、自决权,图书馆读者亦拥有法律赋予的个人信息知情权和自主决定权。图书馆读者对个人信息拥有的这些权利是保障读者合理享受与利用图书馆服务、确保个人信息安全的重要体现。图书馆应遵守《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维护和保障读者对个人信息的知情权和自主决定权,在图书馆网站的显著位置向读者公开读者个人信息种类、获取、利用等流程说明,保障读者对其个人信息的充分知情,并承诺保护读者个人信息。同时,图书馆还应该对读者的个人信息严加管理,充分尊重读者的自主决定权,如:因需要随时增加、修改或删除个人信息,随时申请查询或读取个人信息等。图书馆要承诺并做到未经读者同意,不得擅自公开、泄露、篡改读者个人信息。我国图书馆界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 and 尝试,如江西省图书馆、浙江图书馆、贵阳图书馆等出台了有关读者个人信息保护的声明,体现了个人信息保护过程中读者的知情权和自决权^[15],但具体规则尚需进一步完善。

3 《个人信息保护法》视野下我国图书馆读者个人信息保护的实现路径

3.1 力求读者个人信息保护与个人信息服务利用之间的平衡,彰显图书馆核心价值

中国图书馆学会在《图书馆服务宣言》中指出,图书馆的核心价值之一是“有效促进读者个人信息资源的利用,体现读者人文关怀”^[16]。《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十条明确规定,从事个人信息处理活动时不得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7]。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馆的不断发展和应用,图书馆获取读者个人信息并加以分析挖掘,根据读者的需求和偏好进行用户画像,提供更为高效、精准的个性化知识服务成为推进新时代图书馆事业进步的重要课题。然而,图书馆在促进个人信息服务利用过程中,势必涉及到读者个人信息的处理。因此,图书馆应有效解决读者个人信息保护与提供个性化服务之间的潜在冲突,力求读者个人信息保护与个人信息服务利用之间的平衡,彰显图书馆的社会价值。一方面,图书馆要把握好信息资源有效利用与读者个人信息保护、数据挖掘利用与数据安全保障之间的平衡,全面贯彻执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原则和法律规定,建立保障监督机制,合理利用读者个人信息中蕴藏的数据,提升图书馆的服务质量。另一方面,图书馆应探求平衡个人信息服务利用与读者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限度,避免过度保护。图书馆在总体遵循《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前提下,可细化规定读者个人信息利用和处理的相关标准,增加与读者的交互环节(如同意、许可、匿名使用、合理使用)等,对读者个人敏感数据及合理使用范围之外的数据应加大保护力度,减少读者个人信息的泄露、遭侵犯风险(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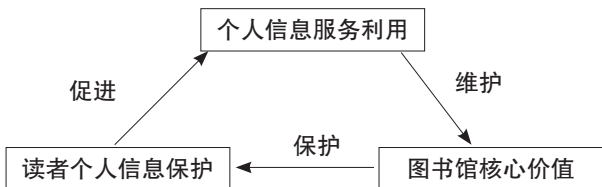


图1 读者个人信息保护、个人信息服务利用、图书馆核心价值平衡图

3.2 立足《个人信息保护法》，完善图书馆读者个人信息保护的法规体系

《个人信息保护法》是维护我国公民合法权益、推进公民个人信息保护事业发展的普遍约束性法律,其确定的个人信息保护基本原则与规定开启了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新征程”。《个人信息保护法》为图书馆的读者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供了强大的法律支撑,对于读者个人信息保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较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然而,我们要实事求是地看到,《个人信息保护法》总体上是一部提纲挈领式的基础性法律,不足以囊括和解决现实实践中的所有问题。图书馆读者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有自身的特殊性,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要将读者个人信息保护与深化读者服务结合起来。因此,图书馆要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基本框架约束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完善有关读者个人信息保护的法规体系与配套规章制度。

我国图书馆界原已进行了读者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努力,也制定和出台了一些法规、条例等,但系统性不强、收效不大。举例来说,作为图书馆官方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专门设有读者个人信息保护的条款,但数量极少、操作细则不全,在保护读者个人信息权益方面仍存在缺失,亟需完善^[17]。另外也制定了一些与读者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的条例规范,如:《中国图书馆员职业道德准则》《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江西省图书馆门户网站关于用户隐私的保护声明》《浙江图书馆隐私声明》等,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没有形成图书馆读者个人信息保护的整套法规体系。因而,我国图书馆界应该在文化与旅游部的领导下,在中国图书馆学会、地方各级图书馆学会的支持下,结合图书馆的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图书馆读者个人信息保护指南》,推进读者个人信息处理。《图书馆读者个人信息保护指南》要以《个人信息保护法》为依据和准绳,具体规定:图书馆读者个人信息保护的宗旨、原则、指导思想;可采集的读者个人信息的标准、类型;图书馆读者个人信息处理者的权利和义务;读者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图书馆读者个人信息安全管理;违约责任及纠纷救济措施,等等。

3.3 设立读者个人信息保护馆员,加强专职管理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达到国家网信部门规定数量的个人信息处理部门应指定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负责监督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及其保

护措施等^[7]。图书馆拥有大量的读者,达到网信部门规定的数量标准,应当设立读者个人信息保护馆员,以加强专职管理。图书馆选拔读者个人信息保护馆员时,要全盘考虑其是否具备图书情报学、法学、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背景和公正守信、诚恳敬业的职业素养,主要提供图书馆读者个人信息保护的规章制度、政策宣传和范围界定、读者个人信息提交与保护事项告知、个人信息安全监督与保护、读者个人信息受侵犯后的法律援助与救济等知识帮助和服务。读者个人信息保护馆员肩负着重要职责,主要包括: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制定与责任担当职责;上传下达沟通与监督职责;读者个人信息处理职责(合法收集、存储、删除、更改、利用等);读者个人信息保护风险预警及防范;个人信息安全技术保护职责^[18]等。

3.4 区分读者群体,注重读者个人敏感信息的保护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亮点与特色之一是确定了个人敏感信息的处理规则。第二十八条至第三十二条对个人敏感信息的涵义和范围进行了明确界定,并确立了“知情同意”的处理规则。按照法律规定,个人敏感信息主要包括身份特征、个人信仰、健康信息、生物识别、银行账户、个人行踪等,还包括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未满十四周岁)^[7]。图书馆拥有多种不同的读者群体,如师生群体、老年人群体以及未成年人群体^[19]等,包含大量的个人敏感信息。读者个人敏感信息与个人的人格尊严密切相关,图书馆应该要区分不同读者群体,注重读者个人敏感信息的保护,以体现法律

的威力和对读者的人文关怀。图书馆在实践中可构建读者个人敏感信息保护机制^[20],贯彻《个人信息保护法》,在征得读者个人和未成年人的父母或监护人“同意”的前提下,依法进行收集、存储、分析、利用等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建立分级分类保护体系,严格保护读者个人敏感信息,防止泄露、篡改,保障读者的个人权利与合法利益。区分读者群体,执行“同意”规则,实施读者个人敏感信息的重点保护,可以有效保障读者对个人敏感信息的参与权和控制权,防范读者个人信息泄露和遭侵犯风险。

4 结语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颁布和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公民的个人信息保护进入“新时代”,也为图书馆读者个人信息保护提供了新的指引与法律保障。图书馆界应认真学习、贯彻《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法制精神和规定,制定较完善的读者个人信息保护政策,认真履行读者个人信息保护义务。文章以《个人信息保护法》为指引,对图书馆读者个人信息保护进行了法理分析与思考,并详细探讨了《个人信息保护法》视野下我国图书馆读者个人信息保护的实现路径。同时应该看到,图书馆读者个人信息保护也面临着一些现实困难和障碍。如何发挥现代新信息技术的作用、构建切实有效的读者个人信息保护风险评估和实施监督机制,则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议题。

参考文献:

- [1] 郭军.大数据环境下图书馆用户个人信息保护研究[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0(1):11-19,28.
- [2] 谢丽玉.大数据环境下图书馆用户个人信息保护现状及对策研究[J].河南图书馆学刊,2021,41(8):114-115,118.
- [3] 胡依晨.中美图书馆个人信息保护政策比较研究[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21.
- [4] 王肃之,翟军平.美、英国家图书馆读者个人信息保护政策的启示[J].图书馆,2019(2):13-18.
- [5] 吴雪敏.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个人信息保护政策研究[J].图书馆,2015(3):53-55.
- [6] 鲁唱晚.澳大利亚高校图书馆个人信息保护政策的研究与启示[J].山东图书馆学刊,2021(2):105-111.
- [7]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国国家法律文件)[EB/OL].[2021-11-15].<https://baike.baidu.com/item/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 [8] 百度百科.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EB/OL].[2021-11-18].<https://baike.baidu.com/item/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EB/OL].[2021-11-18].<https://baike.baidu.com/item/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
-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EB/OL].[2021-11-18].<https://baike.baidu.com/item/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 [11] 时诚.形似神异:数字时代读者个人信息、借阅信息与隐私信息的关系——以《公共图书馆法》第43条为研究对象[J].图

- 书馆建设,2021(6):93-101.
- [12] 李仪,陶乃航.高校图书馆读者个人信息处理的困境及其应对机制[J].图书馆论坛,2021,41(7):108-115.
- [13] 侯伟锋,丁炫凯.论图书馆对读者个人信息的保护:以《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为中心的考察[J].图书馆论坛,2021(12):77-86.
- [14]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IFLA Global Vision Report[EB/OL].[2021-11-26].<https://www.ifla.org/global-vision-report/>.
- [15] 谷佳虹.我国图书馆用户个人信息保护政策调查研究[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21.
- [16] 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馆服务宣言》[EB/OL].[2021-12-02].<http://www.lsc.org.cn/contents/1260/2029.html>.
- [17] 梅傲,勾明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背景下公共图书馆读者个人信息保护的缺失及完善[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21(5):29-34.
- [18] 窦珊珊.图书馆个人信息保护专员职责研究[D].石家庄:河北大学,2020.
- [19] 张晓新,刘龙垚.图书馆分群体个人信息立法策略研究[J].四川图书馆学报,2021(4):45-49.
- [20] 姬蕾蕾.大数据时代个人敏感信息的法律保护[J].图书馆,2021(1):99-106.

作者简介: 东方,衡阳师范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馆管理。

收稿日期: 2022-02-11

本文责编: 王晓琳

(上接第9页)

参考文献:

- [1] WIPO. The Origi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Marrakesh Treaty [EB/OL].[2022-04-19].https://www.wipo.int/about-wipo/en/offices/china/news/2021/news_0045.html.
- [2] Accessible books consortium. ABC Global Book Service [EB/OL].[2022-04-19].<https://www.accessiblebooksconsortium.org/globalbooks/en/>
- [3] 鲁甜.数字环境下我国无障碍格式版跨境交换的构建[J].图书馆论坛,2022,42(2):150-160.
- [4]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大会第七届会议(第7次例会):关于无障碍图书联合会的报告[R].日内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2.
- [5] 张惠彬,吴柯苇.论《马拉喀什条约》在英国的实施及其启示[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9(4):78-83.
- [6] 徐轩.加拿大关于阅读障碍者的版权例外研究:以《马拉喀什条约》实施为视角[J].图书馆建设,2017(3):17-22.
- [7] 徐轩.基于《马拉喀什条约》实施视角的图书馆无障碍服务对策研究[J].图书馆,2015(4):66-70.

作者简介: 张倩,中国盲文出版社有声读物事业部编辑、翻译,研究方向为盲人读物出版、阅读障碍文化服务;杨阳,中国盲文出版社盲人教具学具事业部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盲人文化出版服务领域的技术研究与应用。

收稿日期: 2022-06-02

本文责编: 孙晓清

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用户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

倪伟宸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湖南湘潭 411105)

摘要: 探索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用户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有助于提高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能力, 提升用户健康水平, 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基于美国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构建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用户满意度影响因素模型, 文章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数据, 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用户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用户期望、感知价值、感知质量对用户满意产生正向影响; 用户满意对用户忠诚产生正向影响, 对用户抱怨产生负向影响。公共图书馆应丰富馆藏健康资源, 加强人文环境建设; 提高馆员服务能力, 增强用户认知水平; 重视用户反馈, 满足用户新需求; 加强服务主体建设, 重视健康服务发展以提高用户对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的满意度。

关键词: 公共图书馆; 健康信息服务; 用户满意度;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G258.2; G252.0

文献标识码: A

A Study 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User Satisfaction of Health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Public Libraries

Abstract Explor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ser satisfaction with public library health information services helps to improve the capacity of public library health information services, enhance the health level of users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Healthy China. Based on the American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dex model,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model of factors influencing user satisfaction with public library health information services. The article collects data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us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ser satisfaction with public library health information service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user expectation, perceived value, and perceived quality have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user satisfaction. User satisfaction positively influences user loyalty and negatively influences user complaints. Public libraries should enrich the health resources in their collections, strengthen the humanistic environment, improve the service capability of librarians, and enhance users' social awareness. At the same time, public librarie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users' feedback, and meet new users' needs. Moreover, public libraries should improve the competence of service providers and boost the development of health services to improve users' satisfaction with public library health information services.

Key words public library; health information service; user satisfac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1 引言

随着经济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国家越来越重视人民身体健康状况。《“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指出, 全民健康是建设健康中国的根本目的, 强调统

筹社会、行业、个人三个层面形成社会共治格局^[1]。健康中国战略提出之后, 公众对图书馆服务产生新的期待, 作为信息传播与服务的关键性平台, 公共图书馆在健康信息传播与服务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 提高用户对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满意度, 引导公众参与到全民健康的浪潮中, 提高国人的健

康意识和健康水平,进而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是公共图书馆在提供健康信息服务中必须承担的责任与义务。然而,绝大部分公共图书馆的健康信息服务尚存在专业人员较少、特色资源单一、服务深度不足、合作范围有限等问题^[2]。此外,读者方面也存在对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内容了解不足、资源利用率有限等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公众对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的满意程度。在此背景下,如何提升公众对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的满意程度就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本文以广泛应用于图书馆领域的美国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American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dex,ACSI)为基础,构建了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用户满意度影响因素模型,对影响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用户满意的因素进行分析,以期对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的建设提供参考。

2 研究述评

国外学者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对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进行研究。1957年Simon P等人^[3]在其研究成果*Health education in the public library*中首次探讨了公共图书馆该如何向城市社区居民提供健康教育。不过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国外学者并未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直到1998年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联合部分公共图书馆、医学图书馆与资源图书馆开展面向公众健康信息服务调查,健康信息服务才重新得到学者们的关注^[4]。国外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进行研究:(1)馆藏资源建设。Oelschlegel S等人^[5]发现图书馆的健康信息对改善医患沟通、降低患者压力、提高健康积极性有着积极作用。Ingham A^[6]发现具有时效性、全面性、权威性的健康信息资源可以起到改善健康状况的作用。

(2)健康信息素养教育。Danhoundo等人^[7]调查发现图书馆对农村社区居民健康信息素养的提升起到积极作用。Tricia Lantzy^[8]、Charlotte Beyer等人^[9]通过分析健康信息课程的教学案例,认为图书馆可以通过教学活动提升学生健康信息素养。(3)健康信息馆员。Rubenstein^[10]对38名美国公共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进行采访发现,用户对具有Consumer Health Information Specialization(CHIS消费者健康信息专业化)证书的图书馆员的满意度比其他馆员满意度高。Kiscaden

Elizabeth等人^[11]认为CHIS计划极大提高了公共图书馆员提供健康信息服务的能力。Koos J A等人^[12]发现绝大部分图书馆员认为参加健康信息培训能够满足其教育需求。(4)与相关机构合作。Henry E等人^[13]认为开放与诚实、灵活的领导、尊重与公平、资金与培训是公共图书馆寻求合作的关键原则。Whiteman E D^[14]、Andrea Tanner等人^[15]研究发现,公共图书馆可以通过与医疗机构、研究院、学校、社区等组织进行合作,使其成为公众健康信息中心。

相比较而言,我国关于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的研究开展较晚,早期研究主题大多集中于中老年人的健康信息服务。不过,在健康中国战略提出后,国内学者对公共图书馆的健康信息服务展开大量研究。国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进行研究:(1)健康信息服务现状。任煦等人^[16]、袁梦群等人^[17]从不同角度对省级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状况进行调查并提出建议。张旭^[18]提出应加强公共图书馆信息服务质量研究。(2)健康信息素养教育。周谦豪等人^[19]认为构建图书馆健康信息素养教育体系可以对用户健康信息素养的提升起到积极作用。江梦涵^[20]提出公共图书馆可以从网站建设、机构合作、媒体传播三个方式提高公民健康信息素养。

(3)健康信息服务评估。曹锦丹等人^[21]对我国31所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相关网页进行可访问性测评。张轶群^[22]指出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评价的关键是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张晓娜^[23]从社会、图书馆、用户三个维度探讨了影响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满意度的因素。陶敏等人^[24]以信息生态理论为切入点,运用DEMATEL(Decision Making Trial and Evaluation Laboratory,决策实验和评价实验室)方法对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的影响因素进行识别。(4)国外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状况。周晓英^[25]对英美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进行研究,提出公共图书馆应将健康信息服务纳入服务计划中。王培林^[26]将《英国NHS图书馆质量评估标准》作为切入点,从国家政策、服务环境、社会力量、服务推广、知识服务等方面为我国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发展提供参考。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进行探讨,从研究主题来看,国外研究主题更为丰富。相比而言,当前我国关于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研究主题与对

象较为单一。此外,将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与用户满意度相结合的研究较少。基于此,本文参考ACSI指标体系,选取用户期望(User Expectations,UE)、感知价值(Perceived Value,PV)、感知质量(Perceived Quality,PQ)、用户满意(User Satisfaction,US)、用户忠诚(User Loyalty,UL)、用户抱怨(User Complaints,UC) 6个潜变量,用于表示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用户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并引入能够反映其意义的观测变量,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各潜变量直接的关系,以期提高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质量、提升用户对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的满意度提供参考。

3 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用户满意度影响因素模型

3.1 基于ACSI模型的变量关系假设

3.1.1 用户期望对用户满意的影响

顾客期望是顾客利用过去经验性或非经验性的信息对产品或服务的质量进行预测和判断^[27]。而对于接受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的用户而言,随着接受健康信息服务次数不断增加以及自身需求的不断改变,并且对所需的信息与服务越来越熟悉,用户的期望也就越来越高。因此,选取“用户期望”作为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用户满意度测评的潜因变量。并选取资源期望、馆员服务与能力期望、环境设施期望、调控自身健康期望作为用户期望的观测变量。此外,借鉴Fornell教授及其团队提出的ACSI模型中关于用户期望与用户满意之间的关系^[28],用户在使用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前会对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期待,如果用户期望较高,实际体验也很好,用户满意则偏高,反之则偏低。因此,基于上述分析对用户期望提出如下假设:

H1: 用户期望对用户满意产生正向影响。

3.1.2 感知价值对用户满意的影响

顾客感知价值是顾客对企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综合评价^[29]。在本文中,感知价值是用户通过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资源和服务获取到的收益与付出的成本之间的比值。用户感知价值的高低对用户满意有重要影响,当用户感知自身所获得的收益高于所付出的成本时则会产生用户满意。所以本文借鉴齐向华^[30]总结的测评用户感知价值的相关维度,选取健康信息

资源价值、馆员服务价值、资源调控自身健康价值、所花费时间与精力价值作为感知价值的观测变量。因此,基于上述分析对感知价值提出如下假设:

H2: 感知价值对用户满意产生正向影响。

3.1.3 感知质量对用户满意的影响

感知质量是指顾客在使用产品或服务中的实际体验与未使用时的预期体验之间比较的结果,是一种主观情感。对于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而言,感知质量是用户在体验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的过程中形成的感受。用户需求作为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的核心,如果用户在体验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的过程中有较好的感受,那么就会产生用户黏度,进而提升用户满意。因此,本文借鉴孙静等人^[31]关于图书馆服务质量评价的指标体系,选取信息获取的便捷程度,信息有用性、新颖性与可靠性,线上平台运行情况,馆员理解能力,馆员服务能力,用户反馈及处理效率作为感知质量的观测变量。因此,基于上述分析对感知质量提出如下假设:

H3: 感知质量对用户满意产生正向影响。

3.1.4 用户满意对用户忠诚与用户抱怨的影响

用户忠诚是指用户因健康信息需求得到满足而重复利用同一公共图书馆或用同一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的行为。用户抱怨是指用户在公共图书馆体验健康信息服务之后没有达到预期质量而产生的不满。在公共图书馆中,用户如果对健康信息服务较为满意则会更加愿意访问图书馆,并向他人进行推荐,从而对服务产生忠诚效应。如果满意较低,用户则会对服务产生抱怨,继而停止访问图书馆,并进行负面宣传或投诉。在ACSI模型中,用户忠诚与用户抱怨均为用户满意的结果变量,用户满意的提升不仅能增加用户忠诚,同时还能降低用户抱怨。因此,用户忠诚将通过向他人推荐意愿、持续使用意愿、对自身健康调控的信心三个变量进行观测。用户抱怨将通过健康信息资源的抱怨、馆员的抱怨、负面宣传的可能性三个变量进行观测。因此,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4: 用户满意对用户忠诚产生正向影响。

H5: 用户满意对用户抱怨产生负向影响。

3.2 模型构建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与假设,本文对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用户满意度的研究共建构了5个研究假设,从而形成研究假设模型(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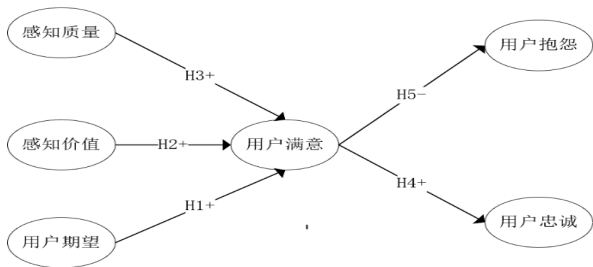


图1 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用户满意度影响因素假设模型

3.3 观测变量选取

由于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用户满意度是用户在接受健康信息服务之后自身感受的心理状态，主观色彩明显，难以通过模型中的潜变量进行直接测量。因此，本文在参考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通过设定6项潜变量和25项观测变量，设计出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用户满意度测评量表（见表1）。

表1 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用户满意度测评量表

潜变量	观测变量	变量来源
用户期望 (UE)	UE1: 对公共图书馆健康资源的期望	张晓娜 ^[23]
	UE2: 对公共图书馆馆员服务与能力的期望	
	UE3: 对公共图书馆环境设施的期望	
	UE4: 对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调控自身健康的期望	
感知价值 (PV)	PV1: 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资源能否满足自身需求	齐向华 ^[30]
	PV2: 公共图书馆馆员能否满足自身需求	
	PV3: 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资源对自身健康调控的价值	
	PV4: 所花费的时间与精力价值	
感知质量 (PQ)	PQ1: 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获取便捷程度	Rubenstein ^[10] ; 曹锦丹等人 ^[21] ; 张晓娜 ^[23] ; 陶敏等人 ^[24] ; 刘冰等人 ^[32] ; 邓胜利等人 ^[33]
	PQ2: 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的有用性	
	PQ3: 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新颖性与可靠性	
	PQ4: 公共图书馆线上服务平台运行状况	
	PQ5: 公共图书馆馆员能否理解自身需求	
	PQ6: 公共图书馆馆员能否满足自身需求	
	PQ7: 用户反馈及处理的效率	
用户满意 (US)	US1: 对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整体满意度	齐向华 ^[30]
	US2: 与预期相比的满意度	
	US3: 与理想相比的满意度	
	US4: 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的重要程度	

续表

潜变量	观测变量	变量来源
用户忠诚 (UL)	UL1: 推荐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的意愿	温国强 ^[34] ; 刘锦源等人 ^[35]
	UL2: 持续使用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的意愿	
	UL3: 对自身健康调控的信心	
用户抱怨 (UC)	UC1: 对资源进行投诉的概率	沈健 ^[36]
	UC2: 对馆员进行投诉的概率	
	UC3: 进行负面宣传的概率	

4 实证分析

4.1 数据收集

问卷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根据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用户满意度测评量表设计题目，并采用7级李克特 (Likert) 量表进行打分，分别对应1、2、3、4、5、6、7七个数，数值越高代表满意度越高。第二部分是用户基本信息。主要通过网络进行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36份，回收299份，剔除不规范的问卷，最终获得270份有效问卷，样本描述统计如表2所示。

表2 样本描述统计表

项目	选项	小计/人	比例/%
性别	男	120	44.44
	女	150	55.56
年龄	18岁以下	8	3.03
	18—30岁	180	66.67
	31—40岁	56	20.71
	41—50岁	22	8.08
	50岁以上	4	1.52
学历	大专以下	16	6.06
	大专	46	17.17
	本科	127	46.97
	硕士及以上	80	29.80
职业	政府机关干部	16	6.06
	企事业单位职员	68	25.25
	私营企业主、个体经营	40	14.65
	教师、科研人员、技术人员	18	6.57
	学生	112	41.41
	待业、下岗及其他	16	6.06

4.2 信度与效度分析

运用SPSS24.0软件对问卷效度与信度进行分析。

从表3可知, 效度方面问卷整体KMO值为0.849, 符合大于0.8的标准要求, Bartlett球形检验近似卡方值为2 951.654, 显著性为0.000, 达到显著性要求。

表 3 KMO 和 Bartlett 检验

检测项		检测值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0.849
Bartlett 球形检验	近似卡方	2 951.654
	自由度	300
	显著性	0.000

信度方面, 总量表Cronbach's α 系数为0.853, 各潜变量Cronbach's α 系数均大于0.7的标准要求, 说明问卷整体与各潜变量信度较好(见表4)。

使用AMOS24.0分析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参考Chin的标准, 删除标准化因子载荷低于0.6与题目信度低于0.36的可测变量US4后, 剩余24个可测变

量^[37]。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各观测变量标准化因子载荷与题目信度均达到0.6与0.36的要求, 说明各观测变量对潜变量有较好的解释能力。各潜变量组合信度均大于0.7的要求, 说明内部一致性较好。绝大部分收敛效度达到0.5以上的标准。尽管用户期望的收敛效度小于0.5, 但是组合信度大于0.7, 所以该潜变量依然达到标准^[38]。因此, 各潜变量及可测变量均达到显著性水平。

4.3 模型检验

本研究建立的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用户满意度影响因素模型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如图2所示。

本文运用AMOS24.0软件对模型进行拟合情况分析, 结果如表5、表6所示。由表5可知, 模型中CMIN/DF值为1.444<3.0; RMSEA值为0.041<0.05; GFI、CFI、TLI、IFI均大于0.9; PGFI值为0.735>0.5; AGFI值为0.881>0.8。由此认为, 本研究的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用户满意度模型是合理的。

表 4 信效度分析与验证性因子分析

潜变量	观测变量	标准化因子 载荷	误差方差	CR	AVE	Cronbach's α	
						各潜变量	总体
用户期望(UE)	UE1	0.608	0.370	0.757	0.439	0.751	0.853
	UE2	0.637	0.406				
	UE3	0.759	0.576				
	UE4	0.626	0.392				
感知价值(PV)	PV1	0.745	0.555	0.860	0.606	0.858	
	PV2	0.761	0.579				
	PV3	0.791	0.626				
	PV4	0.808	0.653				
感知质量(PQ)	PQ1	0.647	0.418	0.884	0.523	0.882	
	PQ2	0.676	0.457				
	PQ3	0.701	0.491				
	PQ4	0.765	0.585				
	PQ5	0.806	0.650				
	PQ6	0.733	0.537				
	PQ7	0.704	0.496				
用户满意(US)	US1	0.747	0.558	0.818	0.599	0.812	
	US2	0.757	0.573				
	US3	0.811	0.658				
用户忠诚(UL)	UL1	0.791	0.626	0.841	0.638	0.839	
	UL2	0.856	0.733				
	UL3	0.741	0.550				
用户抱怨(UC)	UC1	0.737	0.542	0.817	0.599	0.813	
	UC2	0.757	0.573				
	UC3	0.815	0.6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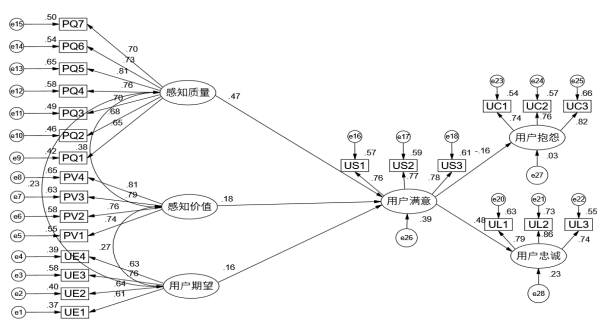


图2 标准化路径系数

此外,由表6可知,各项假设的P值均小于0.05,说明文中的假设均通过检验。

表5 模型拟合度指数

拟合系数	适配标准		拟合结果
	可接受范围	最优范围	
CMIN/DF	3.0—3.5	< 3.0	1.444
RMSEA	< 0.08	< 0.05	0.041
GFI	0.7—0.9	> 0.9	0.903
CFI	0.7—0.9	> 0.9	0.959
TLI	0—1	> 0.9	0.954
IFI	0—1	> 0.9	0.960
PGFI	0—1	> 0.5	0.735
AGFI	0—1	> 0.8	0.881

表6 模型假设检验结果

假设	变量关系	标准化路径系数	C.R.	P	结果
H1	用户满意<---用户期望	0.161	2.267	0.023	支持
H2	用户满意<---感知价值	0.180	2.53	0.011	支持
H3	用户满意<---感知质量	0.467	5.792	***	支持
H4	用户忠诚<---用户满意	0.484	6.243	***	支持
H5	用户抱怨<---用户满意	-0.161	-2.161	0.031	支持

注:***表示 $p<0.001$ 。

4.4 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通过SPSS25.0与AMOS24.0软件对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用户满意度调查数据和结构方程进行分析,得出结论与启示如下:

(1)用户期望对用户满意产生正向影响,且影响系数为0.161,说明用户对公共图书馆的健康信息服务状况十分关注。此外,在用户期望的四个观测变量中,健康资源期望、馆员服务与能力期望、环境设施期望、调控自身健康期望对用户期望的影响系数分别

为0.61、0.64、0.76、0.63,其中环境设施期望对用户期望的影响力度最高。

(2)感知价值对用户满意产生正向影响,且影响系数为0.18。其中健康信息资源对自身健康调控的价值与所花费的时间与精力价值对感知价值的影响系数最大,分别为0.791、0.818。这是因为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对馆藏建设与馆员能力有一定的要求。因此,为用户提供有效的资源与服务,让用户感受到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的价值,同样有助于提升用户满意度。

(3)感知质量对用户满意产生正向影响,且影响系数为0.467,高于用户期望与感知价值。说明用户的感知质量的提升可以更加有效地提高用户满意度。在感知质量的7个观测变量中,公共图书馆线上平台运行状况与馆员能否理解自身需求对感知质量的影响程度最大,分别为0.765、0.806。其余5个观测变量的影响系数也均在0.7左右。因此,公共图书馆应采取全面且均衡的措施提升用户感知质量。

(4)用户满意对用户忠诚产生正向影响,且影响系数为0.484。在用户忠诚的观测变量中,用户向他人推荐意愿、持续使用意愿、对调控自身健康的信心对用户忠诚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791、0.865、0.741,说明用户满意度提升对用户忠诚的提高具有显著效果,并且可以让更多用户体验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进而对自身健康水平的提升更有信心。

(5)用户满意对用户抱怨产生负向影响,且影响系数为-0.161。在用户抱怨的观测变量中,进行负面宣传与用户抱怨的影响系数为0.815,略高于对资源的投诉与对馆员的投诉。说明一旦公共图书馆在提供健康信息服务的过程中无法满足用户需求时,用户将很有可能对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进行负面宣传,导致尚未体验过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的其他用户也放弃使用这一服务。

5 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提升策略

5.1 丰富馆藏健康资源,加强人文环境建设

健康信息资源期望与环境设施期望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61、0.76,说明公共图书馆通过提高健康信息资源、改善环境氛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用户期望,进而为用户满意的提升提供保障。丰富、权威且

具备时效性的健康信息资源是公共图书馆开展健康信息服务的必要条件。公共图书馆可以通过采购健康信息资源、整理已有的特色资源、按需增加复本、补充电子资源等方式丰富健康信息资源,提高健康信息质量,使用户更愿意体验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同时,公共图书馆可以通过划分用户群体、用户性别提供差异化的健康信息服务,以满足不同年龄与性别用户的健康信息需求。环境设施质量的提升对增加用户停留时间、了解健康信息服务内容、提升用户满意有着独特作用^[39]。因此,公共图书馆要以用户需求为导向,从景观布局、馆址选取等方面将健康精神融入公共图书馆环境设施建设,继而吸引更多读者进入公共图书馆。此外,在全媒体时代,公共图书馆应采用文图、声音、短视频等多种表现形式,通过网络进行传播,实现用户在有限时间内可以利用各种终端获取更多有用的信息,以增加用户对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的可接触性,进而提升用户满意。

5.2 提高馆员服务能力,增强用户认知水平

馆员服务价值与用户所花费时间与精力价值的路径系数为0.76、0.81,说明用户对服务能力与服务质量的重视。因此,公共图书馆在提供健康信息服务的过程中应与“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的思想紧密结合,发挥公共图书馆文化引领的作用,引导公众体验健康信息服务,参与到健康中国建设的道路中。一方面,公共图书馆应加强馆员团队的人才建设,通过招聘具有相关专业背景的人才,建立与高校或相关医疗卫生机构的合作关系,制定专门的入职、在岗培训等方式提升馆员服务能力,以保证在面对不同群体、不同领域的问题时,可以快速理解并灵活处理解决用户问题。良好的关系质量有助于提升用户对图书馆的满意度。因此,在提升馆员能力的同时,公共图书馆还应重视馆员服务态度、规范馆员服务形象,以提升馆员与用户之间的关系质量。另一方面,图书馆应提升服务宣传力度,通过多样化的宣传方式使用用户对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有所知晓。再结合“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中15个重大行动的内容,按照自身条件、社会状况与用户需求,在馆内、社区等地针对性地举办与健康有关的活动,使用户参与、了解、知晓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的内容,提高用户通过公共图书馆了解健康知识的积极性,帮助用户在一定程度上对自身健康进行调控。

5.3 重视用户反馈,满足用户新需求

用户反馈及处理效率与健康信息获取便捷程度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70与0.65,说明图书馆对用户反馈处理的效率与信息获取的便捷程度对感知质量有着积极影响,良好的反馈机制有助于了解用户需求、获取用户满意度信息、提升服务质量;便捷的信息获取不仅可以提高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资源的利用率,还能降低用户获取健康信息的成本。由于公共图书馆与用户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这就导致二者之间的信息交换存在问题。因此,公共图书馆需广泛收集用户想法、了解用户需求来丰富馆内健康信息资源。同时重视用户反馈与意见,通过发放问卷、设置意见箱等方式,丰富用户反馈方式,及时收集、整理、分析用户意见,并及时改进,最后对用户进行反馈。此外,在后疫情时代,公共图书馆应及时更新健康热点,利用官网、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微博等媒介平台,对健康信息资源进行分类整合,推出常态化的与疫情状况相关的健康信息服务,以增强健康信息服务质量的广泛性、多样性与时效性,不断满足用户对各类健康信息资源获取的需求,提升用户对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的满意程度。

5.4 加强服务主体建设,重视健康服务发展

调控自身健康期望、资源调控自身健康价值、对自身健康调控的信心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63、0.79、0.74,说明用户对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在调控自身健康方面有着较大的期望与信心。公共图书馆应当加强馆际交流与合作,实现资源共享^[40]。在健康中国背景下,作为社会信息服务的重要机构,促进社会公民健康水平的提升是公共图书馆必要使命,开展健康信息服务不仅是助力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还是满足社会各界对健康信息的迫切需求,更是公共图书馆在社会发展历程中提升自身服务的契机^[23]。因此,公共图书馆的管理者应充分认识到开展健康信息服务的必要性与重要性,通过与机构合作、宣传活动等方式使健康信息服务被社会大众广为知晓。在图书馆员方面,应加强对健康信息服务的认同感,提升对健康信息服务的重视程度,通过专业的服务获取用户信任,以便进一步为用户解决问题。此外,通过开展网络课堂、健康信息素养讲座以及各类与健康信息相关的活动,让用户愿意了解、体验并长期使用健康信息服务,最终达成调控自身健康的目标,实现用户对公共

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满意的提升。

6 结语

本文根据ACSI模型,从用户期望、感知价值、用户满意等维度建立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用户满意度影响因素模型,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运用SPSS与AMOS软件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用户期望、感知价值、感知质量对用户满意有正向影响,用户满意对用户抱怨有负向影响,对用户忠诚有正向影响;其次,对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用户满意度的提升提出相应策略。

在理论层面,本文将ACSI模型与公共图书馆健

康信息服务情况相结合,构建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用户满意度模型,揭示影响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用户满意度的因素,以丰富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用户满意度的研究。在实践上,证明了用户期望、感知价值、感知质量会影响用户对健康信息服务的满意度,对公共图书馆提高健康信息服务品质提供了一定借鉴。

本文也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研究范围主要为样本内用户,样本来源有限。第二,未从图书馆等级或其他方面展开相关研究。因此,在后续研究中,笔者将从上述两点不足进行研究,以对不同省份、不同等级的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的发展提供参考,丰富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及满意度的研究。

参考文献:

- [1] 中国政府网.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EB/OL].[2021-11-1].http://www.gov.cn/zhengce/2016-10/25/content_5124174.htm.
- [2] 金燕,张启源.我国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现状调查与分析[J].图书情报知识,2018(2):23-24-31.
- [3] SIMON P, SIMON L. Health education in the public library[J]. Public Health Reports, 1957, 72(10): 918-920.
- [4] WOOD F B, LYON B, SCHELL M B, et al. Public library consumer health information pilot project: results of a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evaluation[J]. Bull Med Libr Assoc, 2000, 88(4): 314-322.
- [5] OELSCHLEGEL S, GONZALEZ A B, FRANKS E. Consumer Health Information Centers in Medical Libraries: A Survey of Current Practices[J]. Journal of Hospital Librarianship, 2014, 14(4): 335-347.
- [6] INGHAM A. Can your public library improve your health and well-being? An investigation of East Sussex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J]. Health Information & Libraries Journal, 2014, 31(2): 156-160.
- [7] DANHOUNDO G, WHISTANCE-SMITH D, LEMOINE D, et al. Provision of consumer health information in Alberta's Rural Public Libraries[J]. Health Information and Libraries Journal, 2019, 36(1): 41-59.
- [8] LANTZY T. Health literacy education: the impact of synchronous instruction[J]. Reference Services Review, 2016, 44(2): 100-121.
- [9] BEYER C, THOMSON J S. Promoting health literacy within a graduate-level nutrition curriculum[J]. Reference Services Review, 2016, 44(2): 122-131.
- [10] RUBENSTEIN E L. "I Want to Provide Patrons with Good Information": Public Library Staff as Health Information Facilitators[J]. The Library Quarterly, 2018, 88(2): 125-141.
- [11] KISCADEN E, SPATZ M, WOLFE S M, et al. Impact of a consumer health information specialization (CHIS) sponsorship program on the ability of public library staff to provide consumer health information[J]. Journal of the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JMLA, 2021, 109(2): 267-274.
- [12] KOOS J A, SARAGOSSI J, STEVENS G A, et al. A partnership between academic and public librarians: "What the Health" workshop series[J]. Journal of the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JMLA, 2019, 107(2): 232.
- [13] HENRY E, MARLEY L. Helping the public 'Discover Health' in their local library. Providing health information in public libraries: a partnership approach in Scotland[J]. Health Information & Libraries Journal, 2010, 21(s1): 27-32.
- [14] WHITEMAN E D, ROXANNE D, MORGAN A U, et al. Public Libraries As Partners for Health[J]. Preventing Chronic Disease,

2018,15(5):E64.

- [15] TANNER A,OWENS O L,SISSON D,et al.Dodging the Debate and Dealing with the Facts:Using Research and the Public Library to Promote Understanding of the Affordable Care Act[J].The Library Quarterly,2016,86(2):172-192.
- [16] 任煦,石艳霞.基于社会化媒体的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现状调查与分析[J].图书馆学研究,2018(7):76-83.
- [17] 袁梦群,严贝妮.我国省级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调查与启示[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9(2):10-14.
- [18] 张旭.国内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研究综述[J].图书馆学研究,2017(16):18-23.
- [19] 周谦豪,姚占雷,许鑫.图书馆健康信息素养教育的调研与分析[J].图书馆学研究,2020(10):77-86.
- [20] 江梦涵.图书馆提高公众健康素养的途径[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1,43(S1):36-37.
- [21] 曹锦丹,程文英,李岩.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的Web可访问性评价[J].图书馆学研究,2012(22):73-77.
- [22] 张轶群.国内外健康科学图书馆员新角色和启示[J].知识管理论坛,2015(3):24-30.
- [23] 张晓娜.扎根理论视角下的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满意度影响因素[J].图书馆论坛,2019,39(7):91-98.
- [24] 陶敏,邹凯,刘钊,等.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质量关键影响因素识别研究[J].图书馆学研究,2020(13):56-63.
- [25] 周晓英.健康服务:开启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新领域[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9,45(4):61-71.
- [26] 王培林.健康信息服务驱动公共图书馆未来发展:基于《英国NHS图书馆质量评估标准》的分析与启示[J].图书情报知识,2018(2):32-39.
- [27] FORNELL C,刘金兰.顾客满意度ACSI[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6:7,52,72-75.
- [28] FORNELL C,JOHNSON M D,ANDERSON E W,et al.The American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dex:Nature,Purpose,and Findings[J].Journal of Marketing,1996,60(4):7-18.
- [29] ZEITHAML V A.Consumer Perceptions of Price,Quality,and Value:A Means-End Model and Synthesis of Evidence[J].Journal of Marketing,1988,52(3):2-22.
- [30] 齐向华.图书馆用户感知价值对满意度和忠诚度的影响路径分析[J].图书馆,2021(6):72-79,86.
- [31] 孙静,栗慧.用户感知的服务质量评价模式:以用户为中心的图书馆服务质量评价[J].图书情报工作,2005(11):107-111.
- [32] 刘冰,张文珏.基于用户视角的网络健康信息服务质量评价体系构建研究[J].情报科学,2019(12):40-46.
- [33] 邓胜利,赵海平.用户视角下网络健康信息质量评价标准框架构建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7,61(21):30-39.
- [34] 温国强.图书馆提高读者忠诚度的策略[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4(6):80-83.
- [35] 刘锦源,曹树金,张莉.图书馆服务忠诚测度与实证[J].图书情报工作,2013,57(7):13-17.
- [36] 沈健.图书馆读者抱怨行为研究[J].图书情报知识,2005(5):102-104.
- [37] CHIN W W.Issues and Opinion 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J].MIS Quarterly,1998,22(1):1.
- [38] LAM L W.Impact of competitiveness on salespeople's commitment and performance[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12,65(9):1328-1334.
- [39] 王红.环境质量视角的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满意度影响因子研究[J].情报科学,2017,35(4):109-113,132.
- [40] 中国政府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EB/OL].[2021-12-10].http://www.npc.gov.cn/zgrdw/npc/xinwen/2017-11/04/content_2031427.htm.

作者简介: 倪伟宸,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图书情报专业202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健康信息服务。

收稿日期: 2022-04-13

本文责编: 李芳

· 探索与创新 ·

设计思维在新型公共图书馆建设中的应用研究

——以东莞图书馆为例

王金丽

(东莞图书馆 广东东莞 523071)

摘要: 文章以案例分析法,按照设计思维“灵感、构思、迭代”等的思维方式,对设计思维在新型公共图书馆建设中的实际应用做详细分析,归纳其应用特点,指出当下我国新型公共图书馆建设存在“设计思维理论普及不够广泛、专业人员匮乏,实际应用不够深入”等问题,提出“加强设计思维理念普及和实际应用、保持充分的耐心及开放度,根据实际情况做本土化调整”等解决措施,实现新型公共图书馆创新发展的目标。。

关键词: 设计思维; 新型公共图书馆; 创新发展

中图分类号: G258.2

文献标识码: A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Design Think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Type Public Libraries: Taking Dongguan Library as an Example

Abstract Guided by the design principle of "inspiration, conception and iteration", the article analyzes in detail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design think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libraries through a case study. The article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ts application and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libraries in China, for example, the theory of design thinking is not widely popularized, there is a lack of professionals, and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is not thorough enough. Finally, the article proposes solutions such as strengthening the popularization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design thinking concepts, maintaining sufficient patience and openness, and making localized adjustments accordingly. Our goal is to achiev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public libraries..

Key words design thinking; new-type public library; innovative development

1 引言

随着大数据、区块链、5G等新型技术层出不穷地出现,深刻影响着各行各业的发展,传统行业更是面临着极大的转型危机。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给包括图书馆在内的诸多文化服务行业带来了更多、更紧迫的问题。设计思维(Design Thinking)作为典型的创新思维模式,以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被诸多行业认可并借鉴应用,大大提高了客户认可度,有效提升了服务质量和效能。

2 设计思维与图书馆

2.1 设计思维

“设计思维”最初发源于设计领域,主要发展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哈佛大学设计学院教授 ROWE出版的《设计思维》首次使用了这个概念^[1]。进入21世纪,此概念被广泛应用于商业、教育等各领域的、以用户为中心的产品和服务设计中,为解决具体问题提供实用而创新的思路 and 方案。斯坦福大学设计学院(Stanford University School of Design)将

设计思维归纳为一套科学的、可复制的工作流程,主要包括五个步骤:构建同理心(empathy)、定义问题(define)、构思创意(ideate)、制作原型(prototype)、实际测试(test)^[2]。

在图书馆领域,2018年由盖茨基金会全球图书馆计划资助,委托以设计思维在商业领域和教育领域的推广而著称的设计咨询公司IDEO领衔,与美国芝加哥公共图书馆和丹麦奥尔胡斯公共图书馆合作,基于10个国家超过40位优秀图书馆管理员的实践经验,开发而成了*Design Thinking for Libraries*一书,其涵盖了设计思维三个主要步骤:灵感、构思和迭代^[3]。2016年,广州图书馆将全书翻译成了中文《图书馆中的设计思维》一书,自此为这一工具在国内图书馆界传播和应用提供了一份详实的中文工具书。

2.2 设计思维在国内图书馆中的发展

目前,国外诸多图书馆已经对该理念有着较成熟的应用。国内来说,学者王炼、武夷山最早于2007年提出要借鉴设计学理念和方法促进国内情报学的研究与创新^[4];2014年后,设计学相关理念与思维得到图书馆界更多关注和讨论,但主要集中在对国外图书馆的经验介绍及借鉴。近几年,相关讨论逐渐转移到国内图书馆对这一理念的实践应用中。盛卿(2016年)详细介绍了设计思维理论及其在国外图书馆中的应用,可为本土化给予一定参考,提出除了基本的业务之外,还应增加一些基于新图景的图书馆设计思维探讨,进而帮助图书馆工作者立足发展视角来更好地审视、把握当下局势^[5]。陈信和柯平(2019年)从图书馆的服务、活动、文献资源和内部空间设计等方面考察了设计思维在国外图书馆应用的案例,提出对国内图书馆的启示^[6]。陈超(2018年)提出在以阅读为核心的基础上,用设计思维的方式推进公共图书馆建设、用连接的思想战略多范围、多维度的融合发展^[7]。王韧(2019年)简单分析了设计思维的概念和理念及其与图书馆的关系,结合上海图书馆的工作实际,从建筑空间的互融设计、内部空间的功能设计探讨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8]。蒋莹(2019年)提出基于设计思维的公共图书馆创客教育模式,重点对该模式的架构和流程进行研究,并以广州图书馆为例,梳理总结创客教育的具体实施方式^[9]。邵雪(2020年)从设计思维内涵、必要性、环境、时机、主客体和策略六个角度进行了分析,提出如何应用设计思维^[10]。陈欣(2020

年)梳理设计思维应用于国外公共图书馆的现有研究和典型实践,并以广州图书馆创客空间设计思维应用实践为案例,提出公共图书馆可以从四方面开展设计思维的学习和应用:加强实践应用、建立设计思维团队、加强馆际交流和资源共享,建立图书馆设计思维联盟等^[11]。

2.3 研究意义

根据目前研究可以发现,设计思维在国内图书馆界的应用还处于较初级的阶段,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真正落地层面,这一工具都未得到大力普及,还需更多本土化的探讨,尤其是新的时代环境下,我国公共图书馆发展面临的宏观环境及问题都更加复杂化、棘手化,技术层面、政策层面以及经济层面等都会对这一工具的应用产生影响。设计思维作为一种典型的创新思维模式,是解决现实问题、提升服务质量的有效工具,因此进一步梳理设计思维在图书馆领域本土化应用方面存在的问题,讨论和思考如何更好地应用这一方法,不仅是培养图书馆创新思维模式、促进图书馆高质量发展及转型的需要,更是提升读者文化获得感、幸福感的需要,对新型公共图书馆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3 设计思维在新型公共图书馆建设中的应用

3.1 项目背景

东莞图书馆位于东莞市南城街道中心广场内,是东莞文化新城的一座标志性文化设施之一,目前,东莞图书馆已成为东莞市的一座中心馆,除了为广大市民提供读者服务外,还为全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发展提供相应支撑。

随着东莞市民生活文化水平的提高,广大读者对东莞图书馆的服务需求也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更多现代化、多元化的需求越来越被人们需要;同时,随着全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和深化,馆际图书借阅量与日俱增,对文献通借通还的要求越来越高,需要更好的图书物流体系来保证全市图书通借通还服务的正常运行。而当下,全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面临着严重的藏书空间不足的问题,不仅影响全市图书通借通还的效率,还大大限制了为全市读者服务的成效,因此,一座为全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提供更多支撑、可满足读者更多需求的新型公共图书馆就

显得尤为重要,其中,主体建筑的建设是基础,既迫在眉睫又任重道远。于是,2016年,东莞图书馆开始筹划新馆建设,所用引导工具即是设计思维。

3.2 灵感及构思阶段

灵感阶段是整个项目的基础,复杂、耗时但又无比重要,包括定位目标用户群体、挖掘存在的问题、找出局限条件、探索研究方法等。(1)确定目标用户群。东莞图书馆作为全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中心馆,在自身做好服务市民的同时,对全市各镇街基层馆具有指导、服务的义务,因此此次的目标用户群体,除了广大市民外,还有全市33个镇(街、园区)基层馆。(2)找出问题。按《东莞市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全市人均图书藏书量需达1.6册以上”的相关要求,目前东莞市人均藏书量还有较大差距,因此在未来几年,全市体系的藏书量将有较大提高,而按目前藏书空间已经不足的情况来看,未来则会更加严峻,因此,需要一座调剂性书库,来解决藏书问题。(3)局限条件的应对。确定了挑战任务后,接下来要考虑的是所面临的环境和局限性。该项目属于大型工程项目,因此资金预算、土地选择、团队构建及时间安排等方面,均是局限性条件,需要花费大量精力进行协调跟进。(4)探索研究方法。在研究阶段,需要规划并落实调查研究工作,以便更好地理解用户和问题,这些研究能够帮助我们获得新的见解,并得出新的创意。在推动调剂书库项目建设中,主要运用了如下方法:类比体验、沉浸式体验、建立专题影集、用户访谈、专家访谈、观察法等。例如,对本馆及全市体系的藏书情况做详细调查。先后参观了东莞图书馆书库、辅助书库及各镇街书库的藏书空间,用图片记录当下阶段藏书空间情况的同时,也对主要负责人以访谈的形式进一步了解藏书空间情况,并且与东莞图书馆馆内负责各镇街分馆发展的部门进行对接,详细了解全市体系各镇街馆的藏书情况、日常服务情况及管理情况等,进一步用数据表明目前全市基层馆服务的主要障碍之一:人均藏书量亟需增加,藏书空间亟需增大。

构思阶段是将研究工作转化成可行的见解,奠定有形设计的基础。在前期灵感阶段基础上,确定了目标用户群体、存在的问题、局限的条件以及研究方法等,根据这些梳理,经多次研究讨论,东莞图书馆将项目定位为“东莞图书馆调剂书库——东莞市图书

智能流转中心项目”,形成了《东莞图书馆调剂书库项目调研报告》,对项目的背景、必要性、可行性等方面做了初步研究。随后,又与深圳华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合作,经缜密测算,形成了《东莞图书馆调剂书库——东莞市图书智能流转中心项目建议书》,明确了项目定位、规模、场址、预算、建筑设计方案及专业设备等。如此,将研究工作转化成了可行性方案。

3.3 迭代阶段

迭代阶段就是要选定想法,并根据用户的反馈意见来对想法进行完善。在这一阶段中,原型设计将被放到现实世界中,不断收集各方的反馈意见并进一步完善相关概念。设计思考方法不是完全线性的,所以会发现要时不时转回之前的阶段才能继续发展完善自己的创意、经验和观点,同时为下一步设计打造更坚实的基础。在这一阶段中,将耗费大量的时间,需要多次思考自己的概念,之后才能对这些想法予以全面地扩展落实。

东莞图书馆调剂书库项目,获取用户的反馈意见情况如下:根据项目审批流程,在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支持下,组织财政局、国土局、规划局、环保局、水务局、住建局、城建局、人防办以及部分镇政府等职能部门参加“东莞图书馆调剂书库——东莞市图书智能流转中心项目建议书专家评审会”,大部分与会专家对项目建议书的可行性给予了肯定,提出了相应修改意见及项目完善措施。

然而,2019年东莞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以‘一心两轴三片区’为重点抓手,进一步提升中心城区首位度,强化集聚发展和辐射带动能力。”^[12]行政文化中心城区是东莞的“城市心脏”,因此在此次规划中,将以“面向未来,以人为本”的理念,打造人居环境品质提升的首个示范项,东莞图书馆作为行政文化中心区的重要文化设施之一,也在此次规划之列。2018年东莞迈入“湾区都市、品质东莞”发展阶段。为促进新阶段建设,2019年,东莞市委市政府提出“湾区都市、品质东莞”城市品质提升工程,2020年又提出“加快提升城市形象和城市品质,着力打造高品质现代化都市”策略。“一心两轴三片区”工程作为品质工程重要内容之一,东莞图书馆的发展方向更需要以高品质为目标,这不仅是行业发展的需要,也是整个城市的实质需求。

因此,为配合此次政府工程,也为了更顺利地推

进“东莞图书馆调剂书库”项目,在项目迭代阶段需要思考的因素将更加复杂,不再单单是最初提出的“为全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提供更多支撑、满足读者更多需求”。

3.4 再次构思阶段

政府在“面向未来,以人为本”服务理念指引下,促进东莞图书馆以更品质服务整个城市,东莞图书馆对之前的项目概念、具体目标及相应实施策略等进行多方面的复盘、迭代,再次明确相关问题,找出局限条件的应对方法,给予新的研究策略,重新构思整个项目:(1)明确项目实施主体发生改变。建新馆舍是行政文化中心区域升级改造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一项政府工程,主要由东莞市中心城区“一心两轴三片区”建设总指挥部和现场指挥部推动项目建设,因此该项目建设将是一个多方参与的过程:政府主导、指挥部实施、图书馆参与。指挥部将按照市府的部署进行整体规划,拟定计划书,图书馆则发挥自身专业优势,依据读者需求及全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发展需要,设定新馆的功能定位及发展目标。(2)明确项目场址发生改变。在原“东莞图书馆调剂书库——东莞市图书智能流转中心项目”(以下简称“项目”)中,囿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将馆址定在了某镇街处,但是结合现在的实际情况,需将地址选定在现有馆址旁边,如此才能实现“满足全市体系的发展需要,为市民提供更好的服务,打造一座高品质的文化地标”。

(3)明确新旧馆舍需要同步改造实施。现东莞图书馆已服务市民十余载,馆内部分功能区及设施设备已经陈旧,如果在其周边只进行单纯的新馆建设,难免出现新旧难以兼容的情况,因此,为充分激活现有馆舍内的设施设备,和谐划分各功能区域,促进新旧馆舍及周围环境更加和谐统一,需要在新建馆舍的同时,同步对现有馆舍进行改造升级。(4)明确项目名称发生改变。原项目是计划建设独立的馆舍,且与现有场馆距离较远,因此将其命名为“东莞图书馆第二图书馆”,现在计划在现有馆舍周边进行扩建,并且有了新的目标定位,因此为更加精准地契合当下的建设情况,经讨论,将项目名更改为“东莞图书馆二期工程”。(5)明确目标用户群体发生改变。在原项目中,目标群体主要是对各镇街基层馆提供服务支撑,同时开放部分空间提供读者服务,即目标群体主要是镇街基层馆及读者两个定位,现在则需要扩大到政府、读

者和镇街基层馆三个定位。相应地,有了三个明确的需求:镇街基层馆的需求不变,仍然是亟需扩大藏书空间、增加人均藏书量;读者需求的定位要进一步提升高度,得到更高品质更多元化、现代化的服务;以市政府此次对文化中心广场升级改造的思路为指引,有效结合图书馆现有发展情况及行业特点,着力打造城市的文化地标。

引导合题的反馈,属于再次构思阶段中的一环,即新的构思完成后,需要再次针对不同目标群体,进行意见征集及交流。东莞图书馆调剂书库项目经再次构思后,目标群体已由原来的两个转至三个,因此,需要再次引导三个目标群体的合题反馈。(1)对于读者群体。为更好地征集读者对新馆建设的意见和建议,东莞图书馆先是推出“你好,未来——想象一个新的图书馆”展览服务,向其全面普及国内外图书馆新馆建设及发展的最新情况。展览选取了国内外近年来新建的图书馆,包括赫尔辛基颂歌图书馆、奥斯陆新公共图书馆、太原市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东馆、深圳第二图书馆等共计12个图书馆,从建筑形态、空间布局、功能分区等方面,向读者详细介绍各图书馆空间再造的总体情况,同时,展览处特别设置了留言区,并安排专人,每天负责收集、整理留言。对于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将整理后以备供后期采纳。(2)对于图书馆馆员。为促进全体员工对国际优秀图书馆建筑及运营案例的了解,邀请国际图联(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 IFLA)图书馆建筑与设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张甲先生来馆交流,作“体现公共图书馆服务精神的空間设计”讲座,并于讲座结束后,及时向员工开展“图书馆新馆建设工作建议征集”活动,活动持续一月有余,共有87位员工参与,收到建议250余条,由业务研究委员会对建议进行初步评审。(3)对于咨询公司。为更好地了解文化工程项目建设的专业情况,吸取相关经验,东莞图书馆先后3次召开项目前期交流会,向经验丰富、资质较深的咨询公司进行项目咨询,如悉尼澳洲绿色广场图书馆项目、诺丁汉大学乔治绿色图书馆项目、可莫瑞克大学克提斯曼图书馆项目、苏州第二图书馆及深圳第二图书馆项目、深圳书城湾区项目、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地下空间规划项目、香港西九龙文化区地下空间设计项目、广州塔南广场及地下空间建设设计项目等,以充分了解类似情况的新型公

共文化服务空间形态、功能区域划分及实现方式、项目实际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及书库承载、建筑消防、工程造价等具体内容。(4)对于指挥部(东莞市政府)。积极与指挥部工作组保持密切联系,对于指挥部反馈的各阶段的关于图书馆二期工程的规划方案进行详细研讨,及时提出图书馆方面专业的意见和建议,同时,图书馆将自身调研、收集的情况及时反馈给指挥部。在这个过程中,与传统设计思维方式不同的是,图书馆不仅是设计思维的甲方,同时也是乙方,通过交流、沟通,与指挥部双方力争将项目建设的思路更加拓宽,以满足多方目标群体的需求。

反馈意见的糅合,是引导合题反馈后面的一个环节,即从不同用户收来的信息可能互相矛盾,或者无法与目标达成一致,我们需要对这些意见和建议进行筛选,并确定下一步迭代工作中需要整合哪些内容。东莞图书馆与广州市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合作,对各方意见和建议进行系统梳理,糅合多方信息,在原来项目建议书基础上进行重新构思,已进入可制定“项目建议书”阶段。在这个迭代的过程中,项目可能会朝着之前不曾预期的方向前进,但在设计思维这一工具运用下,可以推动项目顺利实施。

4 设计思维在东莞图书馆新馆建设中的应用特点

东莞图书馆在应用设计思维推进新馆建设的过程中,遵照设计思维方法模式的同时,也根据实际情况作了些许调整,本次应用有其自身特点及方法。

4.1 时间历程较长,难以短时间内迭代

此次设计思维应用的时间历程较长,且期间难以短时间内迭代。东莞图书馆新馆建设属于政府工程,政策性较强且时间跨度大,自2016年《东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东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的通知》正式发布之时,“建设全市性调剂书库”已经纳入全市“十三五”发展规划中^[13];此后《东莞市城市品质三年提升计划重点领域行动方案》(征求意见稿)中,也提出筹建一批新的公共文化设施,东莞图书馆调剂书库也在之列;2020年,《中共东莞市委关于制定东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再次明确将加快“东莞第二图书馆”建设纳入“实施重大文化设施建设提速提质工程”之列^[14]。因此,东

莞图书馆二期工程项目前后跨期5年,自始至终都有市政府的相关政策做推动支持,因此在应用设计思维这一工具时,期间,若发现某一环节存在问题,也难以短时间内迭代调整,必须待政府方面的反馈收到后,才能回到流程中的上一步,因此,这一项目特点导致在设计思维时也有局限性。

4.2 目标“用户”具有团体性,且参与程度不一

在设计思维中,用户参与贯穿整个流程始终,具体参与程度与项目规模有很大关系。在此次东莞图书馆二期工程建设中,“用户”身份较为复杂,可按照建设者及被服务者将其划分为两大类,每一类中又包含多个下属用户,因此具有团体性。具体地,建设者有“东莞图书馆自身,东莞市政府及部分地方政府,图书馆上级领导单位及住建局、城建局、财政局等提供支持服务的职能单位,项目施工方及委托项目建设的第三方”;被服务者有“普通读者和东莞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中的‘各镇街基层馆’”^①。相比较于日常开展的读者活动,在运用设计思维时,应是项目服务者参与度较高,但是囿于此项目的规模及复杂性,服务者参与度是相对偏低的。期间,尽管东莞图书馆通过访谈、留言及建议征集等系列方式来提高被服务者的参与度,但是与前者相比,参与度仍然偏低。

4.3 依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应用方式

在设计思维推动东莞图书馆二期工程过程中,基本遵循其核心思想“灵感期——构思期——迭代期”,但在跟进每一个阶段时,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做了相应调整。

头脑风暴阶段是构思环节的一环,在设计思维原概念中,整个环节都步伐紧凑且充满活力,并且通常以“热图”的形式来选择创意。但是在东莞图书馆二期工程建设中,主要是通过意见征集、读者留言等方式,并且用了较长的时间跨度来尽可能多地收集用户的意见和建议,并对意见和建议做了初步梳理提炼后再反馈给项目实施第三方,因此与工具书中推荐的“头脑风暴”的方式有相应区别。

模型设计阶段,又叫原型设计阶段,是设计思维的环节之一,在这一阶段中,需要将顶尖的想法变成现实。东莞图书馆二期工程,在呈现具体项目成效的环节,主要委托第三方以项目规划书的形式进行呈现,而项目规划书是否可行,又主要以专家评审会的形式进行评审,因此就不便以实体模型反馈给用户

(普通读者和公共图书馆体系成员),这一点也与设计思维原概念中的有所区别。

5 设计思维在我国公共图书馆领域应用方面存在的问题

设计思维进入我国公共图书馆领域时间较短,无论理论推广还是实践应用上,都还有很多待努力的地方。2019年,广州图书馆举办了第一届“图书馆中的设计思维”培训班,从当时培训班的师资力量、参与培训人员、培训内容及时长等情况可进一步验证国内图书馆界对这一工具的了解还处在初级阶段。培训班情况具体如下^②。

(1) 师资力量:此次共邀请在设计思维领域有较深实践经验及理论研究的嘉宾共21人,国外9人,国内12人。国外9人中,有8人是公共图书馆馆长或相关部门重要负责人,1名是信息学院终身教授;国内有2名公共图书馆馆长、6名设计思维工作坊资深专家及4名相关设计从业者。

(2) 学员情况:举办方在培训之初,特意提出建议“每个图书馆派出1名正(副)馆长及1—2名业务骨干(中层干部)参加此次研修班”。因此,在59名参与此次培训班的学员中,有馆长(副馆长)16人、部门主任(副主任、负责人)21人、馆员(核心骨干)22人,分别占总人数27.12%、35.59%和37.29%,共来自全国各地12个省份、17个城市。

(3) 培训内容:首先按照设计思维4个阶段的核心内容“灵感——构思——迭代——扩展”,培训班以理论讲授和实践操作的模式对每一部分内容进行详细培训;然后,以专家报告形式对国内外的相关案例进行分享;最后,邀请国内部分图书馆馆长为代表对设计思维本土化实践做深入探讨。

(4) 培训时长:此次培训共计6天,实际参与培训4天,平均每天培训7小时左右。

5.1 理论普及不够广泛

广州图书馆举办的第一届“图书馆中的设计思维”培训班,在某种意义上是国内图书馆领域对这一工具进行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面普及,加上其翻译的《图书馆中的设计思维》一书,都对设计思维在国内图书馆领域推广产生重要作用。为了能促进培训效果及后期推广效果最大化,举办方从“邀请的师资

力量”到“建议参加培训的学员”以及“设计的培训内容”等方面,都做了精心考量,也在培训前期做了详细的用户调查,希望能全面了解参与培训的各个图书馆(学员)自身有哪些需求,对设计思维目前的了解程度等,以争取通过此次机会最大化推广这一工具。

5.2 专业人员极其匮乏

从此次培训班中的师资力量可以看出,国内图书馆界中没有专业人才向学员授课,在设计思维领域方面的人才相对匮乏。邀请的6名设计思维工作坊专家中,有3名华东师范大学开放教育学院教师和1名东华大学管理学院教师。前者开设了“设计思维工作坊项目”,探寻“设计思维”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与实践;后者开设了“创新设计思维工作室”,面向全校学生开设创新设计思维工作坊,都属于国内普及应用设计思维工具的领先者。

5.3 实际应用不够深入

因对这一工具的基础了解不够,实际应用就无从谈起。据了解,参与此次培训之前,在以往服务中应用过设计思维的图书馆寥寥无几。运用设计思维方法,解决图书馆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是一个长期过程,不仅可以应用在大型建筑设计中,在日常服务中更值得推广,更容易促进用户参与。例如,在东莞图书馆二期工程建设中,虽然用户(普通读者和公共图书馆体系成员)前期对项目建设参与度相对较少,但后期则可以多引导他们参与图书馆中的内部建设,如馆内功能区域如何划分,如何在日常活动开展中对活动类型和活动内容献力献策,也可以多引导体系成员馆对新馆的服务情况提出建议,等等。

6 设计思维在新时代新型公共图书馆建设中的应用推广建议

6.1 普及设计思维理念

因国内图书馆界对设计思维的理论认知还未达到普及程度,因此想通过此工具进行创新服务就有一定的限制性。可以以广州图书馆举办的此次培训班为“种子”基础,建议参与此次培训班的学员在自己单位,以理论加实践的方式进行推广。在此次培训班中,东莞图书馆共有3人参与,培训班结束后,东莞图书馆立即面向全体员工组织开展了“图书馆中的设计思维”专场讲座,并将其列入2019年继续教育的课程

学时,首次向员工普及了这一理论知识。此后,又在东莞市公共图书馆体系成员馆之一——松山湖图书馆进行理论加实践的普及,后又以“东莞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研究项目”的形式,促进员工对此做课题研究。因此,这种“种子”模式,是促进图书馆员工了解设计思维方式的重要途径之一。

6.2 加强设计思维实践应用

该理论具有普适性,由宏观到微观,图书馆的各项发展和服务,都适合应用这一工具,其倡导的以人为本的服务和方式,是图书馆长期稳定发展且彰显价值的有效途径。为加强这一应用,图书馆领导者可让各部门或岗位的工作人员从自身业务范畴出发,每季度(每年)提出一个待解决的具体问题,并纳入季度(年度)考核中,考核框架可包括“你聚焦的问题是什么、构建的思路是怎样的、创建的模型及测试方式如何、迭代的次数有多少、最终解决问题的方式相比较最初的设想有何创新、还可以扩展推广到哪些业务内容”等。如此,以具体实践+考核激励的方式,促进设计思维在图书馆中的应用,不仅可提高员工与员工、员工与读者、读者与读者间的多向参与度,也会将多向关系及思维有效融合,进而提升整体服务成效,实现图书馆的创新、高品质发展。

6.3 以人为本,保持充分的耐心及开放度

设计思维有着固定的方法步骤,灵感、构思、迭代是其核心阶段,在固定的方法步骤中,核心思想均是以人为本,保持同理心,从用户角度出发,无论当下处于哪个阶段,这一理念都不可丢弃,因此,作为设

计者要始终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及开放的环境,用较高的开放度容纳外界更多的意见和建议,进而促进最初的想法走向深入,真正呈现以人为本的效果。在整个优化过程中,结果不是一蹴而就的,可能需要多次迭代,就有着较长的时间跨度,工作成效也不会立竿见影,因此,要保持充分的耐心,始终以积极开放的心态,以以人为本的理念促进项目进展,避免急功近利和以结果为导向。

6.4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本土化调整

设计思维方法步骤比较明确,也适用于任何形式的服务,但是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在遵照大的核心思想、方法的前提下,可根据具体的环境特点、项目特点及服务内容做适当的调整。例如东莞图书馆二期工程的建筑体建设,在头脑风暴阶段,就不适合选用节奏紧凑、以期短时间内收集到疯狂设想的方式,毕竟新馆建设是为读者使用的,则必须要充分接受广大读者的需求和建议,因此该方式适当的调整为“以意见征集、读者留言等形式,并且延长意见征集的时间来尽可能多地收集读者的意见和建议”;若换做另一种问题“如何让自习室的环境布置更具舒适性”,该问题相比较工程建设则小了很多,是适合召集部分有代表性的读者短时内头脑风暴完成的。因此,这里的本土化,不仅是由国外至国内的地域本土化,还是根据项目实际特点对这一思维应用方式的调整,如果始终拘泥固执于某一环节或某一方式方法,不仅不会实现“以人为本”、创新服务,还会对原本就有的成效大打折扣,也有悖于“设计思维”的初衷。

注释:

- ① 按最初的项目定位来划分。
- ② 资料来源于“图书馆中的设计思维”高级研修班培训手册。

参考文献:

- [1] ROWE P.Design thinking[M].Cambridge,MA:MIT Press,1987.
- [2] D.school:Institute of design at stanford[EB/OL].[2021-10-14].<http://dschool.stanford.edu/>.
- [3] IEDO公司.图书馆中的设计思维[M].广州图书馆,译.广州:广州出版社,2016:1.
- [4] 王炼,武夷山.情报研究的设计学视角[J].情报理论与实践,2007(3):289-291.
- [5] 盛卿.设计思维在图书馆中的应用——基于美国IDEO《面向图书馆的设计思维》[J].图书馆论坛,2016,36(9):63-70.
- [6] 陈信,柯平.设计思维在图书馆应用研究[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9(5):37-41.

(下转第60页)

基于 4C 营销模型的公共图书馆古籍文创产品推广研究

冯 耕

(河南省图书馆 河南郑州 450052)

摘 要: 文章将4C营销模型作为理论依据,在分析我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创产品推广现状与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兼具可行性与可操作性的古籍文创推广创新路径:构建覆盖业内外主体的多级联动机制,增强公共图书馆古籍文创开发整体实力;开展基于专业人员和数字文创的成本管理,降低公共图书馆古籍文创推广综合成本;打造支持全息交互的古籍文创产品,为用户带来沉浸式互动体验;创建以全场景渠道与品牌化渠道为核心的推广渠道网络,强化古籍文创产品传播力。

关键词: 古籍; 文创产品; 4C营销模型; 公共图书馆

中图分类号: G258.2; G255.1

文献标识码: A

Research on the Promotio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of Ancient Books in Public Libraries Based on the 4C Marketing Model

Abstract The article takes the 4C marketing model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oposes a feasible and operable innovation path for the promotion of antique books and cultural creation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the promotion of such products in public libraries in China. We must build a multi-level linkage mechanism cover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tities to enhance the overall strength of public librar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tiquarian literature. We also need to carry out cost management of digital creative products with the professional talent to reduce the comprehensive cost of the promotion in public libraries. We also aim to create holographic interaction-supporting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based on ancient books to bring an immersive and interactive experience to users. Finally, we need to identify promotion channels with a full-scene view and branding ideas as the core to strengthen the communication power of ancient book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Key words ancient book;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4C marketing model; public library

1 引言

古籍文创是一类立足于古籍文献优质IP,通过创意加工手法进行形象化表达的文化产品。其具有极强的知识性、观赏性与教育性,可助推古籍资源在全社会普及传播^[1]。202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重点强调,公共文化机构应加大古籍大众化传播力度,做好古籍文献抢救保护与发掘利用工作,通过开发贴近生活并彰显时代特色的古籍文创产品,让

古籍“典”亮世界^[2]。公共图书馆作为古籍保护的重要主体,近年来十分注重发挥古籍文创在推广古籍文化、挖掘古籍内涵中的作用,不仅依托自身古籍馆藏优势开发可满足受众文化需求的古籍文创精品,而且打造了覆盖上游研发设计、中游内容编创与下游营销传播的古籍文创产品推广生态系统,使古籍文创真正成为古籍传承性保护的关键抓手,有力推动了公共图书馆实现多元化发展。

现阶段学术界侧重于从主体、内容、渠道三个方面探讨公共图书馆古籍文创产品推广的理论问题。冯国军^[3]认为,公共图书馆应秉承跨界协作思路,与其

他古籍保护单位一道谋划古籍文创产品的创意定位与设计方法。张彦希^[4]指出,公共图书馆古籍文创主要以实物类产品为主,馆方应基于物质属性与文化属性视角开发可刺激用户使用意愿的体验型产品。乔娜等人^[5]对我国国家一级公共图书馆古籍文创产品推广现状进行分析后发现,实体店面宣传、展会宣传与自媒体宣传是公共图书馆古籍文创营销的主流渠道。从业内实践来看,湖北省图书馆推出了《湖北省图书馆十大馆藏字画》高仿组盒装,在深入挖掘《齐白石八仙寿字图》《张成嘉陵江图卷》《彭玉麟红梅图轴》等馆藏古旧字画的IP资源基础上,采取意向性表达、趣味化图形、功能性设计等手法,呈现古籍文献的审美意蕴与文化内涵^[6]。江西省图书馆将古籍文创产品作为红色文化推广的载体,应用人体感应、虚拟现实技术开发出一批具有教育意义的数字化红色文创,显著提高了用户对于馆藏红色典籍的关注度^[7]。但需要明确的是,现有研究的视角多聚焦于古籍文创推广的局部环节,较少从全产业链角度理清古籍文创产品推广运营思路。基于这一考虑,本文依据4C营销模型的理论主张,提出旨在增强公共图书馆古籍文创推广主体供给能力、成本管理能力和用户交互能力与渠道建设能力的可行策略。

2 公共图书馆古籍文创产品推广现状

2.1 开发以用户需求为基础的定制化古籍文创

为拉近古籍文创与用户间的情感距离,现阶段公共图书馆十分注重加强用户需求分析工作,将用户画像作为古籍文创产品推广的必要前提。第一,精准锁定用户分众化需求,即借助用户画像手段全面分析各类型用户需求偏好,据此做好目标客户定位。如吉林省图书馆对用户群体进行基于年龄、学历、收入的聚类分析,并建立了古籍文创产品用户需求数据库,以便可视化分析受众对于古籍文创的一般性需求与选择性需求^[8]。第二,开发契合用户需求的古籍文创。如辽宁省图书馆将用户纳入古籍文创开发主体范围,聘请优质用户作为古籍文创设计咨询人员,允许用户利用馆内文献资源与技术资源制作古籍文创产品^[9]。

2.2 举办类型各异的古籍文创产品推广活动

第一,举办旨在宣传古籍文化的古籍文创主题展,即在线下大型场馆发起古籍文创产品巡展活动,

让用户能够一站式体验古籍文创深层价值。如河南省图书馆以孔子诞辰日、黄帝陵公祭日等文化节日为契机,举办“古籍文创产品推介展”活动,在活动现场还邀请文化名家宣讲古籍文创背后故事^[10]。第二,依托表演秀活动增强用户对古籍文创的情感认同,即让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现场展示古籍文创制作技艺,据此引发用户的情感共鸣与价值共鸣。如首都图书馆举办的“北京礼物”古籍文创展演活动,便向受众直观展示古籍文创加工的技术细节,并鼓励用户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协作开发古籍文创产品^[11]。第三,利用古籍文创游学项目引导用户主动探寻古籍文化基因。如福建省图书馆推出了“游读福州鳌峰书院”活动,用户可依据“游读卷”古籍文创提供的游学路线,观赏福州书院坊巷文化景点,获得边游览边学习的古籍文创新体验^[12]。

2.3 注重古籍文创艺术性与实用性的有机统一

目前我国公共图书馆设计的古籍文创产品均可有效兼顾外观与性能,通过实用美观的古籍文创提高用户感知价值。如山西省图书馆从内容矩阵角度制作了古籍文创文具礼盒:线装笔记本和纸质文件夹的封面复刻了馆藏古籍《西夏文佛经扉画》中的部分内容;纯铜书签的形状为“线鱼尾”古籍版心花纹;便利贴腰封和文创胶带均印有山西民间木版画^[13]。此举真正打通了古籍文创意境与物境间的内在联系。又如四川省图书馆秉承可持续利用原则,立足于馆藏古籍文献的零页残片开发了“片羽存真”系列书签文创与树脂挂件。用户可从古籍残片词句中感受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进而提振其对古籍文创产品的消费意愿^[14]。

3 公共图书馆古籍文创产品推广的主要问题

3.1 疏于与各类主体联合开发古籍文创

第一,较少与兄弟馆联合开发古籍文创。古籍文创开发是一项较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公共图书馆具有相应的人才储备与文献储备,更需要通过馆际间的相互交流来激发文创创意。但目前我国公共图书馆大多是各自为政,较少开展古籍文创资源共建共享工作。虽然国家图书馆在2017年牵头组建了“全国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联盟”,但成员仅局限于拥有文创试点单位资质的公共图书馆,短时间内难以改变古籍文创开发资源分散、品牌效应不强的现状。第

二,不善于借助第三方力量的比较优势。田田^[15]指出,与社会第三方主体开展跨界合作,是提升公共图书馆古籍文创开发供给能力的可靠手段。但目前我国公共图书馆并未与业内文化机构、文创企业、行业协会建立常态化合作交流机制。

3.2 古籍文创产品的开发成本居高不下

第一,古籍文创设计成本较高。导致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公共图书馆普遍缺乏文创设计高端人才,因此馆方只能采用委托代理方式依靠专业机构进行古籍文创研发设计。由于此类机构很难精准把握古籍文献精髓,或将使古籍文创成为流于形式的现象级产品,从而降低古籍文创设计投入产出效率。第二,古籍文创生产成本攀升。该问题的核心诱因是古籍文创表现形式多以实物为主,较少通过融合视频、音频、图像、3D模型的数字文创智能化表达古籍文化内涵。

3.3 古籍文创产品的用户交互深度较差

第一,古籍文创的用户交互渠道过窄。目前我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创的用户交互方法主要为视觉平面交互,即对二维视觉符号进行概括、变形、重组并在其中融入几何元素,使古籍文创具有丰富的视觉形象,据此让用户产生共情心理。但视觉平面交互的丰富性和层次性极为有限,其很难有效维护用户体验,并可能引发产品同质化问题。第二,不注重用户的体验反馈。现阶段公共图书馆古籍文创产品推广并未形成闭环管理,馆方不仅较少主动跟踪分析用户体验与产品口碑,而且也鲜见于结合用户反馈及时弥补古籍文创产品的不足之处。

3.4 立体化古籍文创推广体系尚未形成

第一,线上线下推广渠道的协同度不高。如,部分公共图书馆过于依赖线下推广渠道,试图通过开辟古籍文创展示空间、古籍文创艺术品商店与古籍文创线下专区,让用户面对面感受古籍文化魅力。但此类渠道的用户覆盖面与穿透力存在先天不足,或将制约馆方古籍文创推广效能。另外,线上渠道建设迟缓且未与线下渠道形成工作合力,亦是影响公共图书馆古籍推广绩效的主要因素。第二,忽略品牌推广的重要性。塑造具有良好口碑和信誉的古籍文创品牌,是公共馆吸引用户关注的有效手段。但目前我国大多数公共馆不善于借助品牌营销策略烘托古籍文创产品价值,且现有的古籍文创品牌定位与品牌形象较为模糊。

4 4C 营销模型视域下公共图书馆古籍文创产品推广创新路径

4C营销模型是美国管理学家罗伯特·劳特朋在1990年提出的一类营销管理理论,该模型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系统分析了对市场营销活动起决定性作用的变量因素。(1)用户服务能力(Customer)。4C营销模型认为,营销主体应在系统辨识用户需求基础上,组建市场营销服务网络体系,据此最大化满足用户预期。(2)营销服务成本(Cost)。该因素全面反映出卖方的生产成本与推广成本,以及用户购买成本。(3)营销互动情况(Convenience)。4C营销模型主张,营销主体应提高产品的开放性与连接性,并打通售前、售中与售后服务间的关联关系,为用户带来便捷性体验。(4)营销推广渠道(Communication)。该因素是4C营销模型的保障条件,营销主体应打造基于全渠道的传播推广矩阵,以提升市场营销活动的经济性与可达性^[16]。本文依据4C营销模型的基本原理,提出具有可行性的公共图书馆古籍文创产品推广创新路径(见图1)。



图1 基于4C营销模型的公共图书馆古籍文创产品推广创新路径

4.1 增强用户服务能力: 创建多主体联动的古籍文创开发机制

该阶段是4C营销模型“用户服务能力”变量的现实投影,其实践方向是充分集聚业内外机构的特色优势,补齐公共图书馆古籍文创开发的能力短板。

第一,与业内机构合作开发联名古籍文创。即与博物馆、文化馆、非遗保护单位、古籍科研院所等机构建立古籍文创开发协作机制,打造全员参与、全程指导的古籍文创研发产业链,使古籍文创既能够集中体现各馆的古籍文献特色IP,又可彰显馆藏古籍的地域文化价值。如,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便联合广东省内国家一级公共图书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及广州市

文化创意行业协会协同开发“岭南图腾”古籍文创产品:公共图书馆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主要负责挖掘明嘉靖刻本《文式》、清稿本《广东贡士录》等地方古籍中的故事IP,广州市文化创意行业协会负责为古籍文创开发提供资金支持与智力支持^[17]。

第二,与业外机构合作开发跨界古籍文创。即借助文创企业在设计理念、生产技术与用户流量等方面的功能优势,跨界开发可感、可用、可亲的人性化古籍文创产品,赋予古籍文创无限的想象力与全新的生命力。湖南图书馆的实践经验值得借鉴^[18]:首先,该馆与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缔结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出了“难得湖图”系列文化体验类古籍文创产品,有效拓展了古籍文创价值链。其次,馆方与湖南广电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共建了“湖图文创艺术中心”,该中心在展示实物文创产品之外,还定期举办讲座、沙龙与嘉宾论坛,内容涉及古籍修复技术、古籍仿真复制等领域。最后,该馆联手中国邮政集团为古籍文创量身定制了限量版明信片,引爆了社会大众集体关注。

第三,设计多机构工作联动保障机制。公共图书馆应从组织、流程、制度等角度,打通与业内外机构协作开发古籍文创的阻滞点,并积极争取上级主管部门的政策支持,为古籍文创一体化开发奠定坚实基础。另外,具备条件的公共图书馆还可尝试采用众包模式来常态化联系业内外机构:在前期,利用权威招投标服务平台发布需求信息,全网征集古籍文创创意思路;在中期,应用事业部制管理手段引导各类机构组建古籍文创开发共同体;在后期,通过专利申请、版权登记等形式及时保护古籍文创知识产权,科学设计古籍文创收益分配机制,保障古籍文创授权开发工作的合规性。

4.2 降低营销服务成本:基于专业人才和数字文创的成本管理

该阶段是4C营销模型“营销服务成本”变量的现实投影,其功能主旨是依托文创领域专业人才与数字文创产品形态,合理管控古籍文创研发成本。

第一,组建专业化的古籍文创开发团队。为解决因人才储备不足导致的古籍文创生产成本持续走高的矛盾,公共图书馆可采用“引进来+走出去”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积极招募拥有古籍文化素养与文创开发设计等知识背景的复合型人才,并加快组建负责古籍文创产品运营的专职机构,通过多元化培训手段持

续提升馆员古籍文创开发的理论与实践素养,据此激活古籍文创产品推广的全要素活力。目前较为可行的做法分为三类:一是选聘古籍研究专家、文创大师、工艺美术专业人员作为兼职馆员,利用其对古籍文化和文创设计独到的见解,开发具有成本优势与核心竞争力的古籍文创产品。二是加强与高校间的合作,通过在职培训、继续教育、行业交流等人才孵化策略,完善馆员在古籍整理、创意设计、市场营销等方面的知识结构,据此提高相关人员古籍文创开发的边际贡献率。三是灵活运用成就激励、能力激励、环境激励、物质激励等激励手段,培养古籍文创开发团队的组织忠诚度,以巩固古籍文创人才安全基础。

第二,借助数字文创形式削减古籍文创生产成本。为扭转实物文创“一家独大”的不良局面,公共图书馆应发挥数字文创的内容呈现、用户交互、全息加工技术优势,对古籍文献IP进行数字化创意转换,确保能够以最低成本大批量生产古籍文创产品。现阶段值得借鉴的经验主要有两种:(1)创建古籍文创APP,让用户参与古籍文创生产过程。如,上海图书馆与“汉仪字库”合作开发了支持用户DIY甲骨文徽章文创产品的微信小程序,用户可在线上任意选择组合甲骨文的字体矢量元素与图形符号元素,自主设计既体现甲骨文文化底蕴又彰显自我个性的专属甲骨文电子徽章^[19]。此举有效降低了馆方古籍文创研发投入成本。(2)开发具有资源链接功能的数字化古籍文创。公共图书馆可从资源开放共享与产品使用率最大化的角度出发,设计集实物摆件、数字媒体、3D动漫、VR游戏等功能于一身的古籍数字文创,让用户通过扫描二维码来快速获取古籍文献全部信息^[20]。

4.3 构建良性互动关系:打造面向全方位交互的古籍文创产品

该阶段是4C营销模型“营销互动情况”变量的现实投影,其价值指向是采用全方位交互设计方法,开发可让用户产生沉浸式、立体化感知体验的古籍文创,推动用户从古籍文创产品“接受者”转变为“传播者”。

第一,以感官交互设计加深用户对古籍文创的印象感知。即着眼于增强用户的听觉、视觉、触觉、味觉与嗅觉体验,综合运用感觉挪移、表象叠加、意向互通等多感官体验设计方法,为用户营造具有通感特征的古籍文化体验氛围。现阶段具有可行性的做法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开发具有较强感官交互体验的

实物类古籍文创,在文创产品的造型设计、色彩设计与构图设计中融入古籍文献IP,实现古籍文创物境、情境和意境的有机整合,为用户带来融合多种感知路径的综合体验。另一类是开发具有全时互动功能的古籍数字文创。公共图书馆可利用增强现实、人工智能、3D全息投影等前沿技术,打造可唤起用户记忆联想与心理共鸣的古籍数字文创,让用户得以沉浸式感受古籍文化的深邃价值^[21]。

第二,以情感交互设计引发用户对古籍文创的记忆共情。即以激发用户的共情心理为出发点,将地域文化与乡愁情感融入古籍文创产品,据此唤起用户对古籍的联想与想象。以无锡市图书馆的“无锡有点儿甜”系列古籍文创为例,其创意来自于馆藏古籍地方志所记载的无锡饮食菜谱,将以甜味著称的锡帮菜作为切入点,设计了嵌入镜箱豆腐、脆皮银鱼、太湖船菜、腐乳汁肉等地方特色菜品造型图案的文创餐具^[22]。这一做法不仅赋予古籍文创深刻的精神内涵与情感寄托,使用户对其蕴含的地域元素、文化价值产生强烈的共情情绪,还可通过创设美食之“景”与乡情之“境”,加强古籍文创与用户的情感连接。

第三,以信息交互设计强化古籍文创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即将数字孪生、柔性穿戴、全息映射等前沿信息技术嵌入古籍文创体验设计,赋予古籍文创社会协作与网络社交等功能,凭借信息化交互模式传递文创产品蕴含的古籍文化内涵。(1)基于微视频的古籍文创信息交互。即以数字艺术品展演方式,在城市CBD(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中央商务区)投放蕴含特定历史文化元素的古籍文创微视频,提升古籍文创信息传播力。例如,烟台图书馆以北宋名画《千里江山图》为素材,推出了旨在宣传长岛列岛的裸眼3D文创《千里山海图》,并在北京王府井的LED广告屏上滚动式播放^[23]。这种具有极强视觉冲击力的古籍文创可在用户心中烙上鲜明的文化信息印记。(2)基于创客空间的古籍文创信息交互。公共图书馆可依托馆内创客空间为用户提供古籍文创设计支持。如允许用户利用3D打印设备制作古籍文创产品模型,在创客空间内举办旨在促进古籍文创设计创意共享的头脑风暴会^[24]。该做法可进一步深化用户对古籍信息的理解认识。

4.4 营造全域推广格局:利用全场景品牌化渠道推广古籍文创

该阶段是4C营销模型“营销推广渠道”变量的现实投影,其现实目标是通过创建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全场景渠道与品牌营销渠道,扩大古籍文创产品的受众影响力。

第一,依托全场景渠道地毯式推广古籍文创。

(1)基于“实体店+电商”的古籍文创推广渠道。即构建涵盖实体店渠道与电商渠道的渠道矩阵,向用户全时全域推送古籍文创产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实践经验具有推广价值^[25]:该馆于2021年7月创办了“国图·津湾文创空间”,将古籍文化作为运营保障,拥有城市书房、数字协作、研学培训、文创售卖等多个功能业态,并在“故纸堆”“唯一艺术”“数藏中国”等文创电商平台开通专属店。此举可为用户带来线上线下全渠道的古籍文创消费体验。(2)基于短视频直播的古籍文创推广渠道。即发挥短视频直播的实时交互、电商带货、用户社交等功能,打通古籍文创产品推广的“最后一公里”。公共图书馆可举办以古籍文创推广为主题的抖音直播活动,鼓励馆员在直播弹幕区与用户实时交流古籍文创产品体验。此时馆方可通过抖音POI(Point of Interest)、抖音购物车、抖音橱窗等电商直播插件高效承接线上线下用户流量,据此形成高黏性的古籍文创产品私域营销体系^[26]。

第二,借助品牌化渠道获得可持续的用户流量。即采用品牌形象塑造策略与品牌内容运营策略,打造具有清晰品牌定位、品牌主张和品牌价值观的古籍文创产品,据此在用户心中建立个性鲜明的价值认知。

(1)借助品牌形象塑造策略为古籍文创产品推广造势。公共图书馆可利用古籍文创理论与实践研究领域专家的流量虹吸效应,打造富有亲和力的古籍文创品牌形象。如安徽省图书馆在营销推广《目莲救母》徽州版画文创产品过程中,便采用小篆字体Logo形式将徽籍非遗大师的联名签名印在其中,从而使古籍文创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迅速蹿升^[27]。(2)借助品牌内容运营策略增强古籍文创产品叙事能力。目前业内普遍的做法是创建以母品牌与子品牌为核心的品牌内容矩阵,通过“母品牌带子品牌、子品牌养母品牌”的母子品牌联动策略,促进用户流量实现自组织增长,以消弭古籍文创品牌和用户体验间的鸿沟^[28]。

5 结语

面向全社会推广古籍文创产品,是古籍大众化传播背景下公共图书馆古籍保护的创新手段。本文以4C营销模型为理论指导,创建了面向提升主体服务能力、降低营销服务成本、拓展文创互动空间、营造全域推广格局的公共图书馆古籍文创产品推广实践路

径。对于才刚开启古籍文创业务的公共图书馆而言,馆方还需利用古籍阅读推广、古籍文旅研学、古籍数字出版等方法赋能古籍文创推广,并规避因过度商业化、娱乐化导致的古籍文创品味低下风险,以改善用户对古籍文创产品的接受效果。

参考文献:

- [1] 黄露.公共图书馆古籍文创产品开发研究:基于我国29家文创试点单位古籍文创产品的调查[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1(5):32-41.
-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EB/OL].[2022-04-18].https://www.ccps.gov.cn/xtt/202204/t20220411_153574.shtml.
- [3] 冯国军.我国文学古籍资源数字化开发现状及启示[J].出版广角,2021(5):39-41.
- [4] 张彦希.国外图书馆古籍文创推广经验及启示[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1,5(27):145-148.
- [5] 乔娜,陈凯.基于馆藏古籍文献资源的公共图书馆文创产品开发策略研究[J].农业图书情报学报,2020,32(11):62-70.
- [6] 朱蓓.从故宫文创实践谈图书馆文创产品的发展策略[J].图书馆研究,2020,50(4):71-76.
- [7] 刘梦璇.文旅融合背景下公共图书馆红色文献阅读推广策略研究[J].图书馆学刊,2021,43(10):1-5.
- [8] 陶功美.图书馆开发文创产品助力阅读推广策略[J].新世纪图书馆,2020(12):42-45.
- [9] 赖璨,陈雅.文旅融合语境下我国图书馆文创品牌创新策略研究[J].图书馆,2020(11):102-108.
- [10] 吴昊.古籍文创产品的开发工作探讨[J].卷宗,2020,10(18):126.
- [11] 周余姣,田晨,武文杰,等.多措并举,异彩纷呈——论古籍传承性保护的实践[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21(7):20-27.
- [12] 吴立安.文化IP视域下公共图书馆文创产品设计开发策略研究[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2(1):44-49,115.
- [13] 龙彦.我国省级公共图书馆古籍资源开放服务现状研究[J].才智,2021(6):174-176.
- [14] 吕月明.新时代图书馆弘扬传统文化的策略讨论[J].兰台内外,2019(28):49-50.
- [15] 田田.清代女性读书图研究与图书馆文创产品开发的现实意义[J].图书馆杂志,2021,40(8):31-38.
- [16] 营销用户视角的4C理论[EB/OL].[2022-04-22].<https://zhuanlan.zhihu.com/p/436712161>.
- [17] 苗宾.新文创视角下图书馆文创产品开发研究[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1(6):98-104.
- [18] 陆思晓,倪焯慧,景欣媛.公共图书馆古籍保护公众宣传现状调研[J].四川图书馆学报,2022(2):9-15.
- [19] 张婷.图书馆数字文创开发:现状、问题与对策[J].图书馆学研究,2020(7):27-33.
- [20] 姜璐,杨娜,王振.公共图书馆数字文创产品开发策略研究[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2(7):75-81.
- [21] 冉华,张楠.文化传承视域下图书馆古籍开发利用探析:以河北省图书馆为例[J].河北科技图苑,2022,35(4):24-28.
- [22] 王菲.阅读服务创新模式下地方古籍文献的开发利用研究[J].河南图书馆学刊,2019,39(9):109-110.
- [23] 张宁,龙乐思,李俊扬.虚拟现实技术视域下阅读中华古籍的优势与方法探索[J].图书馆,2019(6):88-93,105.
- [24] 刘阳.提升古籍的文化生命力、传播力、引导力和影响力[J].出版广角,2022(10):25-29.
- [25] 张明涓.公共图书馆古籍智慧化服务研究[J].数字图书馆论坛,2021(6):62-67.
- [26] 贾娟.短视频古籍推广调查及发展策略[J].图书馆论坛,2020,40(8):131-137.
- [27] 王毅,肖烨烨.公共图书馆文创产品的品牌化建设策略[J].图书馆学研究,2020(5):28,29-37.
- [28] 闫雅婧.跨界融合背景下我国公共图书馆文创产品开发现状与对策研究[D].湖南:湘潭大学,2021.

作者简介:冯耕,河南省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文旅融合。

收稿日期:2022-07-08

本文责编:李芳

“双减”政策背景下公共图书馆协同育人实践与探索

廖晓飞

(绍兴图书馆 浙江绍兴 312000)

摘要: 随着“双减”政策的推出,育人格局发生了巨变,家校社协同育人共同体成为了新时代的要求,馆家校合作也需要探索新的合作方向。文章通过分析“双减”背景下新的育人格局,探究美国公共图书馆在馆校合作育人方面的实践经验,结合绍兴图书馆探索馆家校合作的一些新实践,提出新格局下馆家校合作的六个新方向:积极参与学校拓展课程设计和教学、多维度助力学校开展乡土文化教育、构建与学校共享的馆藏资源平台、加强对学校图书馆(室)运营和教师教学的支持、建设家庭图书馆促进家庭教育作用发挥、建设地方协作教育与学习体系。

关键词: 公共图书馆;协同育人;“双减”政策

中图分类号: G258.2

文献标识码: A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in Public Librar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Abstract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educational pattern. The cooperative educational community of family, school and society has become the requirement of the new era. The cooperation of libraries, families and schools also needs to explore new cooperation directions. By analyzing the new educational patter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reduc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American public libraries in library school cooperative education, and combines some new practices of Shaoxing Library in exploring library, family, school cooperation, and puts forward six new directions of library, family, school cooperation under the new pattern: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the school's expanding curriculum design and teaching, multi-dimensional helping the school to carry out local culture education, building a collection resource platform shared with the school, strengthening the support for school library operation and teachers' teaching, building a family library to promote the role of family education, and building a local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and learning system.

Key words public library;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1 引言

图书馆与现代教育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在“双减”政策背景下,馆校协同育人成为新的趋势。刘爽^[2]认为馆校合作的开展基于素养服务教育、馆校联盟机制的构建之上;周琰莉^[3]提出通过创建互补共赢模式、联合采购、培养阅读推广专业馆员和校园阅读推广人等途径能更好发挥馆校合作在促进

儿童阅读中的作用;叶静^[4]分析了重庆图书馆“快乐阅读体验课”馆校合作项目,认为培养阅读推广人、优化阅读体验模式、完善活动反馈机制是馆校合作阅读推广的有效策略;史拓^[5]认为美国在合作主体、合作内容、经费保障等方面有值得我国借鉴之处;Mirzakhani和Dashti^[6]则重点关注公共图书馆在信息素养教学方面作出的贡献;陈莉莉^[7]认为公共图书馆应拓展教育职能,通过多元化的信息素养教育模式的构建,培养具备高信息素养水平的新时代公民;颜晶

和张新鹤^[8]指出个人全面发展的重点是终身教育,公共图书馆作为具有教育使命和职能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应该承担起为公民提供终身教育服务的重任;Yilmaz和Soylu^[9]探究表明公共图书馆在获得信息素养和发展信息素养,提升公民终身学习技能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纵观现有研究,大都聚焦在馆校阅读推广、馆校合作策略、信息素养培养、终身学习等方面,对“双减”背景下馆校合作应对协同育人新特点、新需求等方面涉足不多。因此,本文就公共图书馆如何突破以往传统的馆校合作方式,充分利用资源、空间、专业等优势,探索馆校合作在提升学生综合素养、促进终身学习的新方向,提出一系列创新馆校合作新模式。

2 “双减”背景下家校社协同育人新格局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减轻学生校内外课业负担,完善家校社协同机制,促进教育回归本然。随之各地根据《意见》相继出台了具体的实施细则,对学生的作业和校外培训的“减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这一系列教育政策“组合拳”,势必带来育人格局的新变化。

2.1 政策驱动

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办好教育事业,家庭、学校、政府、社会都有责任。”^[10]2019年2月,国家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规定,“学校教育应该与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密切配合、良性互动”^[11]。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10]。2021年11月,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印发《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要求“进一步完善政府、学校、家庭、社会相结合的网络文明素养教育机制,不断提升青少年网络素养”^[12]。上述政策、文件,从不同领域、不同方面表明国家层面对青少年教育的高度关注,都将家、校、社多方联动的教育体系作为青少年教育的重要路径支撑,并对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提出了明确要求。

2.2 现实需求

从家庭教育角度看,不少家长对“家庭是第一个课堂、家长是第一任老师”的认识不足,对孩子的教育理念不清、教育方法不当。据调研,82.8%的家长在家庭教育中遇到了困难^[13],这也客观要求家庭、学校教育的理念与实践必须整体上协调统一,不能与社会脱节。从学校教育角度看,“双减”政策下,义务教育的办学生态将面临较大的变化。中小学教育将从“唯分数”“唯升学”的功利化教育方式转向“创新”“综合素质”的培养^[14],这都需要家校两方联动,协同配合。从社会教育角度看,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等大量的社会教育机构虽然对青少年免费开放,但缺少与学校、家庭的联动机制。因此,从现实需求看,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各施所长、协同作用,才能形成教育合力,发挥整体最优效应。

3 美国公共图书馆馆校合作经验

国外公共图书馆开展馆校合作起步较早,早在19世纪末,美国图书馆协会(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LA)就致力于研究公共图书馆与中小学的关系,并倡导二者合作。因此,笔者探究了美国公共图书馆的馆校合作,从促进机制、服务内容、人员配备三方面论证了馆校合作的可能内容及其可行性措施,以期我国的馆校合作提供有益借鉴。

3.1 促进机制较完善

美国公共图书馆的馆校合作都得到了国家、地方政府、行业协会等多方面的政策支持和促进。美国《博物馆及图书馆服务法案》及《中小学教育法案》从经费和合作机构类型等方面助力馆校合作的开展,为其提供多方面支持。美国《图书馆服务与建设法》和《国防教育法》对公共图书馆与中小学合作的资金保障作出了规定。部分地方政府中负责公共图书馆发展的相关部门、教育部门以及负责儿童健康和福利的部门等也以发布政策、标准、指南和设立组织等形式不同程度地促进着公共图书馆和中小学校的合作^[5]。在行业协会方面,美国图书馆协会下设了专门图书馆及图书馆合作代理协会(Association of Specialized and Cooperative Library Agencies, ASCLA),为各体系的图书馆之间的联盟、合作和协作提供服务。另外,美国中小学图书馆员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chool Librarians, AASL)、儿童图书馆服务协会(Association

for Library Services to Children, ALSC) 和青少年图书馆服务协会 (Young Adult Library Services Association, YALSA) 联合发布的《公共图书馆与学校图书馆合作手册》对公共图书馆与学校合作的操作流程、成功案例和工作模板等内容进行了详细的阐述^[15], 为公共图书馆与中小学开展合作提供详尽的指导。

3.2 服务对象及内容更全面

美国的公共图书馆对学校开展服务, 其对象不只局限在学生范围, 也同样为教师和家长提供便利。服务对象的多样性使得馆校服务内容更加丰富, 除了组织阅读活动外, 也提供学生学业辅导等正规教育支持服务, 这有利于馆校服务满意度的提升, 进而促进图书馆与学校之间的良性互动和馆校服务的持续性。

(1) 针对学生的服务

美国的馆校合作针对学生的服务内容主要有: ①各类阅读活动。公共图书馆与学校合作开展各种阅读活动, 比如美国的暑期阅读项目。该项目是公共图书馆与学校合作, 利用暑假向儿童和青少年学生推出的旨在提高学生阅读和写作能力的阅读活动。该活动是一项全国性的项目, 参与人数多, 影响力大, 已有100多年的历史, 是美国馆校合作的基本模式之一。项目启动前, 公共图书馆会与当地学校就活动目标、阅读主题、阅读内容等进行讨论策划, 同时, 学校通过宣传发动, 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图书馆的暑期阅读项目, 图书馆则向学生提供阅读资源、阅读空间和阅读指导等。除了这些大型、持续性的阅读项目, 各图书馆还提供很多类似读书讨论、读写能力提升、拓展创新等阅读推广项目。②家庭作业辅导服务。图书馆内设有专门的辅导空间, 提供学习参考书、电脑、打印机等, 并配备有馆员或志愿者对学生进行面对面辅导。部分图书馆还为学生提供家教专业网站或免费学习辅助网站访问, 以帮助其完成家庭作业。③研究指导服务。美国中小学有很多社会调查、自主研究等探究式学习任务, 不少美国图书馆向学生提供研究指导服务。学生需提前进行预约, 并在约定的时间段与专业馆员进行交流讨论, 图书馆员深入了解学生需求后, 会搜集相关文献资料, 为学生完成社会调查、学术报告等提供专业帮助。④校外实践项目。美国公共图书馆都鼓励学生到图书馆参观或实习体验, 这有助于学生更了解和熟悉图书馆, 促进学生养成使用图书馆的习惯。

(2) 针对教师的服务

辅助教师开展教育工作也是美国公共图书馆开展馆校服务的主要内容之一。美国公共图书馆会订购教学辅助资源为教师的课堂教学提供资源和服务。如美国国会图书馆设有教师之家, 为教师提供对口参考咨询、教育资料和专业培训, 帮助其解决在图书馆资料查询、教材研究、课程材料准备等方面的问题。还成立“夏季教师学习院”, 为教育工作者提供多样化的发展培训机会。

(3) 针对家长的服务

美国公共图书馆针对家长开展的服务主要是为家长提供家庭教育信息服务。如开展家庭教育研讨会和讲座, 为家长提供孩子的校园安全、家庭主题教育、“怎样和孩子庆祝新年”等信息资源。

3.3 人员配备更专业

美国公共图书馆基本都配备有服务儿童和青少年, 具备图书馆情报学专业和教育学专业双重专业资格的专业馆员, 能根据儿童和青少年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策划和实施相对应的图书馆服务。而且美国公共图书馆也十分重视对服务儿童和青少年的馆员的业务培训, 不少州立图书馆面向区域内的图书馆员提供儿童和青少年服务指导培训。如新泽西图书馆有一项“青少年服务”(Youth Services), 由专家型馆员为本州从事该服务项目的图书馆员提供咨询和指导。纽约公共图书馆的“图书馆学习”项目将提升馆员面向儿童和青少年的服务能力列为主要战略目标^[16]。部分美国的公共图书馆还设有学科馆员, 向中小學生提供教学支持服务, 比如纽约公共图书馆设立专门的馆员负责基础教育支持服务的开展^[17]。美国的公共图书馆也会招募优秀的大学生、退休教师、高学历社会人士、注册教师等志愿者来提供家庭作业辅导服务以及帮助儿童和青少年提升学习和社交能力。

4 协同育人共同体新格局下馆家校合作的新实践新方向

基于美国公共图书馆馆校合作经验, 结合工作实际, 公共图书馆需要调整与学校和家庭的合作策略, 拓展服务内容, 探索新的合作方向和形式。

4.1 积极参与学校拓展课程设计和教学

为扩大学生知识面, 提升学生的认知能力, 越来

越多的学校在学科课程之外开设文学艺术、历史人文、体育劳动等拓展课程。公共图书馆可以利用自身的资源和专业优势主动参与到学校拓展课程设计和教学,比如可以把信息素养教育、传统文化体验等内容移植到拓展课程中。绍兴图书馆就充分发挥古籍修复的专业优势,对接当地小学,开设了“小小古籍修复师”的拓展课程。课程内容的设计、课程教材的编制、课程的教学都是由馆员承担。馆员向学生讲授古籍的基础知识及修复技能,并指导学生“制作拓包、传拓金石、体验雕版印刷、制作线装书、修复古籍”等,还带领学生观摩馆员修复古籍的技艺细节之美。课程学习贯穿一个学期,学习完成后,图书馆还会举办结业仪式,并在图书馆网站、微信等平台展示学生们的学习成果。由于课程内容新颖,授课+体验结合的教学设计符合青少年学习特点,课程受到学校和学生的一致好评和欢迎。

4.2 多维度助力学校开展乡土文化教育

乡土文化教育当地文化教育的重要内容,开设乡土文化教育,有助于学生了解家乡乡土文化,并激发爱乡爱国热情。但由于受到场地、师资等因素的限制,此类教学多停留在“照本宣科”的层面,学生兴趣不大。公共图书馆拥有丰富的地方文史资源和专门的地方文史工作人员,完全有能力多维度辅助学校开展乡土文化教育。绍兴图书馆在这方面也与学校进行了一些探索:一是创新乡土教育方式,开展沉浸式的、趣味性的、互动式的乡土教育活动。比如,与学校联合推出“身临史境·走进典籍里的绍兴系列活动”,图书馆邀请地方史专家讲典故、道名士,引领学生们穿越到绍兴历史上各高光时代。还带领学生到历史人文遗迹开展研学走读活动,并让学生们写心得谈感悟,最后通过演讲、表演等形式进行分享。二是用活乡土文献资源,建立乡土资源阅读空间。绍兴图书馆根据馆藏情况,开设了鲁迅、王阳明等专题阅读空间,还建设有黄酒、古桥、书法等地方特色文化数据库。图书馆把这些乡土资源推荐给师生,方便教师备课和学生学习。同时,学校也会轮流组织学生定期到图书馆专题阅读空间开展阅读分享会,充分发挥空间的作用。三是联合专业协会,丰富教学内容。绍兴图书馆联合当地文史研究机构,开展地方文化讲座,讲座内容主要是对教材内容的深化和延伸,帮助学生深入理解乡土文化。

4.3 构建与学校共享的馆藏资源平台

学校为加强家校联系,基本都建有家校信息平台。该平台具有家校联系、课程辅导、信息发布等功能,因其实用性强,老师和家长在平台上的使用率较高。另一方面,学校希望能充分利用公共图书馆丰富的馆藏资源,但是受限于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部分学校的师生借阅图书馆图书还是不太方便。为解决上述问题,公共图书馆可以考虑通过家校信息平台来构建与学校共享的馆藏资源平台,以满足学校的需求。绍兴图书馆通过在家校信息平台上开设图书借阅超市,以此来实现馆藏资源与学校共享。超市里的图书是图书馆在调研学校和家长们需求后精心挑选的,师生和家长可以在超市里下单所需借阅的图书,由家校信息平台的运营商图书馆(室)把图书分发到师生手中,阅读完成后师生可以把书还到学校图书馆(室),再由运营商统一归还到图书馆。通过家校信息平台开设图书借阅超市,既方便了师生和家长借阅图书,又提升了图书馆图书利用率,还帮助运营商拓展了家校信息平台的服務,一举三得,是个多方共赢的项目。

4.4 促进家庭图书馆家庭教育作用的发挥

家庭是孩子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据美国内华达大学研究发现,在中国,家庭藏书超过500册的孩子,比没有藏书的家庭的孩子,平均受教育年限多出6.6年。可见,家庭藏书量对孩子阅读兴趣和学习持久度都会产生影响^[4]。公共图书馆可以利用自身专业优势和资源优势,通过建设家庭图书馆帮助家长创造良好的家庭教育氛围,促进家庭教育作用的发挥。绍兴图书馆依托家庭空间建立图书馆,由家庭成员作为图书馆的具体运营者,图书馆予以图书资源、活动配送、社会宣传等方面的支持,面向周边邻居提供服务。目前绍兴图书馆已建有6家家庭图书馆,通过实际运营,我们发现家庭图书馆项目对促进孩子教育发挥着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①可以获得图书馆充足的图书资源,营造良好的阅读氛围,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和提升自主阅读能力。②家庭图书馆会向社区邻居提供图书借阅、阅览活动等服务,是一项社会公益服务。通过参与这种服务,有助于塑造孩子的社会责任感,培养孩子的公益服务意识。③可以让孩子参与家庭图书馆的运营,获得社会实践机会,以培养锻炼孩子的组织能力和社交能力,塑造其良好的性格。

4.5 参与建设地方协作教育与学习体系

通过资源共享、系统连接、一卡通用等将整个地区学习资源进行整合,以学校为起点和基础,以公共图书馆为中心,建立包括科技馆、美术馆、运动馆、博物馆、档案馆、纪念馆、文化馆在内的自主学习体系,互相支撑,互相配合,既可以丰富课堂学习内容,又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学生学习课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可以到图书馆借阅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也可以到鲁迅纪念馆实地体验。再比如美术学习,学生在学校可以学习美术知识,去图书馆可以进一步了解流派、技法、历史和美术图集,去

美术馆可以参观真迹,亲眼观赏名家绘画。

5 结语

“双减”政策下,青少年的教育愈发强调家校社协同,学校也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寻求社会机构的合作,这些都为公共图书馆开展馆校合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公共图书馆应把握这一契机,深入分析学校、家长需求,挖掘自身优势,联合其他社会机构根植家校需求,锐意创新,提供精准服务,在家校社协同育人共同体中突显公共图书馆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 [1] BUSCHMAN J. Education, the Public Sphere, and Neoliberalism: Libraries' Contexts[J]. LIBRARY QUARTERLY, 2020, 90(2): 154-161.
- [2] 刘爽. 公共图书馆开展馆校合作路径与策略[J]. 图书馆界, 2017(3): 59-61, 69.
- [3] 周璿莉. 公共图书馆儿童阅读推广馆校合作研究[J]. 福建图书馆学刊, 2020(1): 58-61.
- [4] 叶静. 公共图书馆馆校合作阅读推广的路径及策略研究[J]. 河北科技图苑, 2020(3): 62-66.
- [5] 史拓. 公共图书馆与中小学校合作的中美比较研究[J]. 图书馆建设, 2012(5): 77-79, 83.
- [6] MIRZAKHANI K, DASHTI A. Teaching information literacy to 11-16-year-old teenage members of public libraries of Tehran 1st region[J]. Em Questão, 2020, 26(2): 233-256.
- [7] 陈莉莉. 公共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多元化服务模式研究[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021(11): 5-10.
- [8] 颜晶, 张新鹤. 面向公众终身教育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构建研究[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22(1): 17-21.
- [9] YLMAZ B, SOYLU D. The role of public libraries in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turkey: A study of a provincial public library[J]. Communications in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2014, 492: 642-651.
- [10] 孙永鸣. 新时代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内涵和特征[J]. 中国德育, 2021(18): 15-19.
- [11] 人民交通网. 一个诊学优考之家、幸福一个社区、温暖一座城市[EB/OL]. [2021-09-30]. <http://www.rmjtxw.com/news/shangye/166808.html>.
- [12] 人民资讯. 首届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在京召开 培育青少年网络素养成讨论重点[EB/OL]. [2021-11-20].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6922115437931813&wfr=spider&for=pc>.
- [13] 张生, 张琼元. “双减”背景下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的构建与探索[J]. 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 2021(12): 8-10.
- [14] “双减”政策深化教育改革[EB/OL]. [2021-12-31]. <https://xw.qq.com/amhtml/20211231A060EQ00>.
- [15] 梁苗草, 刘燕权. 美国中小学与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合作模式及成功案例纵析[J]. 图书馆建设, 2020(s1): 120-123, 129.
- [16] 李欢. 基于网站调研的美国公共图书馆正规教育支持服务剖析[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17(10): 72-76.
- [17] 陆和建, 金岳晴. 纽约公共图书馆基础教育支持服务及启示[J]. 图书情报工作, 2013(6): 56-60.
- [18] 陈秀琴. 家庭图书馆: 打造阅读新路径[J]. 福建教育, 2021(9): 14-15.

作者简介: 廖晓飞, 绍兴图书馆副馆长, 馆员, 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 研究方向为图书馆社会教育、智慧图书馆建设、图书馆资源建设等。

收稿日期: 2022-05-05

本文责编: 孙晓清

· 工作研究 ·

标记本图书的著录及应用探索

——以复旦大学图书馆捐赠图书为例

蔡闻桐 赵睿杰 苗 青

(复旦大学图书馆 上海 200433)

摘要: 长期以来文献资源编目侧重对文献本身的描述,如载体形态、内容摘要、主题等。以捐赠图书为代表的标记本图书除文献本身所承载的信息外,还附有文献单册使用者添加的附加信息,包括签名、题赠、注释、印章印记等标识,这些信息是文献流转的重要信息源,也是阅读史研究的重要素材。文章主要依据《珍本(图书)著录规范》[DCRM(B), Descriptive Cataloging of Rare Materials (books)]对来源著录的规则,以复旦大学图书馆捐赠图书为例进行了文献来源及标记信息的著录实践,形成的标记本图书著录细则可为其他图书馆提供相关参考;所产出的MARC元数据为大数据环境下知识发现和关联奠定基础,更为研究者的学术研究提供更全面的学术支持。

关键词: 文献来源;编目;标记本;捐赠图书;复旦大学图书馆

中图分类号: G254.31

文献标识码: A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Describing Books with Marks: A Case Study of Fudan University Library Donation Collections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the cataloging of literature resources has been merely focusing on describing the literature itself, indicating the physical forms, the abstracts, the subject headings and etc. The books with marks representing the donated books not only involve such information, but also contain some additional evidences on items added by their former owners. Such marks include signatures, inscriptions, annotations, stamps and so forth, which are crucial information witnessing the custodial history of books, as well as significant elements supporting studies on reading history. Following the rules of DCRM(B)[Descriptive Cataloging of Rare Materials (books)], this article is to exemplify Fudan University Library's cataloging practice of a donated collection with a focus on describing provenance and marks. A detailed rule of marked books' description is delivered as a possible reference for other libraries. The metadata created is to lay a foundation for knowledge discovery and linkage in the big data environment, moreover, to provide researchers with a broad base of academic support.

Key words provenance; cataloging; books with marks; donation book; Fudan University library

1 标记本图书的研究背景及界定

复旦大学图书馆(以下简称“我馆”)捐赠图书资源丰富,包括有陈毅元帅家属捐赠其藏书及相册、日记;韩伦中校捐赠版画及其他资料;著名作家卢新

华捐赠其手稿、书信等专题;复旦大学校友捐赠中也形成了以秦绍德书记、赵景深教授等学术大家为代表的个人藏书捐赠。在对这些图书编目过程中,我们发现捐赠图书作为构成图书馆资源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除图书本身的载体形态、内容实体属性等信息外,往往还承载了捐赠者及他人的一些附加信息,

比如阅读时留下的划线标记;对书中内容的注释、批注;签名、印章、题赠;藏书票、书签;书中夹带的纸条及各种其他资料等。从研究角度来说,这些信息是阅读史研究的一手素材,也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社会网络关系的重要依据。韦胤宗在《阅读史:材料与方法》一文中提到“书籍中读者留下的批校这一长期被学者所忽视的材料,具有无可替代的优越性”^[1]。从收藏角度来说,《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有关版本价值的条目中写道:“最理想的藏书是有作者的批注或题词,或者曾经名流占用、使用并留有印迹的书籍”^[2]。

目前,对这些承载有捐赠者及他人附加信息的图书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毛瑞江认为,对一本书而言,既有“先天信息”,也有“后天信息”,将其“后天信息”定义为“图书被收藏、转赠与流传过程中留下的痕迹,包括藏书章、藏书票、赠阅信息、文本批注、题字、书商信息、借阅信息等”,可以概括为“流转印记”^{[3]24-25};王梦菊等在《图书馆个人藏书的“特质化信息资料”及其揭示》一文中将其界定为“特质化信息资料”^{[4]42-43}。这两者所涵盖的范围与本文对“标记本”的界定大体一致。此外,周爱武仅从作者或转赠者签名的角度界定了民国图书的“签名本”并对其外延进行了研究^[5];而何玉介绍的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民国文献的“签名本数据库”中则在签名、题赠之外还包含了笔记和书信内容^{[6]102-107};李彦霖从藏书印记上对图书的流传信息进行揭示,进而为图书价值评估奠定基础^[7]。

本文通过对馆藏捐赠图书附加信息的整理,将承载有作者、受赠者、捐赠人或他人的签名、题赠;阅读时所作的划线、高亮、批注、批校、注释说明等标记和文字;各种印章印记;书中夹带的藏书票、书签、书信、纸条等物品的图书统称为标记本图书。通过调研国内外图书附加信息的描述和揭示的相关标准、研究和实践,结合复旦大学图书馆的工作实际形成标记本图书的著录细则,并以我馆捐赠图书为例,探索标记本图书数据在知识发现和关联中的应用。

2 标记本图书来源信息著录研究

国外对标记本图书的著录主要以“来源原则”为依据。来源原则是档案领域重要的原则之一,起源于法国,是尊重全宗原则的核心内容。卡特将“来

源”定义为“一本书之前拥有的血统”,并指出“一本书早期的历史证据总是令人感兴趣,有时也很重要。”^[8]Pearson在其著作《图书史中的来源研究》(*Provenance Research in Book History*)中对各种类型的来源证据进行了分类和讨论^[9]。Lundy论述了来源对特藏资源及其使用者的重要意义:(1)前所有权的记录可能会让图书或物品对使用者或馆藏机构来说更有价值;(2)对前所有者收藏内容的揭示可能会让使用者了解到前所有人的爱好;(3)历史学家和书目学家通常对领域内知名人士的个人藏书非常感兴趣^[10]。著录细则方面,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CU Boulder)的特藏部门在整理其登山系列藏书的过程中,对每本书中的赠言、批校、签名等图书来源信息进行MARC著录的实践中启用了本地590字段作为历史流转信息的著录字段,并在700字段对相关人物做检索点,选择用关系代码表明个人与文献的关系,例如:

700 1# \$aCourten,Philippade,\$4fmo

说明:fmo是former owner的代码,表明Courten是前所有人。

700 1# \$aCourten,Philippade,\$4ins

说明:ins是inscriber的代码,表明Courten是题赠人。

700 1# \$aCourten,Philippade,\$4sgn

说明:sgn是signer的代码,表明Courten是签名人。

国内最早关注流转历史信息著录的是毛瑞江对“流转印记”及其编目的论述。著录实践上建议MARC21格式中启用541字段、561字段、590字段和7XX字段,CNMARC格式中启用317字段、316字段和7XX字段分别对采访源、所有权与保管史、当地和特殊复本信息以及相关责任者检索点进行著录^{[3]26-28}。上海图书馆在对其徐家汇藏书楼外文珍本著录实践中启用了541字段、561字段和7XX字段对来源、保管及所有权历史和相关责任者检索点做揭示^[11]。清华大学图书馆对馆藏民国签名本图书历史流转信息的著录是在其系统外揭示,未与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的统一检索整合^{[6]106-108};山东大学图书馆在单册馆藏信息处做揭示,但从MARC数据样例中并未体现出具体的描述信息^{[4]46}。

3 复旦大学图书馆标记本图书的著录实践

复旦大学图书馆标记本图书的研究起始于2019年底,正值语义网、关联数据技术在国内图书馆应用兴起之时,特藏馆员和编目馆员关注到关联数据技术在图书馆应用的最终结果取决于文献资源元数据著录的细粒度和完整性,重新审视文献资源的编目工作是否满足当前技术发展的需要。经过调研分析,复旦大学图书馆综合考虑编目工作量和人力资源后,在对普通图书维持已有的编目流程的基础上,加强对特藏图书著录的细粒度和精确性,并从中西文捐赠图书中各选取一批作为试点。

3.1 著录标准规范

在内容描述标准上,主要依据《珍本(图书)著录规范》[“DCRM(B)”, Descriptive Cataloging of Rare Materials (books)]及其他DCRM系列对特殊标记及来源信息的著录规则。DCRM(B)中7B19.2节对来源作了如下说明:

“如果认为重要的话,通过本地附注来描述物品来源信息。简要描述建议总结来源信息,而不提供证据的准确记录或描述。尽可能包括前所有者或其他感兴趣个人的姓名和大概日期。详细描述可能包括以下附加特征:亲笔签名、题赠、藏书票、印章、排架号等信息的精确转录;每个在单册中的位置;已知的大概日期;使用标准术语描述藏书票等等。”^[12]

DCRM(B)及其他DCRM系列是由美国图书馆协会(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ALA)下属的大学和研究型图书馆分委会(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ies,ACRL)的珍本和写本部(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 Section,RBMS)制订和维护。此外,RBMS针对来源证据建立了术语受控词表^①,DCRM(B)7A1.4中明确说明首选“RBMS发布的受控词汇中要求使用的术语”。

根据DCRM(B)的上述规则,结合对我馆捐赠图书上标记信息的分析,将来源信息的描述具体分为以下几类:

(1)表明图书流传历史的信息包括有:签名、题赠、印章印记、藏书票。这些信息有助于识别文献的前所有权人。

(2)阅读史研究的相关信息包括有:文中内容的划线、高亮、批注、批校和注释说明等标记和文字。这些信息反映了文献前所有权人阅读时的思考和对该文献内容的看法。

(3)书中的夹带资料包括有:藏书票、书签、书信、纸条等。这些资料作为阅读时的重要材料有利于还原当时的历史情境,为历史考证提供证据支持。

此外,还包括对图书的特殊材质、装订形式、破损和缺页状况揭示,为相关人员提供更多方面的信息用以评估图书的历史和价值等。

在元数据编码格式标准上,DCRM(B)采用MARC21元数据格式,在具体字段的使用上也作了说明:

(1)使用541字段记录获得文献的直接来源。

(2)使用561字段描述从文献创作到图书馆获得文献的所有相关历史,即历史流传信息。

(3)使用7字段增加规范检索点。

因此,在著录用元数据格式标准上,本馆根据文献语种的不同,对中日文标记本图书采用CNMARC格式,对其他外文语种采用MARC21格式进行著录。此外,对书中的夹带资料的详细描述,限于MARC字段的局限性和连接字段的复杂性,由特藏馆员采用EAD元数据编码格式在我馆的特藏平台“ArchivesSpaces”上作揭示。

3.2 著录要点

考虑到多数图书馆自动化系统在单册层面上检索受限和数据非结构化等因素,标记本图书的著录实践选择在MARC记录中增加对特殊标记信息的描述,以利于读者在OPAC检索中能够获取除责任者、主题以外的信息。信息著录尽可能采用结构化的方式,为未来关联数据的应用奠定基础,以实现更大范围内的知识发现。具体著录要点与前述基于内容描述标准对标记本图书所作的来源分类相关。

3.2.1 单册标识

如果用BIBFRAME模型的作品—实例—单件来衡量,标记本图书是针对每一个具体单件而言的。MARC记录以编目员手边文献为依据进行著录,更多的是对某一种书目实例的描述。因此,在采用MARC记录来揭示标记本信息时,尤其是有馆藏复本的情况下,必须解决单册标识的问题。

虽然MARC21的852字段中提供了对单册馆藏信息及附注的具体描述,如852\$z子字段可以包含“由作者题赠”的附注信息,但如果该种图书有多个单册来源,且每一单册上都有不同人的题赠信息,MARC记录则无法实现来源与题赠信息一一对应的关系。因此,我们在具体描述字段上本地定义了专门用于

著录单册标识符的子字段,以表明该字段所描述的信息仅对该单册适用。MARC21字段中使用\$7子字段、CNMARC字段中使用\$6子字段揭示单册标识符,并启用\$5FDU子字段表明该字段的应用机构,如下文示例。

3.2.2 历史流传信息

MARC21格式中使用561字段、CNMARC格式中使用300字段实现对历史流传信息的描述,具体包括对书中签名、题赠、印章印记、藏书票等信息的描述,如表1。著录过程中,对于较难识别的签名和印章的文字内容,编目馆员不做过多辨识,以“[?]”标识无法识别的文字信息,交由特藏馆员或相关专业人员处理。

表1 历史流传信息著录要点

字段	子字段	著录说明	受控词表	备注说明
561	\$3	以\$3专指资料子字段实现对签名、题赠、印章印记、藏书票的区分	Autographs/ Stamps/ Inscriptions/ Bookplates	多个来源 重复 561 字段
	\$a	如实转录\$3子字段来源中的具体内容	-	
300	\$8(本地自定义)	同561\$3子字段	签名/印章 /题赠/藏书票	多个来源 重复 300 字段
	\$a	同561\$a子字段	-	

注:表中“-”表示无受控词表。

西文示例: 561 ## \$7 B2104099044269#:

\$3 signatures#:

\$a Ji.

\$5 FDU

561 ## \$7 B2104099044269#:

\$3 stamps#:

\$a [天津市红桥区教师进修学?

资料室.]

\$5 FDU

中文示例: 300 ## \$6 B2109054630558#:

\$a 秦某某: 教正 / 濮某某.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

\$8题赠

\$5 FDU

300 ## \$6 B2109054630558#:

\$a 濮某某, 朱字方印

\$8印章

\$5 FDU

3.2.3 阅读标记

阅读标记包括对文中内容的划线、高亮、注释等信息。MARC21格式使用500字段, CNMARC格式使用300字段进行著录。

西文示例: 500 ## \$7 B2104099044269#:

\$a Edge-marks.

500 ## \$7 B2104099044269#:

\$a Annotation by Li.

中文示例: 300 ## \$6 B2109054630558#:

\$a 有批注.

\$5 FDU

300 ## \$6 B2109054630558#:

\$a 有李某某的批注.

\$5 FDU

3.2.4 直接采访来源

以该字段揭示获得单册的直接来源。MARC21格式使用541字段, CNMARC格式使用345字段进行著录,如表2所示。

表2 直接采访来源的著录要点

字段	子字段	著录说明	受控词表
541	\$c	以\$c采访方法子字段标识获取单册来源的方式,本馆对该字段做术语限定	Donated/ Exchanged/ Purchased/ Deposited
	\$a	著录单册来源的人或机构信息	-
	\$d	获得单册的日期	-
345	\$d(本地自定义)	同541\$c子字段	捐赠/交换/ 购买/存放
	\$a	同541\$a子字段	-
	\$e(本地自定义)	同541\$d子字段	

注:表中“-”表示无受控词表。

示例: 541 ## \$7 B2104099044269#:

\$a Wang, Mou

\$9 (王某),

\$c Donated.

\$5 FDU

345 ## \$6 B2109054630558#:

\$a 刘同舜

\$d 捐赠

\$5 FDU

3.2.5 夹带资料

标记本图书中的夹带资料类型多样,有票据、纸条、信件等等。鉴于编目馆员和特藏馆员学识背景以及对文献关注点的不同,在实践中,当编目馆员发现书中夹带资料时,不改变资料在书中的位置交由特藏馆员确认夹带资料的价值,再由特藏馆员在馆内特藏资源管理平台ArchivesSpace系统内进行揭示,编目馆员则在MARC记录中描述该夹带资料的去向。

如在某捐赠个人藏书中发现信件一封,编目馆员负责在MARC记录里揭示信件的去向,特藏馆员负责揭示信件的具体内容。具体记录示例:

西文示例: 555 ## \$a Finding aid available on Internet.

\$u https://tecang.fudan.edu.cn/repositories/2/archival_objects/25193

中文示例: 327 ## \$a书中附带信件详细信息请见
[https://tecang.fudan.edu.cn/repositories/2/archival_](https://tecang.fudan.edu.cn/repositories/2/archival_objects/25193)
[objects/25193](https://tecang.fudan.edu.cn/repositories/2/archival_objects/25193); 此文献为特藏
资源, 请遵循特藏阅览规则使
用; 请随资源一并预约阅览室
座位, 仅预约文献的将不予处
理。

AS系统中采用EAD编码对书信具体示例,对附带资料的具体类型、信件的寄信人、附带资料的载体形态等信息进行了详细说明,见图1。

[illegible]

图 1 AS 系统内标记本图书附带信件记录示例

3.2.6 相关检索点

大数据环境对文献资源元数据的获取、检索、识别和发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标记本图书中来源证据的独特性要求编目员必须为文献的前所有人提供检索点,以确定属于同一个人或家庭的其他材料之间的关系。为了能在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系统中更全面地描述与检索点相关的信息,在对标记本著录实践中除

对原有的责任关系,如著、编、译等检索点实行规范控制外,基于对来源信息的判断,在责任者附加款目字段增加了历史保管者(former owner)、亲笔签名者(autographer)、签名者(signer)和捐赠者(donor)等检索点的揭示,同时启用本地自定义单册标识字段和\$5FDU本地应用字段。MARC21格式利用700、710和711等字段著录,CNARC格式利用702、712字段。

西文示例: 700 0# \$7 B2104099044269#

\$a Li, Moumou

\$9 (李某某),

\$e donor.

\$5 FDU

中文示例: 702 0# \$6 B2109054630558:

\$a濮某某

\$9 Pu Mou mou

\$f 1922-

\$4 捐

\$5 FDU

4 复旦大学图书馆标记本图书应用拓展案例

在对标记本图书应用的进一步探索中,我们选取了某位捐赠人的个人藏书为试点,主要因为这批书中出现大量的标记,尤其是书籍的来源历史信息。这些来源信息体现了捐赠人丰富的社会关系网络,其中隐藏的社会关系网很大程度上展现了他与社会名人的历史脉络和情感联结,这些流转信息极具标记本著录价值及数据互联上的研究意义。

基于前述著录细则完成相关图书的编目工作后,我们通过ALEPH系统进行作者检索,输入该捐赠人姓名,成功获取572条中文MARC记录。以这些MARC记录为数据源导入Visone软件分析捐赠人的社会网络关系,获得247位标记本历史保管者与捐赠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图,如图2和图3所示。

图2以连接线区分历史保管者与捐赠人之间的关系(见图例2-1);节点的形状代表历史保管者的身份(见图例2-2);节点的字母代表历史保管者的出生年代(见图例2-3)。例如,图2中的圆形节点“邓F”,代表历史保管者邓某在赠书上附有签名,与捐赠人是同事关系,邓某的出生年代在1950—1959年。

图3中节点间连接线代表历史保管者与捐赠人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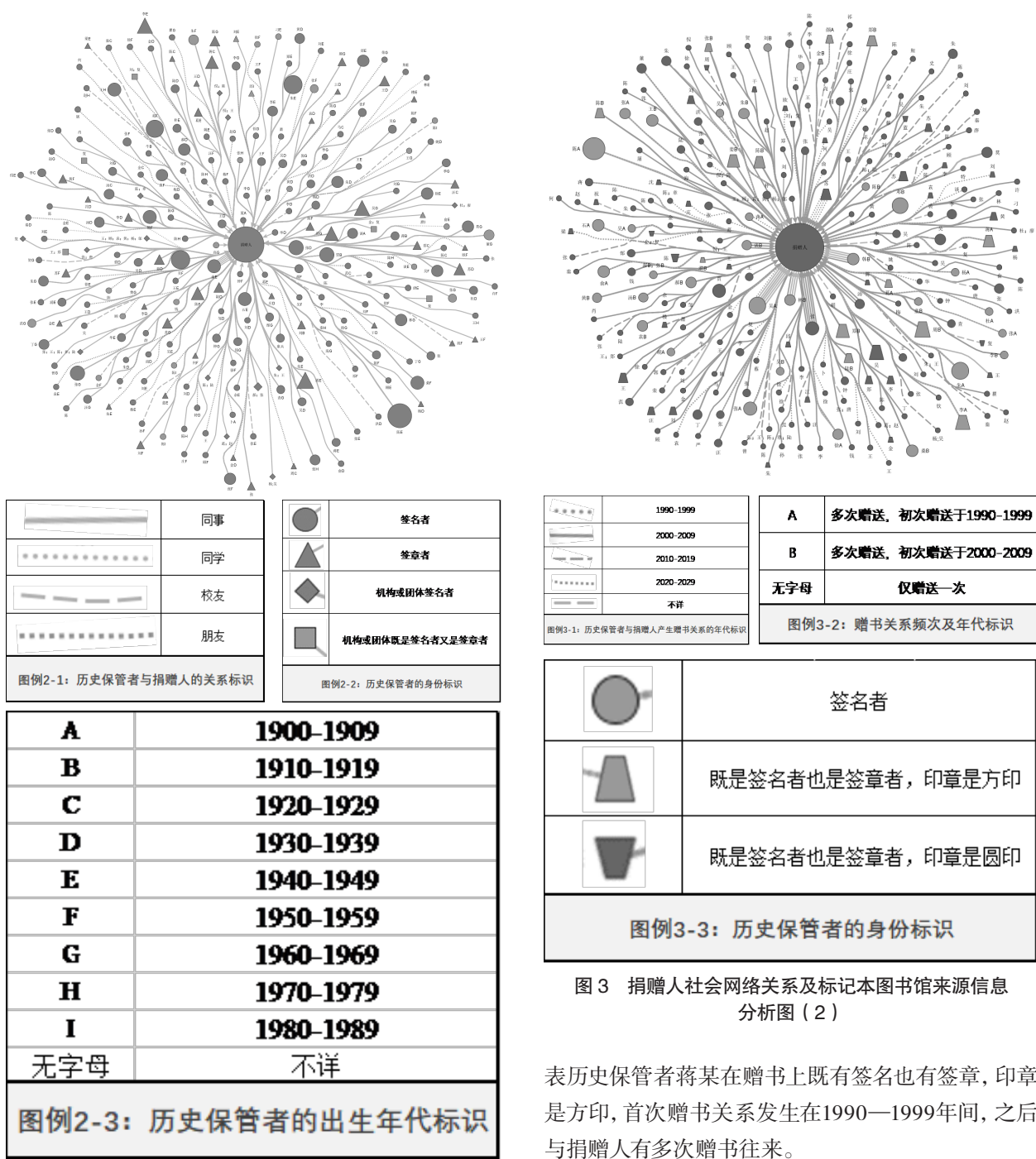


图2 捐赠人社会网络关系及标记本图书馆来源信息分析图（1）

生赠书关系的年代（见图例3-1），可以看出赠书关系大多发生在2000—2009年间，其次是发生在1990—1999年间。因此，进一步用字母A和B附在姓氏结尾分别指向两个不同年代，并代表产生多次赠送关系，无字母结尾代表仅产生过一次赠送关系（见图例3-2）。节点的形状与图2含义相同代表历史保管者的身份（见图例3-3）。例如，图3中的正梯形节点“蒋A”，代

图3 捐赠人社会网络关系及标记本图书馆来源信息分析图（2）

表历史保管者蒋某在赠书上既有签名也有签章，印章是方印，首次赠书关系发生在1990—1999年间，之后与捐赠人有多次赠书往来。

通过对中西文图书标记本的本地化著录，揭示出历史保管者与捐赠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对捐赠人的社会关系网络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展现。此次实践成果还将有后续发展的计划，如研究形成的社会网络图也可以作为图书馆回馈给捐赠人的最好的礼物等。

5 结语

图书馆长期以来的编目工作重在对文献资源载

体表现的揭示,关联数据技术的应用将对文献资源的描述深入到内容乃至知识层面,同时也解决了图书馆内数据孤岛的问题,使得馆藏文献资源能够与互联网资源建立既广泛又深度的关联,从而满足知识发现和挖掘的需求。复旦大学图书馆对标记本图书的探索,以国内外相关的标准规范为基础,所形成的标记

本著录规范有利于书目数据的共享和交换;所建立的标记本图书的著录细则也可其他高校图书馆编目工作提供参考。从学术研究角度上来说,为研究人员提供了人物社会网络关系、藏书结构研究、阅读史研究等方面的学术支持,更是在大数据环境下,我馆编目馆员转型的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注释:

- ① RMBS来源证据术语受控词表: https://rbms.info/vocabularies/provenance/alphabetical_list.htm

参考文献:

- [1] 韦胤宗. 阅读史: 材料与方法[J]. 史学理论研究, 2018(3): 109-117, 160.
- [2]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译部.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Z].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5: 195.
- [3] 毛瑞江. 特藏文献中的“流传印记”及其编目[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15, 33(4): 24-28.
- [4] 王梦菊, 杨锦先. 图书馆个人藏书的“特质化信息资料”及其揭示[J]. 图书馆学刊, 2018, 40(9): 42-47.
- [5] 周爱武. 民国图书签名本外延研究: 以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为例[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09, 27(6): 80-84.
- [6] 何玉, 蒋耘中, 袁欣, 等. 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民国文献的源流与学术价值探析[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19, 37(5): 102-108.
- [7] 李彦霖. 基于藏书印记信息的特藏信息挖掘初探: 以复旦大学图书馆为例[J]. 知识管理论坛, 2019, 4(4): 232-245.
- [8] JOHN C. ABC for Book-Collectors[M]. New York: Knopf, 1972: 160.
- [9] DAVID P. Provenance Research in Book History: A Handbook[M]. London: British Library, 1998.
- [10] LUNDY M W. Provenance Evidence in Bibliographic Records[J]. Library Resources & Technical Services, 2008, 52(3): 164-172.
- [11] 郑佳盈. 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珍稀文献编目研究与实践[J]. 图书馆杂志, 2022, 41(1): 75-81.
- [12] 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ies, 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s Section. Bibliographic Standards Committee[M]. Washington, D.C.: Library of Congress, 2007: 146.

作者简介: 蔡闻桐, 硕士,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员, 研究方向为资源组织、小语种编目; 赵睿杰, 硕士, 复旦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研究方向为资源组织、本体; 苗青, 硕士,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员, 研究方向为资源组织、元数据标准与规范。

收稿日期: 2022-08-03

本文责编: 郑秀花

中文图书情报学期刊受论文中介及假冒期刊网站干扰状况探究

段玮弘¹ 马爱芳²

(1.鲁东大学党委办公室 山东烟台 264025)

(2.鲁东大学图书馆 山东烟台 264025)

摘要: 文章以44种中文图书情报学期刊为样本,在充分了解其出版现状前提下探讨论文中介网站及假冒期刊网站对其干扰状况。结果显示,已有36种期刊创建了自主网站,且多数进行了百度官网认证,其排名也多居首位,中介网站对其干扰程度有所减弱,但尚未构建自主网站的期刊仍深受中介网站侵害;在已构建自主网站的期刊中,有11种存在着被假冒网站仿冒问题。期刊社应从构建自主网站、百度官网认证、提高显示度、改善稿约发布通道、开通公众号等多方面寻求应对策略;作者则应从期刊正确投稿方式获取、中介网站及假冒网站识别能力培养等多方面积累应对之策,共同抵制非法中介和假冒网站所带来的干扰和侵害。

关键词: 图书情报学期刊;论文中介网;假冒期刊网站;干扰状况

中图分类号: G237.5; G255.2

文献标识码: A

On the Disturbance of Paper Intermediary and Fake Journal Websites to Chines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Journals

Abstract The article takes 44 Chinese library and intelligence journals as a sample, and explores the situation of interference by intermediary websites and fake journal websites on the premise of fully understanding their publication status. The results show that 36 journals have created their own websites, and most of them have been certified by Baidu, and their rankings are mostly in the first place, so the interference from intermediary websites has been reduced, but those journals that have not yet built their own websites are still deeply affected by intermediary websites. Journal publishers should seek strategies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by building their own websites, certifying their official websites with Baidu, improving the display of their manuscripts, improving the channels for publishing manuscripts, and opening public websites.

Key words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journal; paper intermediary website; fake journal website; disturbance

1 引言

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期刊出版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系统采稿、邮箱投稿成为目前期刊社普遍采用的方式,给期刊社和作者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一些不法分子非法敛财带来了可乘之机,日益猖獗的论文中介网及假冒期刊网站便是例证。面对此类

问题,中文期刊编辑部高度重视,尤以医药卫生类期刊最具代表。通过CNKI检索发现,自2014年以来,有关防范论文中介及假冒期刊网站的相关学术论文约80篇,其中40余篇重点探讨论文代写代发问题,以医学期刊编辑撰写最多,这与医学期刊受中介冲击最为严重密切相关^[1-2];另有近40篇论文重点探讨假冒期刊网站辨识及其治理问题,相关研究者包括各学科期刊编辑人员。笔者在搜集阅读相关文献时发现,以

往深受作者投稿咨询信任的图书馆界对此问题却关注很少,仅在《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6年第6期笔者本人^[3]及2020年第5期李岩^[4]作者以图书馆员身份进行过相关探讨,《图书馆建设》2020年第5期王媛^[5]作者从投稿角度粗浅涉及了规避中介和假冒期刊网站问题,这不得不说是图书情报学界同仁对此问题的敏感缺失。为此,笔者选取图书情报学期刊为调查对象就此问题再做研究,以期为图书情报学期刊编辑及其作者防范和规避此类问题提出一些建议。

笔者首先通过CNKI“出版物检索—学科导航—信息科技—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路径,搜集汇总44种目前公开发行的中文图书情报学期刊为本文研究样本(除去CNKI收录的年刊、半年刊、内刊、2020年已停办或不再收录等期刊);再通过网络搜索、网站比对、稿约及期刊介绍等相关内容阅读、期刊公众号关注等多种方式了解各期刊出版现状。在充分了解各期刊目前现状的前提下探讨论文中介网站及假冒网站对其冲击状况,进而提出期刊编辑部和作者的应对策略。

2 结果讨论

2.1 图书情报学期刊基本情况

期刊论文中介网站充斥于各大搜索引擎中,要想帮助作者辨别真伪,去伪存真,必须首先摸清图书情报学期刊目前的出版现状,主要包括各期刊官网构建、采编系统或投稿方式、百度排名(搜索时间为2021年7月15日)、稿约状况、公众号开通及栏目架构等信息。笔者通过百度搜索对44种期刊逐一进行检索,结合阅读CNKI有关文献、浏览期刊官网及公众号等发现,图书情报学期刊目前出版状况如下:

一是有36种期刊拥有了独立网站,建立了稿件采编平台。其中,《情报科学》《情报理论与实践》《情报学报》《图书情报工作》《情报资料工作》《图书馆》《图书与情报》《图书情报知识》《图书馆建设》《图书馆论坛》《图书馆杂志》《农业图书情报学报》《图书馆研究》《高校图书馆工作》《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现代情报》《图书馆学刊》《图书馆工作与研究》《四川图书馆学报》《图书馆研究与工作》《竞争情报》《信息资源管理学报》《情报探索》《河北科技图苑》24种期刊采用北京玛格泰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稿件远程处理平台,《数字图书馆论坛》《新世纪图书馆》《情报工程》《国家图书馆学报》4种期刊采用北京勤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稿件处理系统,《图书馆理论与实践》《大学图书馆学报》《大学图书情报学刊》《晋图学刊》4种期刊采用中国知网腾云采编平台,《情报杂志》采用西安三才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期刊采编系统,《文献与数据学报》采用北京康益佳科技有限公司期刊采编系统,《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和《中国图书馆学报》两刊投稿系统平台暂不明确。

二是百度搜索排名大多居于首位。除《图书馆论坛》《图书馆杂志》《图书馆学刊》《四川图书馆学报》《新世纪图书馆》《图书馆理论与实践》6种期刊的搜索排名未居于首位外,其余26种期刊居于首位,但若在上述6种期刊刊名上加注书名号再进行搜索时又都排名首位,而《高校图书馆工作》《竞争情报》《河北科技图苑》《晋图学刊》4种期刊的官网无论采取何种搜索策略均检索不到。

三是目前仍有《图书馆学研究》《河南图书馆学刊》《科技情报研究》《图书馆界》《图书情报导刊》《数字与缩微影像》《山东图书馆学刊》《全国新书目》8种期刊尚未构建期刊官网,仍采用邮箱投稿方式。

四是部分期刊稿约信息刊登存在问题。有32种期刊在近三年纸本期刊上刊登过稿约、征订、选题指南或期刊简介等相关内容,论文作者可通过上述内容查找到期刊官网或投稿邮箱,而另外12种期刊在近三年纸本期刊上未曾刊登过稿约或未发布过期刊网址、投稿邮箱等类信息,期刊官网或投稿方式无从查找,给作者尤其是新手作者投稿带来了不便和困扰^[6],如《图书情报导刊》《图书馆界》《全国新书目》等期刊的投稿邮箱便是笔者通过“万维书刊网”第三方平台获取再经过投稿验证而来,因此,缺少稿约类信息或无从查找官网的期刊很容易让投稿者落入论文中介圈套。

五是多数期刊开通了微信公众号。有26种期刊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各期刊公众号上大多设置有稿约类或期刊网站等相关内容,成为作者查询期刊投稿方式的新路径,但仍有18种期刊没有开通微信公众号,缺少官网的8种期刊就占据了其中的7席,使之深受中介网站干扰问题难以得到缓解。

2.2 非法中介网站对图书情报学期刊的冲击有所减弱,但仍需重视其辨别

综合分析各刊目前出版状况,结合笔者多年来针对期刊百度搜索经验发现,图书情报学期刊在应对论文中介网站干扰方面与多年前相比有了很大改观,建立官网的期刊比例大幅提高且多数都进行了百度认证,百度搜索排名也基本居于首位,显示度和曝光率显著提高,因此,引导作者规避非法中介网站对其投稿行为的干扰具有很大成效。目前深受非法中介网站干扰的图书情报学期刊主要集中在尚未构建官网的8种期刊以及4种虽拥有官网但却在百度搜索中检索不到的期刊。在百度搜索结果中,与这12种期刊相关联的网站无一例外的全部都是论文中介平台,且多数都冠以某期刊官网主页、投稿主页、官方采稿平台等字样。事实上,通过百度搜索而来的多数期刊中介网站只需稍加观察便可轻松辨识,其辨别方法可参见马爱芳^[3]、王艳军^[7]、晁晓筠^[8]等人的有关论文,在此不再赘述;但在新近的百度搜索中笔者遇到两个较难辨识的中介网站,需加以注意。一是侵害《图书馆学研究》的“理论研究网”(http://tsgxyj.llyj.net/),一是侵害《图书馆学刊》的“瀚海学术服务”(http://tg.pjot.cn/qikan/jiaoy/2102.html)。与早期中介网站相比,“理论研究网”设置较为隐蔽,只能通过该网站最下方几个图书情报学期刊的并列链接按钮发现其奥秘,且该中介平台上的期刊自身信息较多,并有迷惑作者的PDF格式全文标识符(实际仍为论文文摘);而干扰《图书馆学刊》的“瀚海学术服务”中介网站更加隐蔽,无论是页面最下方的系统开发商信息还是整个网站的栏目设置及整体架构等都很难令人迅速与中介网站相联系,只有页面上突出的录用信息查询和在线征稿等内容令人心生怀疑,通过扫描“稿件查询二维码”关注其微信公众号才暴露其端倪。上述两例充分说明中介网站也在不断技术升级,需广大作者时刻戒备。

2.3 假冒期刊网站危害隐蔽,需要掌握其特征

在期刊构建自主网站日益普遍和不断成熟的今天,不法分子也骗术升级,不再单纯依靠较易辨识的论文中介网站来诱骗作者,构建隐蔽性更强的假冒期刊网站便成为他们欺诈作者的新方式,笔者在百度搜索图书情报学期刊官网过程中便发现了11种期刊的假冒网站(见表1)。与中介网站相比,假冒期刊网站甄别难度大,其危害性更强。

综合对比表1中11种图书情报学期刊合法网站与假冒网站不难发现,假冒网站除外观与合法网站相似

表1 11种图书情报学期刊假冒网站情况表

序号	刊名	合法网站	假冒网站
1	《情报资料工作》	http://qbzl.ruc.edu.cn/CN/1002-0314/home.shtml	http://www.qbzlgz.cn/
2	《图书馆建设》	http://www.tsgjs.org.cn/CN/volumn/current.shtml	http://www.tsgjs.cn/
3	《现代情报》	http://221.8.56.50:90/Jwk_xdqb/CN/volumn/home.shtml	http://www.xdqbzz.cn/
4	《大学图书馆学报》	http://dx-ts.cbpt.cnki.net/wke/WebPublication/index.aspx	http://www.dxtsgxb.cn/
5	《中国图书馆学报》	http://www.jlis.cn/jtlsc/ch/index.aspx	http://www.zgtsgxb.cn/
6	《图书与情报》	http://tsyqb.gslib.com.cn/CN/volumn/home.shtml	http://www.tsyqb.cn/
7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http://bjb.tjltj.cn/CN/volumn/current.shtml	http://www.tsgzyyj.cn/
8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http://www.libedit.cn/WKA/WebPublication/index.aspx?mid=lsjl	http://www.tsgllysj.cn/
9	《情报理论与实践》	http://www.itapress.cn/CN/volumn/home.shtml	http://qbllysj.llyj.net
10	《图书馆》	http://www.library.hn.cn/gbkw/tsgzz/	http://www.tsgbjb.cn/
11	《图书馆杂志》	http://www.libraryjournal.com.cn/CN/1000-4254/home.shtml	http://www.tsgzz.cn/

外,其网站架构及信息内容往往很难经得起推敲,但凡具有一定期刊出版知识和投稿经验者便可轻松辨识,但对于那些对期刊出版了解甚少、又缺乏一定投稿经验的新手作者而言,掌握假冒期刊网站基本特征非常必要。目前,在图书情报学期刊合法网站上基本都包含采稿系统平台、最新论文导读回溯和全文下载服务、编辑部新闻及公告、期刊简介和编委会、联系我们等多种关键信息,并占据期刊官网主要版面,主管单位新闻和信息内容很少甚至完全不会刊登或设置,而上述11种假冒期刊网站却完全不同,几乎全部为简单的、无须注册的在线投稿页面,有的甚至还是邮政投稿;期刊导读内容非常陈旧,论文信息多数仅更新至2019年且全部为文摘内容;最便捷和必要的编辑部固定电话竟在“联系我们”栏目中全部缺失,有3种期刊提供了后缀“163.com”邮箱,但与相关期刊正确邮箱比对后发现均为假邮箱,充分暴露了不法分子的恶意所为;网站栏目和信息内容更多突出的则是主管单位信息而非刊社自身信息,通过拷贝复制的简单过时资源及主管单位信息不过是不法分子为装扮假

网站门面而已^[9]；另外，通过对上述11种期刊的假冒网站基本架构、颜色基调、栏目设置及信息内容等多方面比对后发现，这些假冒期刊网站很可能出自同一帮不法分子之手，虽然许多采用同一采编系统平台的期刊合法网站也会表现出基本架构一致特征，但首页下方系统开发商标识及正规投稿平台均可让人迅速释疑，而上述假冒网站则不尽然。

在11种被假冒的期刊中，有9种是CSSCI期刊，2种是北京大学核心期刊，说明不法分子在构建假冒期刊网站时比较关注期刊层次，属于有选择性的构建和冲击，但在中介网站的期刊构建上却对其层次关注较少，是广撒网式的运作模式，无论是核心期刊及以上级别期刊还是普通期刊，均可受到中介网站冲击和干扰。不法分子之所以如此操作，一是因为期刊中介平台是将所有期刊集中整合、依类推介、共用模板，其资金投入相对较少、管理与运作较为容易，而针对单一期刊构建的假冒网站则需要一对一模仿拷贝其相近栏目及对应内容，相比而言资金投入多，构建难度大，维护成本高，因此选取层次较高期刊作为目标对象，其获利更快、更大，更容易收回成本；其次，目前层次较高期刊大多都拥有官网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期刊假网站和真网站混淆在一起方可增加俘获更多作者上当的机率。

因此，从被中介网站和假冒网站干扰程度而言，尚没有构建期刊官网或仍采用邮箱投稿期刊以及层次偏低期刊更容易被中介平台所冲击，而已拥有官网或层次较高期刊则更容易被假冒网站所冲击，被中介网站干扰的程度相比要弱一些。

3 思考与建议

面对日益猖獗的中介网站和假冒期刊网站问题，部分期刊编辑部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如在官网和纸本期刊上刊登警示和提醒通告、百度官网认证、提高百度搜索排名等，一些作者尤其是新手作者也具备了较高的防范意识，纷纷通过各种平台和渠道寻找期刊的正确投稿方式。然而目前这种各刊社单打独斗及部分作者大海捞针式的探寻显然不够，在目前政府部门干预成效滞后、搜索引擎关停非法中介网站不力的情况下，我们必须着力思考期刊编辑部和作者自主应对之策，笔者试图从一个馆员和作者视角提出一些行之

有效的规避策略，供期刊编辑部和作者参考。

3.1 期刊编辑部规避中介网站和假冒网站干扰的策略

如何科学有效地架构、宣传、推广期刊是每个期刊编辑部必须正视的问题，面对当前猖獗的中介冲击及假冒网站状况更需加倍重视。其策略可归纳为以下几条：

一是要重视纸本期刊稿约类信息的定期发布，每年至少发布一次，可安排在首期或最末一期，以方便作者在纸本期刊或到数据库中下载查看，这是作者规避中介网站及假冒网站干扰的最佳途径，也是期刊编辑部抵制中介侵害的首要策略。然而调查中发现，44种样本期刊中有17种在近三年里不曾刊登过稿约类信息，致使作者查找投稿方式无门，只能通过其他方式获取或遍历期刊上的征订、公告（如假冒期刊声明）、选题指南、期刊简介等相关信息，不仅费时费力，还时常搜寻无果，最终导致部分作者陷入中介圈套。由于纸本期刊订阅量呈逐年下降局势，通过数据库下载稿约类信息成为目前的主流方式，因此，建议编辑部将稿约类信息体现在目录页中，也可将官网网址或投稿邮箱类信息标识在单篇文献中，这样，即使某些作者一时查找不到稿约类信息，也能通过下载的文献快速获取其投稿路径。《中国科技期刊研究》在每篇文章的所有页面下方标注其网址做法就值得推广^[10]。

二是要积极构建期刊微信公众号，通过移动网络实现期刊信息广泛传播的同时方便作者对稿约类信息的快速获取。用户关注期刊微信公众号要比在各种搜索引擎中搜索期刊网站容易得多，且目前尚未发现有假冒期刊公众号现象，因此，在移动网络飞速发展的当下，创建期刊微信公众号、刊登稿约类信息是应对目前中介网站和假冒期刊网站猖獗的快捷手段。

三是要积极构建期刊官网、开通投稿系统，并积极入住“百度学术”^[7]，提高显示度，这是学术期刊应对不法中介冲击的根本之策。在网络化、信息化快速发展的当下，创建期刊官网不仅是期刊信息化形势所迫，更是应对当前不法分子侵害作者和期刊出版的必然途径。已拥有官网的期刊通过申请入住“百度学术”、进行百度官网认证、提高显示度、增加曝光率等手段达到抵制中介网站侵害的目的，而尚未创建官网的期刊则要尽早完成构建，适应快速发展的信息化网

络化需求的同时,为抵制中介机构和假冒网站对期刊的侵害贮备有利条件。

四是堵塞系统平台及人为等各方漏洞,让不法中介无机可乘。如增加系统平台投稿或注册繁琐度,禁止已录用稿件随意增改作者,培养编辑人员恪守职业道德等。

五是要随时关注各大搜索引擎上的期刊搜索动向及用户反馈信息,将最新发现的非法中介网站和假冒期刊网站及时公布于官网或纸本期刊上,以提醒作者和警示不法人员^[11]。目前有14种期刊在其网站上发布过此类警示信息,有3种期刊在近三年的纸本期刊上刊登过类似提示,有2种期刊在其公众号上发布了相关提示,上述数据说明,图书情报学期刊对不法中介侵害的重视程度不够,而在纸本期刊和公众号上刊登警示力度更低,这不利于期刊尤其是那些尚未构建官网的期刊抵制不良中介机构和非法网站冲击,因此,今后必须加大其重视力度。可以借鉴《图书馆》网站的做法,将不法中介机构及假冒网站的骗术一一列举,并将正确的投稿路径广而告之,从而有效引导作者规避相关不法网站的干扰;《情报理论与实践》于2020年11月9号在其网站上发布了“最新警示”,向期刊用户公布侵害该刊的假冒网站。2020年12月29日笔者再次检索时该不法网站已被撤销,充分说明及时有效的警示宣传非常必要,能帮助作者快速规避不法分子诱骗。

3.2 作者规避中介网站和假冒网站干扰的策略

作为投稿主体责任人的作者,掌握期刊准确投稿方式是其首要策略,可归纳为以下几条路径:

一是通过纸本期刊或到各大期刊数据库中下载稿约、期刊简介、征订、选题指南等信息,从中查找期刊网址、邮箱、联系电话等,以获取期刊准确投稿方式。

二是通过关注期刊微信公众号寻找其投稿路径。虽然目前中介网站和假冒期刊网站充斥于各大搜索引擎中,但笔者在此次期刊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却没有发现一例假冒的期刊公众号,说明期刊公众号可信度较高,且各期刊公众号大多都设置有投稿须知、期刊简介等栏目,有的甚至还有查稿通道等,因此是目前获取期刊投稿方式最便捷的通道。如《高校图书馆工作》在近三年纸本期刊上未曾发布过稿约类信息,在数据库和搜索引擎中也均检索不到投稿平台,但关注该刊微信公众号便可轻松验证从第三方平台获取

的投稿网址正确与否,《现代情报》《图书情报知识》《中国图书馆学报》《图书情报工作》等期刊的投稿路径也是在纸版期刊稿约信息缺失下可通过其公众号轻松获得。

三是利用已拥有官网期刊主页上的友情链接版块快速跳转至所关注期刊。目前友情链接同学科期刊较多的图书情报学期刊依次为:《图书情报知识》链接17种、《信息资源管理学报》链接16种、《情报理论与实践》链接13种、《图书情报工作》和《情报探索》各链接8种、《情报学报》和《图书与情报》各链接7种、《竞争情报》和《新世纪图书馆》各链接5种等,上述期刊官网的互链接功能大大方便了作者对欲关注期刊的浏览,是获取期刊投稿方式的又一途径。

四是使用网络上较为可靠的第三方平台(但非中介平台)获取期刊投稿方式。如“万维书刊网”(http://eshukan.com/)和“学术刊址网”(http://www.cujc.cn/)。“万维书刊网”是专门发布期刊官方征稿信息的平台。除在期刊基本信息中可查询到投稿方式外,还可通过用户留言框获取各期刊最新投稿方式,但需要翻找用户留言来完成。“学术刊址网”是期刊网址导航平台,依类收集汇总期刊网址(部分期刊为主管单位网址),系统平台设置了纠错功能以提高其更新时效性,但该平台属于个人构建,其数据更新难免有所延迟^[12]。

五是通过其他途径获取期刊投稿方式。包括期刊主办单位网站(如《图书馆学研究》《图书馆》等期刊便可通过主管图书馆网站查找)、同一学科朋辈间口口相传、学科期刊联盟网、学术交流QQ群或在线专业论坛^[13]、学术会议等路径。

在上述方法均无果的情况下,借助搜索引擎查找期刊网址也未尝不可,但掌握中介网站和假冒期刊网站识别技巧非常重要。除可依照本文前述的中介网站及假冒网站基本特征来辨识外,最简便易行的方法就是查看网站上的中介平台痕迹及页面上弹出的QQ对话框及诸多编辑QQ符等,若页面上即时弹出QQ对话框或附有诸多编辑QQ符便可基本断定为中介网站。以《图书馆学研究》2021年7月29日检索为例,笔者打开百度搜索排名第一的链接,发现左上角“优发表网”中介痕迹,排名第三的链接显示“学苑期刊发表”中介平台,点击后发现其左侧排列了5个编辑QQ符,经过笔者多年检索实践发现,中介网站平台的上

述标识是最典型特征^[14]；而对于假冒期刊网站而言，但凡无须严格注册便可投稿且在“联系我们”中缺少编辑部固定电话的期刊网站均为假冒网站，9个图书情报学期刊的假冒网站均是如此。

已有胡国强^[6]、王艳军^[7]、范姝婕^[15]、李娜^[16]等多位作者认为政府部门和互联网商家应协同编辑部和作者共同抵制防范不法中介对期刊和作者的侵害。如国务院于2016年出台《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号文）》，科技部于2020年2月出台《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凡此种均对打击当前非法中介和假冒网站具有重要意义^[4]；百度搜索平台也开辟了期刊官网认证功能，并在用户搜索时对尚未构建官网的

期刊弹出“你搜索的期刊杂志暂无认证的官方网站，请谨慎辨别，避免受骗。如果你是期刊负责人，诚邀‘入驻百度学术’”的温馨提示，以告诫编辑部和作者共同抵制虚假期刊杂志。然而，政府机构和互联网商家种种应对举措的收效缓慢。在此情况下，笔者认为编辑部和作者充分依靠自身力量来主动规避其干扰才是关键策略。总之，只要期刊编辑部能够及早创建自主网站，开通期刊微信公众号，完善稿约类信息发布通道；作者本人在充分了解本学科期刊出版现状的基础上，积极掌握各期刊正确投稿方式和搜索路径，在网络搜索时善于观察考证、谨慎投稿，中介机构网站和假冒期刊网站便会缺少用户支撑，从而失去生存土壤和机缘，学术界和期刊界的净土迟早会重现。

参考文献：

- [1] 谭春林.QQ群消息及“代笔”交易的挖掘与学术不端诱因分析[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9,30(7):721-727.
- [2] 白雪娜,张辉玲.基于作者投稿IP识别的中介代投论文特征分析与防范对策[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9,30(6):582-587.
- [3] 马爱芳,王宝英.中文科技期刊非法网站现状及其对策研究[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6,27(4):401-408.
- [4] 李岩,段玮弘.“论文中介网”可操作代写代发论文的医药卫生类期刊状况及防范措施探究[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20,31(7):796-802.
- [5] 王媛.确定中文学术期刊投稿方式的三条策略[J].图书馆建设,2020(5):181-183.
- [6] 胡国强,杨彦荣,马秋明.科技期刊钓鱼网站常用技术手段分析及防范措施[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8,29(10):987-992.
- [7] 王艳军.有关我国假冒学术期刊网站侵权的研究进展及取得的初步成效[J].编辑学报,2017,29(4):331-334.
- [8] 晁晓筠,李德根.学术期刊虚假网站特征与投稿官网查询的软件实现[J].编辑学报,2019,31(4):437-441.
- [9] 赵媛.从作者心理角度分析科技期刊虚假网站的辨识与防范策略[J].山西科技,2017,32(5):104-107.
- [10] 刘晓艳,赵霞,高建群,等.科技期刊对虚假网站的防范与打击措施[J].2020,32(1):53-55.
- [11] 王艳军.学术期刊面对期刊假冒网站侵权的四大举措[J].科技与出版,2016(8):118-121.
- [12] 钮效鹄,王颖莉,程铁标.应对学术期刊非法网站的可行方法：使用学术期刊网址导航网[J].编辑学报,2018,30(6):604-606.
- [13] 罗晓兰.基于在线论坛文本分析的期刊用户投稿信息需求[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8,29(3):221-225.
- [14] 赵金环.学术期刊在线投稿安全问题研究[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3(3):89-92.
- [15] 范姝婕,付晓霞,任胜利,等.科技期刊“代理”网站存在的原因分析及治理建议[J].编辑学报,2020,32(3):285-290.
- [16] 李娜,顾凯,郑晓南.假冒学术期刊网站多维度治理体系的构建[J].编辑学报,2019,31(6):665-668.

作者简介：段玮弘，鲁东大学党委办公室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信息管理及期刊研究；马爱芳，鲁东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阅读推广及期刊研究。

收稿日期：2022-01-13

本文责编：王晓琳

· 工作研究 ·

文化资本视域下的公共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策略研究

田 利

(河南省图书馆 河南郑州 450052)

摘 要:文化资本理论为图书馆馆藏资源保存、传播和利用提供新的契机。探索文化资本是公共图书馆文创产品开发高质量发展发展的内驱动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价值。文章结合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从公共图书馆文创产品文化资本的表现形态、文创产品文化资本的场域两个维度进行了深层次的探索 and 总结。研究发现,文化资本理论将为公共图书馆文创产品开发理论与实践提供参考,体现在图书馆文创资源的挖掘、文创资源向资本的转换、文化资本的激活等方面,为文创资源转化为公共图书馆文化资本提供更新方式。

关键词:公共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文化资本

中图分类号: G258.2

文献标识码: A

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Public Libra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apital

Abstract Cultural capital theory can be seen as a new opportunity for the preservation, dissemin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library collections.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value to explore cultural capital as an internal driving force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velopment in public libraries. Based on Bourdieu's theory of cultural capital, the article explores and summarizes the manifest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in public libraries and the field of cultural capital i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two dimensions. It is found that cultural capital theory will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velopment in public libraries,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excavation of library cultural and creative resources, the conversio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resources to capital, and the activ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providing an innovative way to transform cultural and creative resources into cultural capital in public libraries.

Key words public library;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cultural capital

1 引言

图书馆是社会信息、知识、文化等整合的产物。文化创意产品(以下简称“文创产品”)是指表达创意思想,开发出欣赏性、文化性、知识增值性的各类商品^[1]。当前学界对文创文献研究较为丰富,其中有关图书馆文创理论在文创产品开发类别、工作流程、阅读推广、文旅融合与文创、开发模式创新动力分析、“资源、服务、空间”3个文创理论模式^[2-7]方面已经

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但缺少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理论对公共图书馆文创产品开发理论与实践指导方面的研究成果。本文引入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理论,旨在充实公共图书馆文创理论,为公共图书馆文创工作的实践提供方向。

2 文化资本理论对公共图书馆文创产品开发的促进作用

文化资本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提出的概念,在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化资本是人们的实践活动产生的具体化的文化资源。以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理论为依据,公共图书馆所持有的馆藏信息资源及其馆藏开发的文化活动即是图书馆的“文化资本”。公共图书馆通过对“文化资本”的开发与利用,以便更好地获取较高的社会地位。中国语境下,从文化资本角度来解读公共图书馆文创,主要集中于身体、制度两个层面上充分体现一种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价值所在。

2.1 文化资本的表现形态

根据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文化资本包括身体化、客观和制度三种表现形态。身体化是指具体的形式,也就是直接存附于个人身体内部,“一个人的惯习成就了他的文化资本”^[8]。惯习主要表现为本土艺术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等文创工作者的精神面貌、知识与技能、影响力等,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区域特色。客观即物化形态,事实存在。文创工作者的研发成果以文创产品的形式存在,如数字文创、卡片、书签、图书、绘画等。制度是体制的形式,以规范性制度形式将文创工作者持有的核心隐性知识与技能加以保护与认可,如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证书、文凭等。身体化是客观和制度的基础^[9]。

2.2 文化资本的场域

文化资本的场域有阶级惯习和社会文化动态变迁(社会再生产场域)两种特征。

2.2.1 阶级惯习

文化资本是一种具有社会分层特性的资本,而阶级惯习是指按照不同资本主体的存量划分为统治阶级、中间阶级和工人阶级,因此,不同阶级所受文化教育不尽相同,持有的知识存量各异。文化资本与上层文化(统治阶级、中间阶级)关联性较高,对上层文化的熟悉与运用能力较强。由于工人阶级受教育水平较低,造成持有的文化资本资源较弱,进而降低了文化消费惯习。诚然,公共图书馆具有公益性、保障文化权益、坚定文化自信等内涵,决定了公共图书馆文创产品工作需要考虑到不同阶级惯习的文化消费水平与主体层面的文化层次与能力。不同阶级惯习不是从社会阶级角度区分,而是以人为本,公平、均等、便利地为不同阶级、地域、民族等读者提供服务,包含读者在公共图书馆文创产品开发中实现了自身文化资本的积累增长,但也要考虑到读者不同群体如年龄、受教

育程度、民族、习俗等方面存在差异,造成各自的文化消费水平各异,针对文创产品的认知各有侧重。文创产品将为不同阶级惯习的场域(如年龄、文化程度等群体)提供多种多样的产品,也符合文化多样性是文化资本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10]。当前,年轻消费者追求时尚、新奇,注重文创产品所蕴含的文化内核和个性化表达。例如上海图书馆造型别致的“至宝”系列项坠、“黄金屋”耳钉、“灵感绽放”胸针、耳钉套装、《江流记》《进瓜记》四色精抄笔记本。少年儿童关注趣味性、知识性。例如顺德图书馆以吉祥物“凤凤”为原型创作的系列文创产品,包括毛绒公仔、亲子装T恤、书袋、文件袋及图画本五类深受少年儿童喜欢的文化产品。中年人注重知识的沉淀与积累。例如云南省图书馆利用特色馆藏,开发出的建水紫陶茶具等特色产品。老年人关心文化商品的价值和实用性。上海图书馆文创产品分为线装笔记本、项坠、豆本和冰箱贴四大品类。可见,公共图书馆应遵循文化资本理论中关于阶级惯习的相关理念来开展文创产品工作。

2.2.2 社会文化动态变迁

布尔迪厄认为,文化资本概念与特定场域中的评价标准的设置密切相关。公共图书馆文创产品开发离不开特定环境的评价标准体系,以及决定这些标准作用于来自不同背景产品研发的影响因素^[11]。历史文化沉淀悠久的图书馆如中国国家图书馆、黑龙江省图书馆、江西省图书馆、河北省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河南省图书馆等,一旦脱离了这些图书馆的文化环境,就难以构成文化资本。同样,2017年9月12日成立的全国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联盟等组织,在相当程度上就扮演着社会文化动态变迁,即社会再生产的单位。不同的图书馆所处环境、历史文化各异,形成丰富的文化资本通过公共图书馆文创产品会展共享平台发布。文创产品开发过程中,长期浸润于社会文化动态变迁的单位所带来的主体参与性和实践经验^[12],引起不同特色馆藏与地方特色相互交融,进而发挥更大的文化价值。

3 文化资本视域下公共图书馆文创产品开发的策略

3.1 丰富文创资源的挖掘范围与形式

公共图书馆文创资源可在充分挖掘馆藏资源中地方文化、地方特色元素等基础上进行,其形式不局限于服饰、日常生活、邮票、文具、纪念品类型产品的研发,也可充分利用新技术挖掘馆藏文献资源,丰富产品形式。当前公共图书馆文创资源的挖掘形式有四种:

(1)以历史文化资源为主的传统文创产品。传统文创产品源自传统文化领域,其挖掘形式主要是将馆藏文献信息蕴含的文化元素转化为日用品、卡片、礼品、文具、服饰等衍生品、印刷品、复制品。公共图书馆文创产品开发需要充分发掘馆藏的传统文化资源,如甘肃省图书馆仿真影印文溯阁《四库全书》木质函盒、影印版文溯阁《四库全书》四种、仿真影印《莫高窟仿古图》等特色典籍。吉林省图书馆有《谷园印谱》主题抱枕、笔记本。辽宁省图书馆有“奉天记忆”系列:泥人、文具、剪纸。云南省图书馆有以二十四节气为主题的文创,如二十四节气茶盏等。山东省图书馆开发具有鲜明的鲁图色彩的文创产品,如《木兰秋狝图》系列的书灯、书立等产品,极富创意性、实用性和趣味性。其中《木兰秋狝图》是山东省图书馆重要馆藏画作,工笔绘就的皇家围猎场景,场面恢弘、色泽明快,非常适合文创产品的开发。

(2)以现代题材为主的时尚文创产品。现代题材主要是指文创产品的形式,大多颇具趣味性,符合现代消费思维(品质、时尚、情感)。如福建省图书馆有“闽南意趣”系列书签、抱枕、杯垫。广东省顺德图书馆的“顺图凤凤”注册商标,即以凤凰为原型、具有顺德凤城特色的“凤凤”为吉祥物设计而成。中国国家图书馆在第25个“世界读书日”与天猫联合打造“读书让人可爱”世界读书日主题营销活动,在国家图书馆天猫旗舰店展销汤显祖与莎士比亚T恤、“书中自有黄金屋”金属书签和永乐大典“书生”胸章等文创产品。

(3)以科技创新为主的数字化文创产品。文化与科技创新的融合,让文化显得更有触感。数字化文创产品是指公共图书馆利用智能技术、可视化、VR(Virtual Reality,虚拟现实)/AR(Augmented Reality,增强现实)技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打造一种文化体验,形成全新的参观模式。公共图书馆科技创新元素主要体现为IP运营、人工智能设计等方面,如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发了一系列经典“IP”,如永乐大典主题、

庆赏升平主题等。赣州市图书馆有涂画科技智能书法台,让创新的展演、展呈形态获得读者的认可。河南省图书馆文创中心研发了“图书馆智能采访管理系统”等。贵州省图书馆有贵州红色文化系列数字文创,开展沉浸式阅读体验。

(4)以“文创+”为主的创新型文创产品。“文创+”产品设计要求主题鲜明,立意新颖,构思巧妙;作品原创,积极向上,富有感染力;独特新颖又不失传统韵味。主要包括跨界产品的设计与开发,如与品牌运营公司、酒店、旅游景区、航空等行业合作开发系列主题旅游产品等。“文创+文旅”跨界服务模式正在公共图书馆兴起,并广泛普及与推广。当前,文化和旅游产品设计总体上发展态势强劲,形成了许多引领时尚的创意产品,满足文化需求的个性化产品、旅游与科技融合的高端产品。如陕西省图书馆联合西安大唐品牌在图书馆内开设了“陕图大唐文创”体验店,采用“体验+创新”的方式进行文创开发,开展“拓印书香人生”“抖出孩子气”等文化体验活动,展现“可看”“可玩”的图书馆创新形象。此外,公共图书馆与咖啡馆合作,形成“图书+咖啡+文创”创新公共服务模式。如厦门市湖里区图书馆引进“图书+咖啡+文创”元素,将图书馆分馆搬进位于在华美空间文创园的安吉努咖啡馆,全市首家“图书+咖啡+文创”模式的“三嘉悦读体验馆”让图书馆更贴近市民生活,让阅读融入生活。

3.2 畅通文化资本的转换路径

公共图书馆文创产品与文化资本之间的转换前提条件在于文创资源的挖掘。图书馆拥有丰富的文创资源,通过文创人员挖掘、捕获、遴选、处理、分析、组织、整合、吸收,形成有价值的文创资源,进而转化为文化资本。实现设计与开发的文创产品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真正发挥资本的作用。公共图书馆文化资本包含文创资源,但文创资源并不等于文化资本。公共图书馆文创资源只有经历一个资本转换的过程,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实质性的价值,具体而言就是将文创资源导入市场,根据市场需求,设计、生产与销售各种各样的文创产品;充分利用资本的能动性作用来推动文创产品文化资本市场化,同时在文创产品设计与开发的公益性基础上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补贴文创产品设计与开发的可持续发展。公共图书馆在从事文创产品设计与开发的过程中,坚守

“传承文化,服务社会”的初心,始终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要兼顾经济效益。遗留的历史建筑、流传的民间故事、特色馆藏文献、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公共图书馆文创资源,通过产品设计、生产、销售以及相关服务,实现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例如,用户购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升平署戏曲人物画册《庆赏升平》系列文创产品,实现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未偏离文创产品设计与开发的文化价值核心即图书馆主导的文化价值观^[13]。同时,公共图书馆独具特色的文创产品的文化资本转换可以依托图书馆文创中心、文创商店以及景区、景点、酒店、车站等人口密集地点开展推广销售,也可以通过公共图书馆网站上文创产品信息栏目、天猫等线上销售平台进行销售。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销售体系,拓展公共图书馆文创产品文化资本转换的深度、广度,提升公共图书馆文创产品知名度、社会影响力。

3.3 最大程度地激活文化资本

公共图书馆文创产品设计是产品开发内容的首要条件,创新新颖、特色鲜明、贴近生活的产品,容易受到用户喜爱。产品设计思路遵循创新、实用、时尚等特点,因此,公共图书馆文创文化资本应梳理整合物质文化资源(建筑、广场空间、雕塑与装饰等),重塑特色空间,充分利用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典故、习俗信仰、传统节日、传统手工艺技术、生活方式等),突出不同类型公共图书馆馆藏文献信息特色,科学评估,分类整理与开发,挖掘丰富的文化资源,提升公共图书馆开发文创产品工作绩效。未来,公共图书馆文创产品的激活路径仍需扎根传统、继承创新,依托更多馆藏资源,持续深挖优势文化资源,转换为文创资源,汇集文创人员的智慧,开发适合各类消费群体需求的文创产品。

(1) 设计出以名人字画、古籍珍品为主的复仿品,高精度、智能化的数字化产品。例如重庆图书馆仿古笔记本封面取自所藏善本古籍书——《御定历代题画诗类》;湖南图书馆以馆藏名画“徐悲鸿双马图轴”“齐白石寿字八仙图轴”等为代表的十大馆藏字画高仿;黑龙江省图书馆的《大般若波罗蜜多心

经》影印版;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金刚经》高仿影印本。

(2) 开发一批走进大众日常生活、工作与学习的文创产品。公共图书馆面向大众生活需求,开发一批体现公共图书馆文化内涵、贴近日常生活、兼具生活美学和实用价值的文创产品,如节庆定制、纪念品、办公文具、家居用品等。例如重庆图书馆70周年纪念邮册。

(3) 统筹兼顾全国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联盟与区域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联盟。截止到2019年1月8日,全国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联盟成员馆有116家,开通“全国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一体化平台”和“全国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联盟天猫旗舰店”两个销售平台,未曾加入的图书馆可申请加盟,借助这两个销售平台营销文创产品。同时,也要优化整合区域内图书馆资源,创建区域图书馆文创产品开发联盟平台,开展深度互信与紧密广泛的合作,与会员单位共同深挖区域内文化资源,共同开发文创产品。

4 结语

公共图书馆文创产品开发不仅突出实践活动,也应有相应的理论支撑,进行文创产品开发与推广,而文化资本理论具有高度跨界属性^[14],运用文化资本理论指导公共图书馆文创产品开发具有重要的价值与现实意义。公共图书馆是文化资本的实体载体,文化资本决定了公共图书馆的建立与存在、建构与发展。同时,公共图书馆也是文化资本的生产场域,促进个体乃至整个社会持续产生文化资本增量正是公共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使命所在。因此,本文从文化资本理论视角切入,研究当前公共图书馆文创产品开发策略,旨在挖掘馆藏特色文化,提炼图书馆视觉品牌元素,通过创意设计、科学技术与传统文化的融合,打造品牌化文创,充分利用文创商店等直接营销或者公共媒体、中间商等间接营销方式进行产品营销推广。

参考文献:

- [1] 李俊岭.国外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现状调查与分析[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0(10):45-52.

- [2]王毅,柯平.公共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类别调研与分析[J].图书情报工作,2018(3):21-32.
- [3]王光媛.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工作流程及模式研究[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9(10):25-32,74.
- [4]张晓阳,陆欣怡.图书馆文创产品应用于阅读推广的研究[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9(4):6-9,33.
- [5]董燕萍.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模式创新动力分析[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9(7):8-11.
- [6]赖璨,陈雅.文旅融合语境下我国图书馆文创品牌创新策略研究[J].图书馆,2020(11):102-108.
- [7]陈乃嘉,詹庆东.“图书馆+文化创意”理论模式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8(22):15-21.
- [8]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3.
- [9]刘尚楠.基于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探究中国传统技艺“非遗”文化品牌建设[J].今古文创,2021(6):75-77.
- [10]杜亮,刘宇.“底层文化资本”是否可行——关于学校教育中的文化资本与社会流动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J].中国青年研究,2020(5):36-42.
- [11]姜冰.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理论依据研究[J].中国博物馆,2020(1):8-12.
- [12]徐拥军,卢林涛.“文化—资本”框架:对历史文化村镇文化资源保护与传承的新解读[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104-109.
- [13]刘威妍.我国公共图书馆开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探讨[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8:11.
- [14]徐望.文化资本视阈下博物馆美育的起点与进路[J].博物馆管理,2022(1):51-60.

作者简介:田利,硕士,河南省图书馆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馆文创。

收稿日期:2022-03-14

本文责编:孙晓清

(上接第31页)

- [7]陈超.用设计思维建设,用连接战略发展——大阅读时代公共图书馆发展战略思考[J].图书馆杂志,2018,37(1):4-7.
- [8]王韧.图书馆中的设计思维[J].图书情报研究,2019,12(3):62-66.
- [9]蒋莹.基于设计思维的公共图书馆创客教育模式构建与实践研究:以广州图书馆为例[J].图书情报研究,2019,12(2):65-70.
- [10]邵雪.“5W1H分析法”视角下看“设计思维”在我国公共图书馆本土化[J].图书馆研究,2020,50(1):25-28.
- [11]陈欣.设计思维在公共图书馆中的应用研究:以广州图书馆创客空间为例[J].图书馆,2020(4):79-84.
- [12]东莞中心城区“一心两轴三片区”怎么建,看这条推文就知道了[EB/OL].[2021-10-10].<https://ishare.ifeng.com/c/s/7qoeRCdzCL>.
- [13]东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东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的通知[EB/OL].[2021-10-10].http://www.dg.gov.cn/shatian/tzfw/tzgg/content/post_3021092.html.
- [14]2021年东莞市政府工作报告[EB/OL].[2021-10-10].http://www.dg.gov.cn/jjdz/dzyw/content/post_3465691.html.

作者简介:王金丽,东莞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馆管理与阅读推广。

收稿日期:2022-05-24

本文责编:孙晓清

· 异域采风 ·

英国志愿者组织运营管理社区图书馆的实践及启示*

朱 敏 傅文奇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福建福州 350117)

摘 要: 志愿者组织参与图书馆运营管理是图书馆社会化运营的一种重要模式,英国由志愿者替代有酬工作人员运营管理社区图书馆的方式正在兴起。文章对英国志愿者组织运营管理社区图书馆的三种模式,即独立运营模式、管理社区模式和支持社区模式进行分析,认为由志愿者组织运营管理社区图书馆是一种降低政府财政压力、提高图书馆服务灵活性的有力手段,但这种运营管理模式受图书馆理事会资金支持的持续性和志愿者素质的影响较大。英国经验对我国的启示有:健全志愿者组织的保障机制、完善志愿者组织的服务管理、鼓励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图书馆运营。

关键词: 社区图书馆; 志愿者组织; 运营管理模式; 英国

中图分类号: G251; G259.561

文献标识码: A

Practice and Enlightenment of British Volunteer Organizations in Operating and Managing Community Libraries

Abstract Volunteers' organizing and participating in library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are an important model of socialized library operation. In the UK, volunteers are replacing paid staff to run and manage community libraries. The article analyzes three models of community library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by volunteer organizations in the UK (independent operation, community management and community support). The analysis finds that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community libraries by volunteer organizations is a powerful means of reducing financial pressure on the government and increasing the flexibility of library services. However, this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model is influenced by the continuity of financial support from library boards and the quality of volunteers. The insights of the British practice for China are: to improve the guarantee mechanism of volunteer organizations, to improve the service management of volunteer organizations, and to encourage community resi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operation of community libraries.

Key words community library; volunteer organization; operation management mode; UK

1 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各国政府由于受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等经济理论的影响,改革政府治理的方式,进一步推动市场经济进入公共服务领域。

由此,政府全额拨款支持图书馆发展的供给服务模式发生重大转变,图书馆社会化运营成为一种新兴的图书馆服务模式。志愿者组织运营管理社区图书馆是图书馆社会化运营的一种重要模式。具有社区自治和公民参与传统的英国,在此方面已有长期的经验。志愿者组织运营管理社区图书馆主要指在社区里用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公共文化视角下政府购买图书馆服务的风险控制研究”(项目编号:20BTQ001);福建师范大学优秀研究生学位论文培育项目“英国公共图书馆社会化运营模式研究”(项目编号:LWPYS202127)的研究成果之一。

志愿者替代有酬全职馆员运营管理图书馆, 志愿者不再仅起到补充作用, 而是成为图书馆运营管理的实际主体。志愿者组织运营管理图书馆的方式大大降低了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成本, 使英国政府计划关闭的一些公共图书馆得以继续保持开放, 有力地保障了公民基本阅读权利。

目前国内外已有一些关于图书馆志愿者的研究。如William^[1]、Beth和Juliet^[2]通过对图书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的深入调查, 发现图书馆志愿者对于专业的图书馆工作人员而言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能够有效提高公共图书馆的服务水平。Joomi等人^[3]通过对韩国公共图书馆志愿者服务进行调查, 认为志愿者需要提高工作效率。杨晶^[4]通过分析美国图书馆志愿者服务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组织管理模式, 总结了美国社区图书馆志愿者服务的成功经验。文蓉^[5]通过参与英国社区图书馆志愿者服务活动, 分析图书馆服务和运行机制, 认为社区图书馆经托管后实现了政府、社区居民和企业三方的共赢。苏日娜^[6]认为志愿者的诉求影响图书馆的发展和走向, 理应受到重视。周永根、刘骁^[7]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框架对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图书馆的意愿展开实证分析, 研究发现志愿者支持和周边邻居支持带动对其参与意愿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朱蓓蓓^[8]对国内外学者有关英国图书馆志愿者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 发现国内学者缺少对于英国图书馆志愿者的系统论述。

以往研究虽然涉及社区图书馆的志愿者, 但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志愿者对社区图书馆服务的影响, 且国内外学者对英国社区图书馆的志愿者研究较少, 更未对英国志愿者组织运营管理社区图书馆的模式进行系统论述。在我国建设全覆盖的总分馆体系背景下, 肖鹏等人^[9]对广州街镇图书馆进行调研, 提出一条由区图书馆主导, 与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文化站共同建设和管理分馆的发展路径, 这一发展路径对于四级全覆盖的总分馆体系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与英国社区图书馆管理模式有着相似之处。基于此, 深入探讨英国志愿者组织运营管理社区图书馆的经验和教训, 对推动我国基层图书馆发展以及志愿者组织的建设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2 英国志愿者组织运营管理社区图书馆的背景

英国志愿者组织运营管理社区图书馆的模式产生于特定的政策和经济背景之下。受治理理念变革的影响, 英国政府积极将市场机制引入公共服务领域。为了提高效率和确保资金效益, 撒切尔政府提出了“强制竞争性招标”政策 (Compulsory Competitive Tendering, CCT)^[10], 推动图书馆的运营管理工作交付给社会力量, 但由于该政策过度追求低成本, 使公共服务质量严重下降, 导致社会公平矛盾突出。为了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 英国工党通过《1999年地方政府法》(Local Government Act 1999) 第一部分正式确立了“最佳价值” (Best Value) 政策^[11], 去掉了“强制”的标签, 强调与社会力量的伙伴关系。2010年卡梅伦当选英国首相后提出“大社会”政策, 进一步强调了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作用, 赋予社区更多权力, 鼓励人们在社区中发挥积极作用^[12]。《2011年地方政府法》(Local Government Act 2011) 实行一系列广泛的措施, 将更多的权利下放给议会和社区, 并赋予地方社区对地方决策更大的控制权^[13]。这一系列政策的提出, 为英国社区志愿者组织成为社区图书馆运营管理主体提供了政策保障。

同时受财政赤字影响, 英国政府为了减少开支, 决定削减图书馆经费, 导致英国公共图书馆在图书馆开放时间、图书采购经费和工作人员数量上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削减, 甚至闭馆。据英国特许公共财政与会计协会 (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Public Finance & Accountancy, CIPFA) 发布的公共图书馆统计数据显示, 英国的公共图书馆数量已从2009—2010年度的4 482所下降至2015—2016年度的3 850所^[14]。为了应对图书馆危机, 政府决定把权力从中央下放到地方, 地方政府则为了节省政府开支, 纷纷采取缩减对图书馆的拨款或直接关闭图书馆的措施来解决财政赤字问题。对于民主和权利意识强烈的英国民众而言, 获得公共图书馆高质量服务是公民的权利, 政府关闭图书馆或造成图书馆服务质量下降的行为引起了民众的不满, 英国图书馆界也纷纷发起了拯救公共图书馆运动来抗议政府削减图书馆服务和关闭图书馆的行为。最终, 在社区和志愿者组织的申请下, 英国一些地方政府同意以志愿者组织运营管理社区图书馆的方式维持当地社区图书馆服务。

在志愿者组织运营管理社区图书馆的模式下, 图书馆理事会作为英国具体负责公共图书馆事业的

组织,为确保提供全面高效的服务,给予了当地社区图书馆运营管理各方面的支持,志愿者组织则通过与当地图书馆理事会建立良好的牢固关系促进社区图书馆有效运营。英国数字、文化、媒体和体育部(Department for Digital, Culture, Media & Sport, DCMS)作为主管文化的政府机构,承担着监督和促进图书馆理事会改进公共图书馆服务的责任^[15]。在社区管理图书馆方面,DCMS通过考察当地社区需求,为社区图书馆运营管理提供指导。在图书馆理事会的支持下,英国志愿者组织运营管理社区图书馆的模式发展迅速,服务于社区图书馆的志愿者规模不断壮大。据英国《卫报》报道,由志愿者、社区成员运营管理的社区图书馆数量从2010年约10所上升为2017年的500所,占比超过全英公共图书馆的10%。在2014至2017年间,志愿者运营的社区图书馆新增人数约一万人,截至2017年,服务于公共图书馆的志愿者人数逾五万人。到2018年,公共图书馆志愿者数量达51 394人^[16]。

3 英国志愿者组织运营管理社区图书馆的模式

根据社区图书馆所享有的公共图书馆服务的范围以及志愿者组织参与程度的不同,可将英国志愿者组织运营管理的社区图书馆划分为志愿者组织独立运营(Independent)、管理社区(Community Managed)和支持社区(Community Supported)三种模式^[17]。

3.1 独立运营模式

3.1.1 模式概述

(1)运营责任:志愿者组织独立运营模式下的社区图书馆不纳入公共图书馆管理范围,也不享有公共图书馆的法定服务。但由于法律责任的规定,地方政府仍有义务向社区居民提供一定的图书馆服务,为社区图书馆提供部分资金支持,如为社区图书馆场地租赁提供租金,并提供设施和修缮费用方面的援助,支付社区图书馆的信息技术、公用事业、访问公共图书馆管理系统和其他运营的费用。在独立运营模式下,社区志愿者组织主要承担的工作有图书馆基本服务的提供、志愿者的管理、运营组织的创收等。

(2)服务内容:独立运营模式是社区志愿者组织为主导、地方政府为辅的运营管理模式。通常,该模式是在公共图书馆分管的社区图书馆面临关闭风

险时,社区志愿者组织主动愿意承担图书馆的管理运营,向社区居民提供文献资源、图书馆活动和小额收费服务等,但无法享有地方公共图书馆提供的基本服务。

(3)人员组成:服务人员由具有慈善性质的志愿者组织和招聘的带薪兼职人员组成。

(4)资金来源:资金来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志愿者的筹集资金能力和管理层的创收能力。社区图书馆通过经营咖啡店、出售二手书籍、收取印刷服务费的方式以及募捐和资助的方式获得运营资金。

3.1.2 服务案例^[18]

布莱克芬(Blackfen)社区图书馆是位于布莱克芬高街市中心的社区图书馆。2015—2016年度,新一代教会信托基金会(The New Generation Church Trust)向当地的图书馆理事会提出在布莱克芬开设社区图书馆的申请并获得批准。贝克斯利区(Bexley)通过季度拨款支持布莱克芬社区图书馆,为图书馆场地租赁、设备设施的修缮及其他运营项目提供资金援助。

该图书馆管理人员由新一代教会信托基金的受托人领导,受托人也是一名志愿者。图书馆工作主要由经验丰富的志愿者承担,他们负责馆藏资源建设与管理、图书馆管理系统运行以及提供印刷服务,领导人员负责组织和协调图书馆活动方案,如儿童故事时间、招募志愿者和协调与其他组织的联系等。带薪兼职工负责协助财务管理、设施管理和咖啡店的运营。图书馆有一个多达27名志愿者的团队,每周有15名图书馆志愿者和4名咖啡店志愿者,并通过招聘兼职工,使营业时间从每周25小时延长至32小时(周二至周五上午10点至下午5点,周六上午9点至下午5点)。此外,图书馆通过开展筹款活动,获得本地商户的一些特别资助。图书馆还推出“图书馆之友”计划,为每年缴付订阅费的会员提供特别优惠,例如在咖啡店免费提供热饮及场地租用折扣。咖啡店的所有收入、二手书籍的少量销售以及印刷和复印的小额收费都归社区图书馆所有。

3.1.3 成效和风险

(1)成效。独立运营模式下的社区图书馆可以获得当地图书馆理事会无法获得的某些类型的资金,例如来自社会企业或慈善基金会的捐赠。由于志愿者独立运营的图书馆不属于法定公共图书馆管理范围,不必遵守1964年《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法》有关公共图书馆公益性质的规定,可以通过向会员收取会费或者

书本费来筹集运营资金,为社区图书馆拓宽了资金来源渠道,降低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是一种避免图书馆关闭的有力手段。

(2) 风险。第一,该模式下的社区图书馆运营资金主要来自运营管理者的创收能力和志愿者的筹资水平,一旦资金来源缩减或中断,图书馆将面临服务质量下降,甚至关闭的风险。第二,社区图书馆服务人员主要由无偿志愿者和带薪兼职人员组成,缺乏专业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指导。工作人员如果没有经过专业的岗前培训以及制定完善的志愿者管理制度,就可能存在服务专业性不强和服务质量稳定性差的风险。

3.2 管理社区模式

3.2.1 模式概述

(1) 运营责任:管理社区模式下的社区图书馆被纳入当地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享有公共图书馆提供的基本服务。当地图书馆理事会向社区图书馆提供运营费用、馆藏资源、信息技术、志愿者的培训和专业人员的指导等支持,志愿者组织负责社区图书馆的日常的管理运营工作。

(2) 服务内容:管理社区模式是社区志愿者组织为主导、公共图书馆辅助支持的模式。由于该模式下的社区图书馆归属于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其功能类似我国公共图书馆的分馆,社区图书馆用户可以通过借通还公共图书馆文献资源,并可以访问图书馆数字资源。

(3) 人员组成:服务人员主要是无偿的志愿者,个别地区公共图书馆提供专业图书馆人员。

(4) 资金来源:资金来源主要依赖公共图书馆理事会的资金支持和社区志愿者组织筹款能力。

3.2.2 服务案例^[19]

查尔文特圣贾尔斯(Chalfont Saint Giles)社区图书馆位于查尔文特圣贾尔斯村中心,由白金汉郡议会于1966年建立,曾作为地方公共图书馆分馆运营40年。2006年11月,地方政府关闭了包括该馆在内的8个分馆,并为该村提供移动图书馆服务。但在村民强烈反对关闭图书馆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同意社区图书馆以自我管理的方式继续运行。

社区在“图书馆之友”和教区委员会的支持下,于2007年1月开设了一个自我管理的社区图书馆。2010年,地方政府同意与该社区合作,并向社区图书馆提供资金、信息技术和系统、图书馆培训和馆藏资

源等方面的支持。查尔文特圣贾尔斯教区委员会为社区购买了图书馆场地永久使用权,社区图书馆人员由志愿者组成,负责图书馆的运营管理工作。社区图书馆向居民提供与当地公共图书馆相同的服务,使用图书馆管理系统,通借通还公共图书馆的馆藏资源。社区图书馆在自我管理下,图书馆开放时间增加了70%,达到每周34.5小时。2017年查尔文特圣贾尔斯社区图书馆被授予英国志愿团体的最高奖项——“女王志愿服务奖”(Queen's Award)。

3.2.3 成效和风险

(1) 成效。管理社区模式下的图书馆减少了地方公共图书馆的运营成本,并使原本计划关闭的社区图书馆得以保留。许多由志愿者组织管理的社区图书馆至少保留了以前的开放时间,甚至增加了图书馆的开放时间。与受财政拨款限制的地方公共图书馆相比,社区管理的图书馆通过志愿者组织的创收和接受捐赠,可以获得不同途径的资源,同时在公共图书馆的专业支持下,可以提供更好的图书馆服务。社区志愿者对于社区居民文化需求更加了解,社区图书馆由志愿者构成的组织运营,能够深入了解居民文化需求,提升服务灵活性与创新性。

(2) 风险。第一,该模式下的社区图书馆由于财务的可持续性取决于地方公共图书馆理事会的持续支持和社区筹款能力,理事会支持中断或预算削减,以及社区筹款能力不理想,都将使社区图书馆面临资金支持短缺和服务质量下降的风险;第二,由于该模式很少有专业的图书馆工作人员,所以很大程度上依赖志愿者,如果来自志愿者的支持减少,将很难保证社区图书馆稳定的开放时间和服务质量。

3.3 支持社区模式

3.3.1 模式概述

(1) 运营责任:支持社区模式的图书馆被纳入公共图书馆网络,完全享有公共图书馆提供的法定服务。该模式下的社区图书馆与地方公共图书馆系统联系最为紧密,由图书馆理事会领导和支持,由具有慈善性质的非营利组织创建。地方政府通过与运营社区图书馆的志愿者组织签订合作协议,由当地公共图书馆负责提供全面的图书馆服务,志愿者组织负责图书馆日常服务的提供,保证图书馆开放时间。

(2) 服务内容:该模式是由地方公共图书馆主导、社区志愿者组织为辅的总分馆类型,社区图书馆

享有地方公共图书馆的全部资源,包括馆藏资源、计算机管理系统,以及专业图书馆人员,用户可以利用公共图书馆提供的全部服务。

(3) 人员组成:服务人员主要由图书馆理事会配备的专业人员和社区志愿者组成,人员通过接受总馆的正式培训,更加熟悉图书馆的业务,能够更好地提升服务能力。

(4) 资金来源:运营资金主要来源于图书馆理事会的资助和志愿者组织的筹款。

3.3.2 服务案例^[20]

文多弗(Wendover)社区图书馆成立于2012年12月1日,是白金汉郡的一所县图书馆支持的社区图书馆。该社区图书馆由当地图书馆理事会以及少数专业图书馆员管理,并由具有慈善性质的文多弗社区图书馆信托基金的委员会提供志愿者和筹款等支持。白金汉郡议会与文多弗社区图书馆签订了为期5年的合作协议,包括:地方政府负责图书馆建筑物的外部维护和装修,提供资金补助、馆藏资源和在线资源,连接图书馆管理系统,提供上网的公用电脑以及人员的培训。图书馆专业工作人员得到由志愿者组成的志愿者小组的协助,共同完成社区图书馆的运营管理工作,志愿者的作用包括协助举办儿童活动、每月茶话会、电影俱乐部、园艺、筹款、宣传等活动。该图书馆每周开放30.5小时,访客平均每月超过3 000人,每年约有44 000人次。

3.3.3 成效和风险

(1) 成效。该模式的社区图书馆运营纳入当地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在少量专业人员的参与和多数社区志愿者的支持下开展运营管理,使公共图书馆运营成本降低,延长了社区图书馆开放时间,保证了图书馆服务质量。志愿者组织可以从事创收活动,增加社区图书馆的运营资金,减轻当地政府的财政负担。

(2) 风险。支持社区模式下的社区图书馆存在的风险主要体现在志愿者的招募与管理方面。第一,当志愿者组织运营图书馆的动力减弱,且新志愿者招募难度加大时,如何吸引和留住训练有素的志愿者是个较大的问题;第二,安排志愿者轮班和培训志愿者需要耗费专业工作人员更多时间。

4 启示

当前,我国政府正积极转变文化治理思路,加大简政放权力度,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在国家层面的支持下,公众参与公共图书馆志愿者服务的积极性日益提高,但仍然存在管理松散、缺乏有效的激励制度等问题,不利于志愿组织和志愿服务的可持续发展^[21]。通过借鉴英国志愿者组织运营管理社区图书馆的经验,可以为我国社区图书馆提供发展思路。

4.1 健全志愿者组织的保障机制

英国志愿者组织运营管理社区图书馆取得良好成效,与英国建立了完善的志愿者组织保障机制密切相关。首先,法律 and 政策的提出为志愿者组织运营管理社区图书馆提供了制度保障。英国通过《慈善法》确立了志愿者组织的法律地位,强化了志愿者组织的制度基础^[22]。社区志愿者组织自治图书馆的方式,鼓励人们在社区中发挥积极作用,符合英国政府下放中央权利、赋予社区更多权力的“大社会”政策的要求。其次,英国志愿者组织运营管理社区图书馆的模式在考虑实施时,图书馆理事会将考察社区图书馆需求,通过与志愿者组织沟通协商后,与运营社区图书馆的志愿者组织签署合作协议,明确双方的责任与义务,同时由DCMS负责监督图书馆理事会提供图书馆服务的情况,这一系列举措为志愿者组织运营管理社区图书馆提供了运营保障。

我国社区图书馆如果应用志愿者组织运营管理的模式也应注重志愿者组织保障机制的健全。首先,应该健全对志愿者组织的法律保障,在政策上确立志愿者组织的法律地位,强化志愿者组织的制度基础,为志愿者组织培育良好的发展环境。其次,县区级公共图书馆可以通过专业的考察评估,为符合志愿者组织运营条件的社区图书馆挑选合适的合作伙伴,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与志愿者组织达成合作,合作协议应明确规定合作内容、合作期限、监管范围等,总馆通过全部提供或者部分提供专业人员、运营经费、设施设备为志愿者组织提供技术和经费支持,允许社区图书馆用户访问公共图书馆资源,为社区图书馆提供良好的运营保障环境。

4.2 完善志愿者组织的服务管理

志愿者组织服务管理的完善对于图书馆志愿者组织的发展而言尤其重要,图书馆志愿者服务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招募与培训、绩效考核、评价激励等。

英国志愿者的招募渠道和形式多样,主要有活动宣传、图书馆网页或广告宣传、海报、口耳相传等^[23]。招募和培训流程有:社区居民根据其参与意愿在线填写志愿者申请表,社区图书馆志愿者组织通过面试遴选志愿者,制定志愿者培训清单、志愿者关怀计划,给志愿者发放义工手册和健康安全责任书,针对志愿者进行信息和安全培训^[24]。英国志愿者组织对志愿者的激励主要是为志愿者们提供各类活动奖励、纪念品以及服务证书等。完善的志愿者组织服务管理体系使英国志愿者组织实践经验渐趋丰富,形成了庞大的志愿者服务人群。

我国的志愿者组织在服务管理方面可以借鉴英国经验,从完善志愿者组织管理制度入手,首先是规范志愿者招募程序,形成一套成熟的招募体系,搭建多种形式的志愿者招募平台,更大程度地吸引新的志愿者加入,建立社区图书馆志愿者的遴选制度,保证志愿者质量,提高志愿者招募效率,为后续志愿者管理工作提供基础;其次是加强志愿者培训工作,通过给志愿者开设专业教育培训课程,定期考核志愿者学习进度,使志愿者尽快掌握工作内容,加强自身专业能力;再者是针对不同背景、不同社会经验的志愿者匹配合适的志愿者工作岗位,在分工明确的同时考虑实际情况以保证志愿者服务工作的灵活性;同时还需建立适当的志愿者激励机制,根据绩效考核和平时表现对表现优秀的志愿者给予适当的激励,对工作效果不佳的志愿者进行教育培训或终止其职务;最后是建立健全相应的志愿者保障机制,主要包括组织保障、经费保障以及制度保障^[25]。

4.3 鼓励社区居民参与图书馆运营

英国民众具有强烈的文化权利和监督意识,志

愿活动的社会氛围十分浓郁,当社区图书馆面临被迫关闭的风险或背离公益性的服务性质时,社区居民会自发组织在一起采取罢工等手段进行抗议或自觉参与到图书馆的管理运营中去。如2010年10月,英国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影响广泛的被认为是“英国图书馆界的声音”的拯救图书馆运动,抗议政府削减图书馆经费甚至关闭图书馆的行为。英国各地的Friends of Library、Library Users Group等团体组织与民众自发举行了诸多请愿、集会、募集活动^[26],一些志愿者团体申请以慈善性质的机构运营管理面临关闭的图书馆。

我国目前社区居民的文化权利和监督意识与英国相比还比较薄弱,难以自发形成图书馆志愿者管理队伍,但英国鼓励社区居民积极加入志愿者组织并参与社区图书馆运营的方式同样值得我们学习。社区居民作为社区图书馆服务的消费者、监督者和反馈者,更加了解居民文化服务需求。社区居民积极加入志愿者组织从而参与社区图书馆的运营工作,对社区而言,可以加强社区凝聚力,丰富社区生活;对志愿者而言,志愿者本人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回馈社会,增加工作经验,获得个人满足感和社会归属感。为此,首先我国政府相关文化机构应培育社区居民积极投身志愿事业的社会氛围,通过志愿者支持和周边邻居支持带动居民参与意愿,鼓励社区居民加入志愿者组织,发挥其在社区图书馆建设中的主人翁精神^[27]。其次,社区居民要提升参与图书馆运营管理的专业能力。通过学习加强对图书馆服务专业知识的了解,及时了解公众需求,为图书馆运营管理提供切实可行的意见。最后,社区居民应该积极用好监督和评估的权利,通过多渠道监督手段监督社区图书馆的运营管理工作。

参考文献:

- [1] WILLIAM F.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Volunteer Labor on Public Library Employment[J]. 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 2008, 29(6): 525-538.
- [2] BETH H, JULIET E. The Use of Volunteers in Local Study Library Projects: A Case Study of the Walter Gardiner Photography Project[J]. Evidence Based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Practice, 2012, 7(1): 41-52.
- [3] JOOMI O, SUJIN O, WONJIN K. A Study on the Volunteer Activity Management of Public Libraries[J]. Journal of the Kore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009, 26(4): 201-225.
- [4] 杨晶. 美国社区图书馆志愿者管理模式探析[J]. 图书馆建设, 2017(2): 90-96.
- [5] 文蓉. 英国社区图书馆的服务和运行机制: 以Uppertorpe社区图书馆为例[J]. 图书情报工作, 2017, 61(9): 74-79.

- [6] 苏日娜.中国社区图书馆运营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诉求调研:广州市兴仁图书馆案例分析[J].图书馆建设,2019(2):148-157.
- [7] 周永根,刘骁.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城市社区图书馆居民参与意愿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长沙市为例[J].图书馆学研究,2021(5):82-89.
- [8] 朱蓓蓓.英国图书馆志愿者研究述略[J].山东图书馆学刊,2021(1):92-97.
- [9] 肖鹏,唐琼,陈深贵,等.广州区域总分馆制实施路径探索:以基层管理者为中心的研究[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6,42(3):103-115.
- [10] WILSON J. Compulsory competitive tendering and local government financial services: An analysis of the views of local government accountants in the north west of England[J]. Public Administration, 1999, 77(3): 541-563.
- [11] Best Value authorities[EB/OL].[2022-04-29].<https://www.legislation.gov.uk/ukpga/1999/27/part/I/crossheading/best-value-authorities>.
- [12] Building the big society[EB/OL].[2022-04-29].<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building-the-big-society>.
- [13] The Local Government Act 2011[EB/OL].[2022-04-29].<https://www.legislation.gov.uk/ukpga/2011/20/contents/enacted>.
- [14] Britain has closed almost 800 libraries since 2010, figures show[EB/OL].[2022-04-29].<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9/dec/06/britain-has-closed-almost-800-libraries-since-2010-figures-show>.
- [15] Considering community libraries[EB/OL].[2022-04-29].<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guidance-on-libraries-as-a-statutory-service/libraries-as-a-statutory-service>.
- [16] Nearly 130 public libraries closed across Britain in the last year[EB/OL].[2022-04-29].<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8/dec/07/nearly-130-public-libraries-closed-across-britain-in-the-last-year>.
- [17] 关思思.从承接者角度浅析英国公共图书馆社会化管理运营实践[J].图书馆学研究,2019(5):87-93.
- [18] Community library: Wendover, Buckinghamshire[EB/OL].[2022-04-29].<https://www.gov.uk/government/case-studies/community-library-wendover-buckinghamshire>.
- [19] Chalfont St Giles: checklist for setting up a community library[EB/OL].[2022-04-29].<https://www.gov.uk/government/case-studies/chalfont-st-giles-checklist-for-setting-up-a-community-library>.
- [20] Community library: Wendover, Buckinghamshire[EB/OL].[2022-04-29].<https://www.gov.uk/government/case-studies/community-library-wendover-buckinghamshire>.
- [21] 周小燕.基于平衡计分卡的公共图书馆志愿者队伍管理策略[J].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21(2):24-27,84.
- [22] 汤玉枢.英国义工组织慈善化及其制度供给[J].兰州学刊,2016(11):149-157.
- [23] Volunteer opportunities, rights and expenses[EB/OL].[2022-04-29].<https://www.gov.uk/volunteering>.
- [24] Community Managed Libraries: Good Practice Toolkit [EB/OL].[2022-04-29].<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community-libraries-good-practice-toolkit/community-libraries-good-practice-toolkit>.
- [25] 沈艺红.谈公共图书馆志愿服务:以广州图书馆为例[J].四川图书馆学报,2011(2):20-23.
- [26] 陈一梅.英国拯救图书馆运动概况及启示[J].图书与情报,2012(1):14-16,21.
- [27] 熊海峰,范周,柳鹏飞.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社会化运营的“E-GSC-S”策略研究[J].学习与探索,2019(11):145-153,195.

作者简介: 朱敏,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图书情报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图书馆管理; 傅文奇,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图书馆学系教授、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信息资源管理、数字信息服务、知识产权管理、图书馆管理。

收稿日期: 2022-06-13

本文责编: 孙晓清

· 异域采风 ·

国际图联报告《图画书中的世界》解读与启示

舒 睿

(上海图书馆 上海 200031)

摘 要:“图画书中的世界”作为国际图联儿童阅读推广的著名项目,自2011年推出以来经历了十多年的发展,已出版的专业报告《图画书中的世界》汇集各国图书馆员推荐的图画书,为图书馆儿童阅读推广提供了参考。解读该报告发现:欧洲是图画书创作的发源地;美国图画书在质量上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欧美图画书在涌现经典作品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特点。文章围绕图画书,从馆藏建设、阅读指导、阅读活动三方面,探索我国公共图书馆儿童阅读推广的实践模式。

关键词:国际图联;图画书;《图画书中的世界》;公共图书馆;儿童阅读推广

中图分类号:G259.13;G252.17

文献标识码:A

Interpreta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IFLA's Professional Report *The World Through Picture Books*

Abstract As a well-known children's reading promotion program launched in 2011, the IFLA published the third edition of a professional report *The World Through Picture Books* in 2021, collecting picture books recommended by librarian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he report is well-positioned to guide children reading activities in libraries. Through this report, we learn that Europe is the breeding ground of picture books, and American picture books are among the world leaders in terms of content. Moreover, we can see the continuous emergence of classic European and American picture books in huge numbers and with distinctive features. On that basi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practical model of children's reading promotion in China's public libraries from three aspects: collection construction, reading guidance, and reading activities.

Key words IFLA; picture book; *The World Through Picture Books*; public library; children's reading promotion

1 引言

2021年8月19日,国际图联儿童和青少年图书馆委员会(IFLA Libraries for Children and Young Adults Section)发布了“图画书中的世界”第三版书目的征集公告,计划由图书馆员推荐来自世界各地的图画书,创建一个世界各地的图画书单^[1]。“图画书中的世界”是国际图联儿童和青少年图书馆委员会联合国际图联素养和阅读委员会(IFLA Literacy and Reading Section)、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nternational Board on Books for Young People, IBBY)于2011年推出的品牌阅读项目,鼓励各国图书馆员挑选出本国最受欢迎的10

本图画书并提交书单,得到了各国图书馆员以及名单上的作者和出版商的积极回应。2012年8月,主办方发布了“图画书中的世界”第一版图画书列表,共收录了来自30个国家/地区的人选图画书。2015年3月,“图画书中的世界”第二版目录发布^[2],增加了16个新的注释列表。“图画书中的世界”第二版目录作为国际图联专业报告《图画书中的世界》(以下简称《报告》)出版和销售,目前可以免费下载和打印。本文通过对第二版目录的解读,探究欧美图画书的主要特点,以期为我国公共图书馆儿童阅读推广服务提供参考。

2 《报告》的内容分析

《报告》介绍了“图画书中的世界”项目致力于图画书阅读推广的基本情况,并收录了37种出版语言的500本图画书简介(均有英文翻译)。通过对选书标准、参与情况和影响力内容梳理,分析图画书书单的主要特点,为儿童提供高质量的图画书。

2.1 选书标准

“图画书中的世界”项目鼓励各国图书馆员推荐本国最优秀的图画书,形成一份最具权威性和代表性的世界优秀图画书单,同时,将书单通过图书出版及各国巡展的方式进行宣传和推广,增强各国/地区文化交流,帮助世界各地的儿童在成长早期接触到世界优秀的图画书。

为保证图书的质量,国际图联特别规定了选书的标准:适合0—11岁儿童;经久不衰,已经成为或者可能成为“经典”的书籍,代表该国的优质作品;必须由该国出版;以原文发布;具有高质量和高标准的作品,非常适合于朗读和与儿童共同阅读;文字与图画互相补充;反映正面的信息;非断版书(仍然可以购买)。每个国家/地区提交最多10本儿童图画书的书名(原文和英文译文),需附上作者、绘者、出版日期、国际标准书号、图书简要的评论(英语和该国语文)。在线调查、国家提名、全国范围内的票选等多种方法都被使用,以客观、公正地挑选出公众心中最能代表本国文化和水平的优秀图画书。馆员小组讨论决定最终的书单,书单中会概述本国图画书的发展概况,以及10本图画书书目产生的经过及选择标准。

2.2 多国参与

“图画书中的世界”项目一经推出就得到了众多国家的积极响应,并从最初的30个(2012年)国家/地区发展到52个(2015年)。伴随项目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参与国家的数量也不断增加。由于其特定的文化特征和出版背景,书目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以最适合国家的方式组织的。对国家/地区列表的介绍解释了如何进行选择,有时还提供有关该国儿童图书出版的信息。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可以和每份书单开头提供的该国协调员的电子邮件地址取得联系。有多个国家关于图画书的论文在赫尔辛基、新加坡和里昂举行的国际图联会议上宣读,并且制作了两套巡回书展,展品在芬兰(约恩苏和赫尔辛基)和法国(里昂)等地展出。这两套书展内容收藏在法国和日本的国家图书馆,任何国家都可以通过预订内容在本国举办书展。

2.3 影响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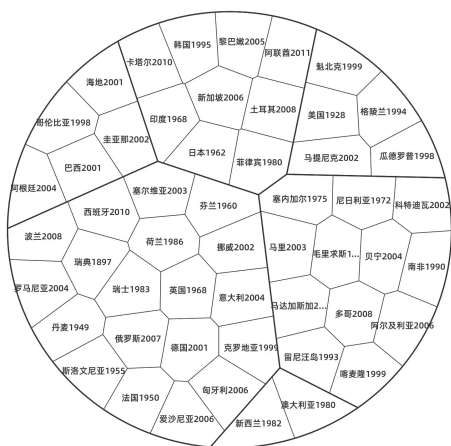
“图画书中的世界”项目让每个国家的图书馆员可以一起工作,反思自己的图书创作并与世界分享;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图画书出版的无限丰富性发现其他文化。“图画书中的世界”代表了书目多样性和语言多样性。一些国家推荐的优质书籍非常著名,但大多数国家推荐的书籍却并不出名,希望通过这些来自各大洲的最喜爱的图画书书目能让全世界儿童接触到更多令人快乐的新读物。图书馆或学校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从该计划中受益,如通过国家协调员,与推荐书目的图书馆员建立并保持联系,或发现可能对识字小组或年轻人更感兴趣的书籍。如果您或您的同事具有良好IT技能,您可以为目录开发一个应用程序,链接至该书目可借阅的地址或购买链接。您可以使用此目录把它作为书目推荐的工具,还可以通过其中的书目信息来选购书籍,或者联系到该项目的主办方获取巡回书展的相关信息。来自世界各地的馆员分享了他们使用书目、书籍和展览的方式,以及他们对使用它们的新方法和想法。

2.4 书单特点

从地域分布上看,52个参与图画书提交的国家/地区主要集中在欧洲(19个)和非洲(12个),其次是亚洲(9个)和南、北美洲(各5个),大洋洲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参与。各参与国家/地区以英文首字母依序出现,选择一个国家/地区名称,即可浏览该国家/地区列表中的所有图画书简介。

从出版时间上看,瑞典的一本名为《小老妇人的故事》的图画书于1897年出版,是所有推荐图画书中最早出版的。从书籍总量来看,推荐的图画书以21世纪出版的居多,少量为20世纪出版,一本是19世纪出版的,距今最近的出版年份是2014年。图1为各国家/地区推荐图画书的出版起始年份,瑞典、丹麦、芬兰和英国、美国、日本、法国等国的图画书创作历史悠久,出版时间的跨度较其他国家/地区更大。

从书目特色上看,推荐的图画书主要适合3—8岁的小读者,许多经典图画书畅销逾三十年,如《自行车蚊子埃贡》《亲爱的动物园》《100万只猫》等。而《小象柚子长大了》《每个桃子梨子李子》和《野兽国》等作品因分获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奖(Hans Christian Andersen Awards for Illustration)、凯迪克大奖(The Caldecott Medal)、纽伯瑞奖(Newbery Medal)、凯



特·格林纳威奖 (Kate Greenaway Medal) 等大奖而成为知名度极高的推荐书目。

由此可见,欧洲参与“图画书中的世界”项目的国家最多,对图画书的阅读推广较为关注;出版于1897年的图画书《小老妇人的故事》来自欧洲的瑞典,欧洲作为图画书创作的发源地,较其他洲的发展历史更为悠久;英、美、日、法等国推荐的图画书多为获奖作品,而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是美国凯迪克大奖,它被誉为图画书领域的“奥斯卡奖”,美国图画书质量因而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此外,欧美图画书以经典作品为主,这些推荐图画书给儿童提供了优质的视觉体验,激发了儿童阅读的兴趣,开拓其想象空间,并且提升了其审美能力。

3 《报告》对我国公共图书馆儿童阅读推广的启示

研究发现,低幼儿童时期是培养儿童语言及认知技能的关键阶段;同时,儿童参与共享阅读的频率和积极性,父母在儿童认知和学习中的参与质量,以及提供适龄的服务(如书籍)等因素和儿童早期阅读息息相关。可以说,阅读是儿童认识世界、提高认知的重要方式^[3]。新西兰儿童文学研究学者多罗西·怀特说:“绘本是孩子们在人生道路上最初见到的书,是人在漫长的读书生涯中所读到的书中最重要的一本书。一个孩子从绘本中体会到多少快乐,将决定他一生是否喜欢读书。”^[4]全民阅读背景下,我国儿童阅读推广力度不断提升,公共图书馆因丰富的资源、专业的人才、

可开展形式多样的阅读活动等优势,成为儿童阅读推广的重要阵地。《报告》建立了阅读者对来自各国家/地区的书籍的了解,同时推荐了基于不同图画书而开发的各类互动阅读,包括为图画书创建背景音乐、制作小海报,根据图画书收藏设计寻宝游戏等,为公共图书馆儿童阅读推广提供了新的思路。

3.1 绘本馆藏建设

儿童阅读读物的收藏是图书馆提供服务的基础。一般来说,“图画书”与“绘本”是同一概念。绘本作为一种以图画为主的读物,对儿童的早期阅读和智力开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报告》建议“使用目录中的信息来建立您的国际收藏,选择要购买的绘本,无论是与您的语言相同还是与您的读者相关的其他语言”;“与您所在地区的其他图书馆员定期开会,讨论绘本、讨论可能的绘本购买和绘本交换”;“将推荐绘本书目介绍给您所在地区的外语教师和语言社区”等。对于儿童这一群体来说,公共图书馆进行阅读推广的过程中要从其兴趣入手并结合儿童的年龄特征^[5]。提供绘本作为阅读素材可以满足儿童的心理需求,让儿童在图文并茂的情境下阅读,使其在阅读中收获快乐。

公共图书馆绘本馆藏建设能有效保障儿童的阅读需求,在我国政府的财政保障制度下,应较为全面、更为科学地采购和收藏各类适合儿童阅读的优秀绘本,并凭借这些丰富的绘本资源为儿童提供绘本阅读服务,让儿童在阅读中体验阅读的乐趣。公共图书馆绘本资源建设应以科学合理为准则,同时须把好绘本资源建设质量关^[4]。馆员可以依据《报告》中的获奖绘本来进行挑选,比较知名的如美国凯迪克大奖和纽伯瑞奖、英国凯特·格林纳威奖等。在注重国外获奖绘本采购时,增加经典绘本的副本量。此外,图书馆还可以设计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的绘本书单,将其作为亲子阅读的重要资料。如慕尼黑公共图书馆便推出了涵盖自我成长绘本、情绪与品格绘本、想象力绘本、美学教育绘本等主题的绘本书单,以短小精悍的荐读语言向家长介绍绘本的背景知识^[6]。

3.2 绘本阅读指导

图书馆员是儿童阅读推广服务中的核心因素。对于尚不具备独立阅读能力的儿童,能够与图书、阅读联系在一起,正是依靠儿童图书馆员的专业知识、综合能力及良好的个性特质来实现的。《报告》指出

要以兴趣为导向开展儿童阅读推广,加强对亲子阅读的指导,加强绘本教育和绘本阅读推广成功经验的分享。公共图书馆要确定绘本阅读服务的目标,明确阅读推广的方向。儿童图书馆员必须热情,有创造性,着眼于细节,能够与各种类型的儿童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熟悉供成人使用的与儿童有关的各种资源;需要准确地理解问题并拥有解决问题的各种资源和方法。

公共图书馆从事儿童阅读推广工作的馆员应具备儿童教育、读写认知专业背景,善于沟通和交流,能为儿童阅读服务提供专业建议。在提供美国ALA(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美国图书馆协会)认证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高校中,约90%的学校开设了儿童图书馆学专业方向。呼吁我国高校图书馆学教育也开设儿童教育和文学的相关课程,系统培养儿童图书馆员^[7]。儿童阅读推广的目标是培养儿童掌握好的阅读方法,馆员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引导儿童阅读绘本,例如查看一系列封面,看看孩子们是否能找出每个封面来自哪个国家;在推荐书目中选择一些国家并研究该国家使用的语言;使用其他国家书籍中的图片,让孩子们说出或写下他们认为的故事的内容,然后将他们的故事与目录中的实际书评进行比较;让孩子们选择他们最喜欢的颜色,然后找到封面上有他们最喜欢颜色的书,讨论颜色和封面的异同,然后一起看书。可以通过以上方式鼓励儿童去阅读绘本作品,有效提升儿童的阅读能力。借由阅读各种主题的绘本,培养儿童对阅读的兴趣,并通过馆员的阅读指导使儿童们养成正确的阅读方法。

3.3 绘本阅读活动

图书馆开展的绘本阅读活动能激发儿童的阅读兴趣,推动儿童养成爱读书的好习惯^[8]。《报告》提到了与孩子一起使用推荐书目,向他们展示标题和简要说明,鼓励和启发他们编写和绘制自己的图画书;使用经典绘本故事,让孩子们写出故事的另类结局;与当地的舞蹈团体合作,拍摄一个故事并根据内容创建

一个舞蹈节目;组织学生通过课堂参观的形式来观看展览、组织作家和插画家来参观展览并与孩子们谈论创作图画书的过程,等等。

公共图书馆在开展儿童阅读推广活动的时候,应该对不同阶段儿童的阅读能力以及阅读兴趣取向有较为深入的了解,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儿童群体来设置丰富多彩的阅读推广活动,也要保证阅读活动内容的创新性以及趣味性,这样才能更好地吸引儿童参与其中^[9]。具体到绘本阅读推广实践中,一方面,公共图书馆开展绘本阅读推广服务需精细化,提升活动针对性,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开展分级推广活动。另一方面,公共图书馆要摒弃传统单一的阅读推广模式,创新绘本阅读活动形式,实现数字化、全方位、立体式的绘本阅读推广服务^[10],设计多元化互动活动,让绘本“活”起来,如:组织猜绘本、编绘本、演绘本、制作绘本等活动,充分调动儿童的听觉、视觉及触觉;构建绘本数据库,搭配儿童喜爱的动态画面及音乐,吸引儿童关注,激发他们的阅读热情。此外,公共图书馆可长期与社会团体和力量合作,以美国为例,无论是总统还是作家,无论是出版社还是书店,无论是行业协会还是非政府组织,都会参与到儿童阅读推广工作中。

4 结语

绘本阅读是儿童早期阅读的重要内容,目前,公共图书馆绘本阅读推广仍有较大的进步空间。构建儿童阅读推广新格局成为新时代公共图书馆面临的重要课题。公共图书馆推广儿童绘本阅读目的在于,培养儿童的阅读习惯,激发儿童的阅读兴趣,满足他们的阅读需求。公共图书馆作为专业的公共文化场所,应充分发挥其社会职能和教育职能,成为儿童阅读服务中的资源提供者、内容指导者、活动策划者,同时建立完善的绘本阅读推广体系和高效的评价体系,推动绘本阅读推广活动的持续开展。

参考文献:

- [1] Uploading titles for the World Through Picture Books 3rd edition catalogue has started[EB/OL].[2022-04-02].<https://www.ifla.org/news/uploading-titles-for-the-world-through-picture-books-3rd-edition-catalogue-has-started/>.

(下转第92页)

文化传承背景下红色文化资源 VR 阅读推广研究

范新美

(南通市海门区图书馆 江苏南通 226100)

摘要: 红色文化资源是图书馆馆藏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精神文化传承的核心要素。文章分析了当前红色文化阅读推广中阅读率低下、阅读角色被动与对红色文化内涵认同不充分等问题,指出红色文化传统阅读的缺陷,提出红色文化VR阅读的构想,并从组建红色文化VR阅览室,搭建红色文化VR阅读系统,构建红色文化VR阅读资源库等多方面探讨了红色文化VR阅读的实施路径,旨在为图书馆更好地宣传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助力。

关键字: 红色文化; VR技术; 图书馆; 阅读推广

中图分类号: G252.1; TP391.98

文献标识码: A

Research on VR Reading Promotion of Red Culture Resources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Abstract Red culture resource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library collection resources and a core element of national spiritual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low reading rates, passive reading and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otation of red culture in such promotional activities. The paper also points out the defects of the traditional reading of red culture. As such, the article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red culture VR reading. It also discusses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red culture VR reading from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setting up a red culture virtual reading room, building a red culture VR reading system, and constructing a red culture VR reading resource library. The article aims to better publicize the red culture and inherit the red gene for the library.

Key words red culture; VR; library; reading promotion

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1],对红色文化的传承提出了明确要求。全民阅读背景下,把握发展机遇,对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创新,促进红色文化阅读推广,传承红色基因,是图书馆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近年来,促进数字化赋能红色文化利用频繁见诸政策,并逐年细化,思路愈加清晰。政策文件多次指出要充分运用多种科技手段,增强红色革命文物事迹等的互动性、体验性。随着VR技术的日趋成熟,目前数字出版产业呈蓬勃发展趋势,推动红色文化深度阅读

须借力新技术,开展红色文化VR阅读正是这样一种新的科技手段,在红色文化的阅读推广上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对促进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大作用。

2 红色文化资源阅读的困境

2.1 读者对红色文化资源的阅读率普遍低下

首先,当前公共图书馆开展红色文化推广活动频率不高,主要依托于政策定位和重大节点纪念日为触发点,如普遍会在每年的“烈士纪念日”、“九一八事变”纪念日和“国家公祭日”等重大时间节点举行阅读教育活动^[2],但图书馆在面对如此宏大叙事的场面时,由于自身对红色文化资源挖掘与文化内容创新能

力的供给不足,往往选择“转发说教”式教育,直接转发其他官微或官媒的消息报道,易给读者造成“雷声大雨点小”“标题党无新意”等刻板印象。其次,大部分图书馆仍停留在通过红色文化图片展、红色文化讲座、红色征文比赛等传统形式开展阅读推广活动,其活动形式较陈旧,致使红色文化资源的推广传播受众面受到限制,红色资源阅读率低下,难以发挥其在文化教育、历史精神传承等方面的作用。

2.2 读者参与红色文化阅读角色被动

红色文化阅读推广在注重形式及内容的时候还应考虑读者接受度和参与度。目前,图书馆通常是联合学校、景点、公园等文化场所开展红色文化阅读推广活动,采用邀请历史文化学者宣讲内容、举行展览等手段,由教育局、文化局等文化管理机构统一组织学习,其形式多数是由上而下的被动式推动,没有发挥读者的主动阅读意愿,其学习教育效果欠佳。湖南湘潭地区曾通过问卷的形式对八所学校开展调查,在“您对贵校举办的有关红色文化活动的参与程度如何”调查中显示,选择被动参与的人数最多,高达73%,仅有接近15%的人表示会主动参与;而在“您是否愿意花一定的时间学习红色文化?”的调查中,选择愿意积极主动学习的人数尽管超过半数,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处在被动接受状态。由此可见,仍有相当一部分学生读者对红色文化阅读活动兴趣度不高,参与角色仍显被动。

2.3 读者对红色文化的深刻内涵认同不充分

红色文化内涵的理解和认同是红色文化传承的核心,纵观当下图书馆对红色文化推广的形式,其同质化严重,缺乏新颖度,推广过程中文化内涵精神挖掘深度不够,没有形成系统的局面,利用传播的手段极为局限,导致读者对红色文化的深刻内涵认同不充分,体现在以下几点。

(1)对红色文化情感认同不充分。表现为对红色文化及精神价值的认同接纳、强烈的向往和表现出实践行为的心理过程,这种情感是将红色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力量,是读者“心行合一”的直接体现。然而,一些读者面对红色文化宏观的革命内涵和精神价值时,因为缺乏亲历革命斗争岁月的实际感受,难以将革命时期“艰苦”和“匮乏”的环境和当下“幸福”和“丰富”生活相对接,表现为对红色文化精神取向的认可度与接受度低,对革命先烈的光辉形

象、革命事迹的精神凝练缺乏宏观把握,在认知上出现隔阂感与距离感。

(2)对红色文化理性认同不充分。理性认同是读者掌握红色文化内涵的核心要素,是读者从感性表象到理性认知的一种表现。当前,多数读者对红色文化的理性了解仍停留在概念与表象阶段,往往表现为能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概念时常挂齿,但让其阐述这些精神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内涵、革命价值情怀时,能表述清楚的却寥寥无几,这充分说明读者对红色文化深刻内涵和底蕴的忽视。

(3)对红色文化的价值认同不充分。价值认同是培养读者形成正确的人生三观的基础,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优劣直接决定了意识形态的品质。读者坚定社会主义信仰及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品质与红色文化体现的价值观取向是一致的,也是读者树立优良作风和正确价值理念的体现。但是,社会中一些读者易受到各种不正思潮和不良观念的影响和冲击,导致自我信仰不坚定,价值观改变、理想信念模糊、个人主义膨胀、社会责任感抛弃,逐渐丢失价值标准与价值取向,这对其自身精神的健康发展造成障碍。

3 红色文化资源 VR 阅读优势

虚拟现实技术(Virtual Reality,简称VR),即虚拟和现实相结合,是一种可以创建和体验虚拟世界的计算机仿真系统,它利用计算机生成一种模拟环境,使用户沉浸在该环境中。用户置身虚拟环境中获取全新的认知和互动,激发认知上的新意和感知上的重构,其“生动性”“沉浸性”“交互性”“构想性”可以帮助读者通过真实感受来增强记忆,与被动性灌输相比,VR技术的利用更容易让读者主动接受,更易激发读者的学习热情。麻省理工大学教授B.约瑟夫·派恩经过调查得出结论:阅读资讯,我们可以从中学到10%的知识;听取资讯,我们能从中获得15%的知识;但是,我们亲身体验过的事,却能从中学习到80%^[3],可见,读者从VR阅读体验中得到的知识要比灌输得到的知识深刻和有效得多。2017年文化部发布了《“十三五”时期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规划》^[4],要求打造公共数字文化产业,鼓励与支持公共文化机构利用虚拟现实等增强技术,创新服务方式,提升服务效能。2018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

虚拟现实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5], 提出推进“VR+文化”产业布局的发展, 用数字技术充分发掘文化资源, 创新提升人民精神文化的数字产品, 把文化资源所蕴含的精神文化价值与VR新技术融合, 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与推广, 满足人民群众文化消费升级需求^[6]。因此, 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推动红色文化资源传播转型, 可提升读者对红色文化的阅读成效, 加深其对红色文化精神内涵的理解, 加快促进红色文化的传播与传承。

3.1 虚拟现实的“生动性”改变阅读被动

VR在阅读中的应用愈发受到各类读者, 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的青睐。通过VR的“生动性”引导, 读者能够直接参与到场景中, 与历史人物进行直接“对话”, 共同参与事件的发生、进展, 从而在虚拟情境中不知不觉地融入其中, 成为场景中的一员。这能够使书本上抽象的文本立体化、生动化、可视化, 从而加深读者对故事内容的记忆, 激发读者参与阅读的兴趣, 形成浓厚的阅读气氛, 一改读者对红色文化的被动学习局面, 大大提升红色文化资源的服务能效。

3.2 虚拟现实的“沉浸性”提高阅读成效

与传统的阅读方式相比, VR阅读的“沉浸性”可以充分吸引读者注意力, 把人们认知的阅读形式用一种“全感知”的高代入感的方式呈现给读者, 使得读者可以心无旁骛地投入到阅读中去, 不易受到外界因素干扰, 达到理想的“沉浸”状态。红色文化资源VR阅读可以极大地丰富受众的阅读感知体验, 用户在VR阅读的过程中获得的“沉浸性”是提升用户阅读成效的关键因素。用户的阅读沉浸感表现在VR阅读为用户带来多感官刺激^[7], 精细真实的场景更加贴近现实画面, 让读者“穿越”到特定场景中, 成为虚拟历史场景中的参与者, 在沉浸与虚拟环境中加深对人物、事件的感受, 打破自身认知的瓶颈, 从而获得更好的阅读成效。

3.3 虚拟现实的“交互性”加深知识认知

VR阅读不仅可以摆脱传统阅读信息单向输出模式, 还具备很强的“交互性”。这一特性能带给读者与人物、场景、事件的互动, 同时也能触发读者间的互动。首先, 促进读者的参与感, 让其回归到历史情景中, 参与相关活动, 依赖大脑、四肢、五官、躯干等感知系统与周围环境自主交互, 及时获取交互反馈信息, 加强理性思维能力, 使读者更深刻了解故事情

景, 加深对知识的理解与掌握。其次, “阅读+社交”的深度融合模式是新媒介传播中的新型特征, 读者间知识交融媒介作用日趋显现。在VR阅读中, 互动系统能智能收集具有相同阅读兴趣的群体或是参与阅读同一个场景的多个读者, 组成一个基于同一兴趣爱好的虚拟社交社区。在这个虚拟社交社区中, 读者们可以讨论阅读话题、分享阅读体会、解答阅读疑问等, 知识上形成各方交流, 思想上形成交互碰撞, 在多方位互动的影响下加深读者对知识的认知。

3.4 虚拟现实的“构想性”拓展阅读宽度

强调具有广阔的可想象空间是VR“构想性”的特征。复杂数据通过VR人机交互界面与读者形成连接, 使读者产生全新的感知体验, 从基于定性和量化的多维化环境中提升对感性与理性的认知, 进而能深化概念, 萌发“新意”和“想象”, 拓展思维空间与遐想, 触发新的构思动作。这种动作被录入到VR构思系统中, 构思系统作为“思想库”“智囊团”, 通过匹配信息、对接问题后把相关知识反馈给读者, 这样一来, 形成了学习和创造的过程, 新鲜的信息与知识的输入, 无形间拓展了读者的阅读宽度。读者对新鲜信息进行选择性的消化吸收, 直接扩充了知识面。

4 红色文化 VR 阅读实施路径

4.1 组建红色文化 VR 阅览室

随着虚拟现实技术在近几年发展迅速, 我国在VR阅览室的设计方面逐渐成熟。红色文化VR阅览室的组建可以根据红色文化的阅读环境和元素, 基于LED、LCD构建360度“全景虚拟展厅”, 使读者置身于巨幕中实现裸眼阅读VR效果, 在虚拟三维立体空间中任意穿行、浏览、互动, 实现高效的信息获取。通过3D渲染软件如Arnold、VRay、Redshift等构建仿真人物、事物、场景为一体的虚拟情景, 读者穿戴设备就可进入自己想要了解的场景中漫步, 身临其境地感受历史故事在身边发生。读者也可以通过动作与情景互动, 交换信息, 产生共鸣, 开始一段深刻、独特、超感官的红色文化旅程。

4.2 搭建红色文化 VR 阅读系统

VR阅读系统是整个阅读环境的核心中枢, 连接着各种交互模块。搭建红色文化VR阅读系统是一项系统工程, 从顶层构建出发, 需考虑VR系统的跨平台

性,目前连接主流的终端设备是PC端与移动端^[8],终端设备通过5G或WIFI与系统设备建立连接,以目前常用的Windows系统、安卓系统、苹果系统应用平台等为主体。通过系统构架的搭建,接入读者注册/登录模块,读者完成系统登录验证后才能进入VR阅读系统。阅读系统由几大模块组成:应用软件系统模块、数据库模块、输入系统模块、输出系统模块,其中,数据库模块由“红色基地库”“红色记忆库”“红色人物库”三个库组成,并预留接口可随时扩展(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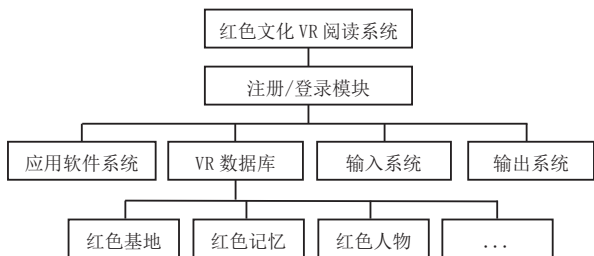


图1 红色文化VR阅读系统构建图

4.3 构建红色文化VR阅读资源库

红色文化VR阅读资源库的构建本着文化遗产的理念,向着还原历史情景、塑造革命精神的方向进行,通过720°高清实景拍摄、计算机图形建模、多媒体渲染、3D打印、激光绘图等技术,配合文字、声音、图片、背景音乐的方式,全景再现历史情景全貌。与此同时,系统中嵌入语音导览讲解、身份模拟、信息交互等多种体验形式。根据红色文化的特征,大致可以分为“红色基地”VR资源库、“红色记忆”VR资源库、“红色人物”VR资源库。

4.3.1 红色基地VR资源库

红色基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和战争时期建树丰功伟绩所形成的纪念地,也是共产主义学习的基地^[9]。它在党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等发挥着桥梁的作用。资源库整合全国各省(自治区)的有深刻教育意义的红色基地资源,如:江西井冈山、瑞金,贵州的遵义等。依据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空间信息系统将其采集,通过VR技术输入基地方位、特征、全貌等属性。浙江大学CAD&CG国家重点实验室推出了一套桌面型虚拟建筑环境实时漫游系统,还研制出了快速漫游算法和递进网格生成算法,让读者可以漫游其中“旅游式”地参与各种基地信息浏览,借助这样的技术建立红色基地VR一站式浏览,激发读者的阅读欲,

成为全新的红色文化网上“打卡地”。2021年,大连市委宣传部、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主办的庆祝建党百年“追寻红色印记——VR体验馆”,通过精心遴选全市最具代表性的十个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和代表性红色遗址遗迹展馆,通过沉浸式全景3D拍摄以及航拍的方式,将展馆基地进行三维数字化建模与渲染,以文字说明结合VR沉浸方式实现展馆与观众零距离互动交流,把展馆全景式地呈现在参观者眼前,为VR红色基地的开发提供了有益借鉴。

4.3.2 红色记忆VR资源库

红色记忆是关于革命的记忆,回忆革命历程、革命先烈、革命事迹、革命精神等,对红色基因的激发与红色精神的唤醒有着推动作用。梳理抗战史实、著名战役、长征日志等是红色记忆资源的主要内容。在5G加持下,5G+4K/8K+AI、CUVA HDR等超高清视频媒体互动技术在VR阅读中深入开展,通过影片的提炼修造、虚拟影像的建模、环绕音效等场景设置,运用虚拟现实编辑器(VRP-Builder)打造出真实的战争场景,读者融入720° CAVE(Cave Automatic Virtual Environment)全景中体验互动,身临其境地参与其中,触发生动丰富的多种感官与交互,弥补了书本内容的“空洞”和“枯燥”,一改文字对微观情感表达的苍白无力。2021年厦门市博物馆推出“厦门红色记忆100周年特展”,对VR阅读进行探索。展览采用虚拟现实技术,以全景、视频、文物3D扫描、图片、文字等全要素进行呈现,把厦门红色资源“活化”,让观众了解革命人救亡图存的故事。体验中读者可根据场景地面箭头指引逛展,还可以直接点击“场景选择”随意切换展区。

4.3.3 红色人物VR资源库

红色人物VR资源库的建设本着重塑英雄人物形象、真实展现英雄历史事迹的主目标。通过借助3D打印技术、虚拟建模与AI人像还原技术将红色人物真实还原,按照红色人物事迹的发生时间建立人物库,逐一推进,通过对人物资料包括人物的身世、籍贯、英雄事迹、历史成果等全方位的素材的融合,形成影片级的虚拟场景。借助VR虚拟场景的重演技术,让读者回到过去,“亲身”经历其中,在虚拟世界中感受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的艰辛,见证先辈们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经历曾经的筚路蓝缕。2021年,中国共产

党百年华诞之际,安徽省肥西县委宣传部策划了《永远跟党走——肥西红色人物VR云展馆》主题展览活动,通过VR虚拟现实、大数据、三维建模技术将肥西县党史、红色人物事迹真实还原于线上,采用音频、视频、珍贵历史图片、语言解说、VR体验的形式,展现肥西县的先进人物,让民众回眸前贤历史建树,感受榜样的力量。

4.4 优化 VR 阅读设备

VR技术发展势头迅猛,但是在很多方面还有优化改进空间。首先,硬件方面,目前的VR穿戴设备普遍体积偏大、重量偏重,时常压迫颈椎,让人感觉不适,导致VR设备在动作和画面呈现之间会有一定的时间差,画面显示延迟,影响读者的体验感。其次,系统方面,姿态角度定位的精度和速度、显示模块的刷新频率、图像实时渲染效率、聚焦与视差冲突等系统问题仍是技术工作者优化的方向。从读者体验的角度考虑,就需要技术工作者开发轻便型的头盔、眼镜等硬件,打造出符合现代人体工程学的设备形态,从而提升读者的佩戴与体验的满意度。未来,从硬件

设备的显示来看,VR头显的分辨率越来越高,同时自身重量也更加轻巧。解决最大的“眩晕”短板体验,要求技术工作者不断提升刷新率技术。此外,VR交互系统中的动作捕捉、触觉反馈、眼球追踪、肌电模拟、手势跟踪、方向追踪等需不断优化,以满足读者多样化的体验要求。

4.5 加强 VR 建设人才培养

红色文化VR阅读,依赖图书馆跨终端的VR阅读系统架构,需要针对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数据采集、整理分析、建模绘制、渲染呈现、传感交互等技术支持^[8]。VR系统与设备的研发组建需要专业技术人员的加入,由于图书馆缺乏VR、AI技术领域的人才,可寻求社会力量协作,如数字出版及VR、AI领域等机构,共同推进红色文化VR阅读的开展。同时,图书馆应树立技术馆员的培养意识,选择有相关专业背景的馆员参与到社会VR行业的培训中去,学习VR相关知识,积累技术经验,为VR资源开发与维护储备专业人才,从技术、资源等方面为红色文化VR阅读推广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 [1] 苏东亮.关于发挥档案资源优势弘扬传承红色基因的调研报告[J].山东档案,2019(5):8-13.
- [2] 当代大学生对红色文化认同现状调研:以湘潭地区为例[EB/OL].[2018-06-08].http://www.zunyhongse.com/article/detail_10978.html.
- [3] 王学军,冯礼.员工的培训开发对企业经营绩效贡献度的评估研究[C]//黄鲁成.技术未来分析探索:首届中国技术未来分析论坛论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246-254.
-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文化部关于印发《文化部“十三五”时期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规划》的通知[EB/OL].[2017-07-07].http://zwgk.mct.gov.cn/zfxxgkml/202012/t20201204_925713.html.
-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加快推进虚拟现实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EB/OL].[2018-12-25].https://www.miit.gov.cn/zwgk/zcwj/wjfb/dzxx/art/2020/art_45561910e63545a3baa736825fb1ab6d.html.
- [6] 张宁,NUNES M B,李俊扬.“VR+文化”背景下的中华古籍阅读与传统文化传播新路径研究[J].图书馆建设,2019(6):128-134.
- [7] 刘锦宏,宋明珍,张玲颖,等.VR沉浸式阅读效果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出版科学,2020,28(3):29-35.
- [8] 傅宝珍.知识服务背景下古籍VR阅读推广研究[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2(1):108-115.
- [9] 黎生良.基于红色资源的乡村旅游与思政教育融合研究[J].旅游与摄影,2021(15):99-100.

作者简介: 范新美,南通市海门区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阅读推广服务、阅读学、图书馆空间管理、图书馆服务与创新等。

收稿日期: 2022-05-24

本文责编: 孙晓清

· 阅读文化 ·

公共图书馆红色文化传承的实践与思考

——以“东海小小图书馆”红色阅读空间为例

岑 映 方 芳 柴 玥 孔 奕

(舟山市图书馆 浙江舟山 316000)

摘 要: 舟山市图书馆的红色文化传承实践以发扬和传承小小图书馆的东海革命精神为核心,在充分挖掘小小图书馆革命史料价值的前提下,建立红色文献专藏,打造“东海小小图书馆”红色阅读空间。开展红色文化的宣教活动,在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实践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赢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为公共图书馆开展红色文化传承与实践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关键词: 公共图书馆; 红色文化; 传承; 东海小小图书馆

中图分类号: G258.2

文献标识码: A

Practice and Thoughts on the Transmission of Red Culture in Public Libraries: Taking Donghai Little Library as an Example

Abstract The red culture inheritance practice of Zhoushan Library is centered on carrying forward and inheriting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of Donghai in the Little Library, establishing a special collection of red documents, and creating a red reading space. Red culture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activities are carried out on the premise of fully exploring the value of the revolutionary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Little Library. Positive exploration in the inheritance and practice of red culture is implemented, creating benefits for the community, and providing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public libraries to carry out red culture inheritance and practice.

Key words public library; red culture; inheritance; Donghai Little Library

1 引言

红色文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经过不断选择、重组、整合中外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特色文化,有物质和非物质两种表现形式^[1]。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考察革命故地中反复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公共图书馆是承担社会教育职能、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场所。开发和利用红色文化资源是图书馆传承革命精神、履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途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第三条也明确指出,公共图书馆应当继承革

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因此,传承红色文化,活化红色资源,做好红色教育,是图书馆的一项重要重要的历史使命。

舟山市图书馆在深入挖掘小小图书馆革命历史价值的基础上,在征集红色文献资源、打造红色阅读空间、宣传红色文化等方面开展实践和探索。

2 小小图书馆与定海早期革命活动

在中国革命史上,图书馆曾在开启民智,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革命理论方面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李大钊等共产党人重视发挥图书馆的作用,将图书馆作为从事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例如成立于

1921年的上海通信图书馆,在早期党组织的领导下,办馆指导思想十分明确,就是“为劳动大众服务”。其后成立的蚂蚁图书馆完全继承上海通信图书馆的办馆路线,秉承“使无产阶级有得书看”的宗旨,向大众传播进步思想。创建于抗战时期的定海小小图书馆,成立之初深受蚂蚁图书馆的启迪,并迅速地从一群爱国青年组成的读书、看报、学习的内部组织发展壮大为具有上百名读者、数千册藏书的公开图书馆。小小图书馆从萌芽到结束办馆,仅历经三年时间,但是在小小图书馆的影响下,一大批舟山青年接受马列主义的熏陶,纷纷走上革命救亡的道路,小小图书馆可以说是定海早期革命的摇篮^[2-3]。

2.1 小小图书馆的发展历程

小小图书馆是由舟山本地进步青年以及“八·一三”淞沪会战后返乡的知识青年为宣传抗日救亡运动而自发创办的。为团结青年、提高觉悟、传播阅读新文艺和进步书籍,1936年夏,青年们把各自家中藏书集中至定海北门陈维周家,只限内部流通,并不对外公开,这就是小小图书馆的雏形。

1937年10月,抗日形势全面爆发,青年们乘势将图书搬迁至定海县前街13号,公开经营图书阅览业务,正式取名小小图书馆,并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小小图书馆的办馆经费全部来自于热心读者捐赠。出借书籍部分由个人捐赠,部分采购于上海等地,其中一部分进步书籍,后经证实,是由当时党组织或所属团体支援捐赠。日常运作由青年们轮流义务管理,不计报酬。

小小图书馆全盛时期,基本读者增至200多人(有卡及借还关系),图书最多时达4 000余册,其中不乏《新青年》、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大众哲学等进步书籍。为助推抗日宣传的浪潮,小小图书馆接连在舟山各县(区),例如沈家门、白泉、岱山等地办起分馆,将抗日救亡的种子播撒到舟山的各个角落。

1938年1月,因读者人数的迅速增加,小小图书馆再次搬迁到邑庙前2号(现定海西大街73号)。同年10月,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特赠“纪念定海小小图书馆成立一周年”题词^[4]。

1939年6月23日,定海沦陷,小小图书馆结束办馆。然而在小小图书馆的感召下,一大批青年志士相继投身武装抗日斗争或转入地下活动。

小小图书馆的创办及抗日宣传活动的开展,将舟

山各界民众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使抗日烽火燃遍舟山群岛。

2.2 小小图书馆与抗日宣传活动

定海早期青年抗日运动是以小小图书馆为中心秘密展开,抗日宣传工作队成员基本以小小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为主。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抗日宣传活动由秘密转向公开。青年们走上街头巷尾,张贴抗日前线战报,宣传抗日时事,教唱抗日歌曲等,激发民众抗日情绪。

以小小图书馆名义举办的抗日活动有各种集会,张贴标语,办识字班,代办书报,印行馆刊等。各地分馆也踊跃投入到抗日宣传的浪潮中。例如沈家门分馆在闹市区设点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向鬼子》等抗战歌曲,讲实事新闻,发动居民募捐,制作抗日将士棉衣;白泉分馆由上海返乡的知识青年组织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戏剧,开办民众夜校宣传抗日;岱山分馆在青年的发动下,刷写抗日标语,发起捐献救国运动,演出抗日活报剧。小小图书馆及各地分馆广泛发动群众,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小小图书馆和抗日宣传队的活动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和支持,但也遭受到国民党当局反动势力的一系列迫害。国民党当局利用邮检特权,强行查抄书籍,甚至扣押工作人员。在小小图书馆工作的同志在饱受迫害的情况下一直坚持斗争。与此同时,小小图书馆和抗日宣传队工作自始至终都得到党组织的关怀与领导。中共定海县工委始终与小小图书馆保持直接联系。1939年小小图书馆被毁后,在党组织引领下,青年们将抗日工作从城市转向农村,由抗日宣传转向武装斗争。

在民族危亡时刻,小小图书馆和抗日宣传队在动员群众抗日、传播马列思想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探究小小图书馆的历史脉络对研究舟山早期革命运动及传承革命文化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小小图书馆丰富的史料价值及蕴含的革命精神是图书馆传承红色文化基因的基础。

3 公共图书馆红色文化传承的实践

公共图书馆作为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基地,对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深入挖掘本土特色的红色文化资源,不仅有利于地方文献史料的研

究,亦有助于革命历史宣传教育。舟山市图书馆的红色文化实践与舟山早期的革命运动史紧密相关,在实施过程中以传承和发扬小小图书馆的革命精神为宗旨,以打造“东海小小图书馆”展区为核心,从红色文献资源建设、红色文化空间打造、红色文化宣教三方面出发,在搜集和开发与小小图书馆相关的红色史料基础上,进一步利用红色资源,发扬红色传统文化,传承红色基因。

3.1 建立红色文献专藏

红色文献是红色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是推进文化育人的重要资源。红色文献与红色文化、革命文化密切相关。有学者指出,红色文献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反映共产主义者在追求革命真理以及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目标过程中而形成的思想、革命经验等成果的总称,提出红色文献的载体形式包括文字、图形、音频和视频记录等^[5]。具有地域特色的红色文献资源是珍贵的区域文化史料,不仅发挥教化育人的功能,同时也为研究当地革命史提供文献保障。

图书馆建立红色文献专藏需注重历史价值和本土特色的双重展现。舟山市图书馆的红色文献专藏主要来源于两部分:一部分来源于小小图书馆早期遗留的图书,这部分图书作为小小图书馆历史的鲜活见证,陈列于“东海小小图书馆”图书展柜内,供市民读者参观浏览。另一部分为舟山新四军专题资源库,主要来自于舟山新四军研究会成员及家属的捐赠,包括书籍、回忆录、书信等纸质文献,图片、画册等影像资料以及印章、怀表等实物。目前舟山市图书馆搜集的新四军专题文献近千件,是反映舟山及浙东地区新四军革命历程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舟山新四军专题资源库的设立也将成为宣扬东海铁军精神、继承和发扬新四军优良传统的重要窗口。

3.2 红色文化空间打造

红色文化空间是以激活红色记忆,传承红色基因,融合社会各界的红色资源为目的,为全社会大力开展常态化红色文献阅读推广活动搭建的平台。公共图书馆红色文化氛围的营造对弘扬红色文化、培养红色文化人才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如何在公共文化服务中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精神是值得思考讨论的新课题^[6]。因此,舟山市图书馆在深入探究小小图书馆红色文化价值的基础上,改造阅读空间,将馆藏文献资源与空间建设相结合,使之成为红色文化宣传、

教育和学习基地。

舟山市图书馆红色文化空间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红色文献的收藏阅览展示区,重点展示舟山新四军专题文献及小小图书馆早期遗留书籍,向党史研究专家及普通读者提供红色文献的专题阅览服务,注重发挥文献的史料价值;二是“东海小小图书馆”墙面展区,通过“东海举烽火”“抗日做先锋”“投身新四军”“功名载史册”四大板块,生动地展示了小小图书馆坚持抗战的烽火岁月,让大众深入了解小小图书馆的抗战历史。图书馆的红色文化空间将文献借阅与现场体验相结合,通过开展参观、讲解等服务,让读者沉浸式地体验革命文化。

3.3 红色文化宣教

红色文化的政治性、理论性强,会让读者产生枯燥、无趣的感觉,降低读者参与此类阅读活动的意愿,给红色文化的传承与推广造成了一定的困难^[7]。因此,新颖的阅读推广渠道,多样的红色活动形式,对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增强读者对红色文化的认同感有着促进作用。

2021年起,为使社会各界更好地了解小小图书馆的革命历史,舟山市图书馆配备兼职讲解员为参观“东海小小图书馆”人员作展区介绍。截至12月份,已接待参观人员逾700人次。同时,结合千岛儿女学党史活动,开展“守好红色根脉”主题宣讲,宣传“东海小小图书馆”的革命故事,这也是一次对舟山革命文化宣教的新尝试。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微信、微博等新兴媒体为人们所熟知,人们可以通过各类快阅读方式获取知识,这为红色文化的推广提供了便利条件^[8]。舟山市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在建党百年之际推出红色专题,分四期介绍“东海小小图书馆”。通过介绍“东海小小图书馆”的原型、小小图书馆的历史、馆内早期藏书和革命文献、新四军文献等方面内容,吸引更多的读者关注及阅读红色文献。

权威性新闻媒体报道是宣传红色文化的主力军,不仅发挥着传递信息的功能,也为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提供导向性的社会公共价值观,图书馆应善于运用媒体传播力,扩大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力。自“东海小小图书馆”开放以来,《舟山日报》《舟山晚报》以及舟山市政府网站陆续刊登相关文章,介绍小小图书馆历史及“东海小小图书馆”展区,使“东海小小图

书馆”成为全市党史教育学习的打卡地,促进了东海革命精神的传承和发扬。

4 总结与思考

4.1 公共图书馆对红色文化传承实践的积极意义

红色文化建设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红色文化资源建设,二是红色文化空间建设,三是红色文化宣传建设^[1]。“东海小小图书馆”通过整合完善当地红色文化资源,打造专属红色文化空间,加强红色文化的宣传推广等手段,在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实践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赢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为公共图书馆开展红色文化传承与实践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一是红色文化资源建设得到进一步强化。“东海小小图书馆”在建设过程中通过征集、捐赠、采购等各种渠道收集整理了大批红色文献资源,并对其进行系统梳理与整合,形成馆藏红色文献目录,极大完善了本地红色文献馆藏资源,为红色资源的开发利用、红色文化的传承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是拥有了本馆专属的红色文化空间。“东海小小图书馆”展区的建成开放,使本馆首次拥有了专属的红色文化空间。红色文化空间通过对小小图书馆历史、红色文献资源的展示与宣讲,营造了浓厚的红色文化氛围,提高了红色资源的利用率。尤其是结合党史学习等主题活动,接待多个企事业单位、学校等参观团体,成为党史宣传教育的重要基地。

三是红色文化宣传力度进一步加强。在以“东海小小图书馆”展区为静态展示宣传的同时,舟山市图书馆还通过报纸、网站、自媒体、微信等多种媒介渠道对本馆红色文献资源进行动态推荐,并结合党史学习活动,以讲座、展览等形式,对红色历史文化进行宣传推广,使广大读者对本地的革命历史及红色文献资源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4.2 公共图书馆红色文化传承工作的局限性

“东海小小图书馆”的探索实践在完善资源建设、营造专属空间、加强宣传推广等方面取得了许多积极成果,但由于受本馆财力、物力、人力等因素限制,仍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这些不足也体现了基层公共图书馆在红色文化传承探索中存在的普遍局限性。

一是红色文献资源价值尚未充分开发。一方面

地方红色文献资源的收集整理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馆藏资源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待提高。另一方面,在资源开发利用上仍停留在书目整理、陈列展示、阅读推广等基础层面,在红色文献资源的学术研究、保护修复、信息共享等方面仍有探索空间,红色文献资源价值仍未得到充分利用。

二是红色文化空间功能建设尚需完善与拓展。

“东海小小图书馆”展区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目前在红色文化空间功能建设方面仍局限于本馆自身资源,与全市其他相关红色教育基地联动不足,本地红色文化空间建设各自为阵,未能形成良性的合作机制,地方红色文化资源未能得到有效整合。

三是红色文化宣传推广仍有探索空间。当前公共图书馆红色文化宣传推广形式以各类媒体宣传推广、线上线下讲座、展览等为主,宣传模式相对传统单一,同时缺乏地方特色浓厚的红色文化活动品牌。

4.3 公共图书馆开展红色文化传承与实践的方向和途径

“东海小小图书馆”的建设,为全市公共图书馆开展红色文化传承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及深刻反思。在此基础上,本地公共图书馆应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以红色文献为抓手,以地方文献为依托,多管齐下,持续推进本地红色文化传承与实践工作。

一是进一步健全红色文化资源体系。加强红色文化资源的采购、征集,特别是要加强本地红色文献,包括书稿、照片、图片等文献资料的征集力度,丰富地方红色文化资源馆藏;联合相关部门、高校建立健全本地红色文化资源电子数据库,搭建共建共享平台;整合市内外专家学者资源,积极开展本地红色文化资源的专题研究,促进红色文化资源的利用与开发。

二是加强区域联动,完善本地红色文化空间建设。公共图书馆在红色文化传承与发展中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而这种优势正是以地方红色遗址故居、红色地方文献为承载。红色地方文献作为公共图书馆的特色馆藏,是展现地方特色文化、地方红色记忆、展示地方发展历程和历史文化沿革的重要史料,同时也是传承红色文化的有效载体^[9]。本地图书馆应在现有红色文化空间资源建设的基础上,加强市区馆联动,充分发挥文化阵地作用,积极开展讲座、培训、展览等活动,同时整合全市红色文化资源,如中共定海县委旧址、舟山市博物馆、蚂蚁岛创业纪念室、定

海南洞艺谷研学基地等,结合地方红色历史,积极开展红色文化研学交流活动,加强与全市红色文化空间联合。

三是积极探索多样化的红色文化宣传模式,创新红色阅读推广路径。积极利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手段加强红色文化宣传力度,积极探索视频、直播等新型传播形式;加强文旅融合,积极挖掘特色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融入本地红色旅游发展,积极宣传红色文化;与高校、中小学校合作,积极开展红色借阅、红色讲座、红色展览、红色学术研讨等各种研学活动,打造红色研学基地;立足馆藏红色文献资源,结合地方红色文化特点,积极探索建设地方红色文化活动品牌,展现地方特色的红色记忆、革命精神,更好地传

承地方红色文化。

5 结语

红色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体现,用好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是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精神的具体实现路径。图书馆作为社会公共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传承红色基因、做好红色教育的社会使命。公共图书馆在传承红色文化的过程中,应始终立足自身的馆藏特色,以红色文献为依托,通过打造红色阅读空间,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宣教活动,创造红色文化“悦读”环境,建立常态化、多样化的红色教育模式。

参考文献:

- [1] 葛智星.公共图书馆开展红色文化建设的思考[J].河南图书馆学刊,2021(8):41.
- [2] 全根先.图书馆与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J].山东图书馆季刊,2005(2):17-20.
- [3] 李娟.抗日战争时期蚂蚁图书馆的特征、模式及启示[J].文教资料,2020(31):47-48.
- [4] 胡时杰.烟雨平生[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46-47.
- [5] 孔辉,万彩霞.高校图书馆红色文献搜集工作探析[J].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12(3):39-41.
- [6] 程远,陶涛,杨志强.空间再造老区红色图书馆助推常态化悦读服务创新实践[J].老区建设,2020(8):60-64.
- [7] 王晓园,曹慧.数字化背景下红色文献阅读推广策略研究:基于扎根理论[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178-179.
- [8] 王瑶.论多媒体环境下县(市)公共图书馆红色文献阅读推广[J].2021(6):27.
- [9] 刘郑.区域公共图书馆红色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路径研究:以北京市西城区图书馆红色文化传承工作为例[J].2021(26):146-149.

作者简介: 岑映,舟山市图书馆地方文献部主任,馆员,研究方向为地方文献;方芳,舟山市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地方文献;柴玥,舟山市图书馆助理馆员,研究方向为地方文献;孔奕,舟山市图书馆助理馆员,研究方向为地方文献。

收稿日期: 2022-02-21

本文责编: 李芳

· 阅读文化 ·

元宇宙 + 阅读：图书馆数字阅读空间发展的新样态

田一斐

(忻州师范学院图书馆 山西忻州 034000)

摘要：元宇宙作为现实世界映射和交互的虚拟世界，具备新型社会体系的数字生活空间。基于“元宇宙”平台建设图书馆数字阅读空间有利于解决当前图书馆实体阅读空间建设所面临的两个空间矛盾点。文章在阐述元宇宙起源发展与概念要素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图书馆实体阅读空间的基本矛盾以及元宇宙在空间边界拓展方面的优势，在挖掘元宇宙技术要素与图书馆数字阅读空间之间的要素关联的基础上，通过对数字阅读元宇宙基本维度、空间构型以及关键要素的分析，构建了数字阅读元宇宙的模型架构，以期对未来数字阅读空间的多样态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元宇宙；数字阅读；阅读空间；图书馆

中图分类号：G250.7

文献标识码：A

Metaverse + Reading: A New Mode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Reading Spaces in Libraries

Abstract As a virtual world that maps and interacts with the real world, the metaverse is a digital living space with a new social system. The construction of library digital reading space based on the platform of "metaverse" is conducive to solving two spatial contradictions faced by the construction of physical library reading space.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basic contradictions of the current physical library reading space and the advantages of metaverse in spatial boundary expansion on the ba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etaverse origin and concept elements. On the basis of mining the elemental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technical elements of the metaverse and the digital reading space of libraries, the basic dimensions, spatial configurations and key elements of the digital reading metaverse are analyz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metaverse. The model architecture of the digital reading metaverse is constructed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construction of diverse states of digital reading spaces.

Key words metaverse; digital reading; reading space; library

“元宇宙”为空间赋予了更丰富、立体的内涵，其突破了传统简单维度体验与交流的局限性，为拓展实体空间边界、塑造全新的数字与现实体验带来了可能。Roblox首席执行官戴夫表示，元宇宙的未来将由用户主导创造，Roblox公司将作为平台为用户提供技术与工具方面的支撑。可见，元宇宙将在用户的创新实践中孕育出更加多维、更宽边界的信息互联、沉浸交互、虚实共生的多样生态空间。一直以来，图书馆存储着人类对世界探索发现的全部智慧结晶，是现实社会知识永续存储的重要渠道与保障，对于未来

虚拟社会而言也是如此^[1]。元宇宙理念在图书馆与信息科学领域的应用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国内相关学者围绕图书馆的数字记忆^[2]、沉浸式阅读^[3]、社会教育^[4]、智慧服务^[5]等主题开展了元宇宙在图书馆中应用的相关研究。考虑到图书馆数字阅读空间建设与元宇宙具有一定的契合性。因此，图书馆要积极拥抱元宇宙的创新技术变革，抓住机遇融入到元宇宙全新的社会生态之中，并以数字阅读空间建设为着眼点，基于元宇宙平台拓宽现实阅读空间边界，探索虚实相融的数字阅读空间发展新样态。

1 元宇宙概述

1.1 元宇宙的起源与发展

元宇宙 (Metaverse) 的概念最早源于1992年由 Neal Stephenson 执笔的科幻小说 *Snow Crash*, 该书构想了现实世界人类利用VR设备实现了与虚拟人在虚拟空间的共生。2003年由林登实验室 (Linden Labs) 发布的“第二人生” (Second Life) 塑造了一个现象级虚拟世界, 该平台被视为元宇宙的雏形, 其提供了一个具有自编辑功能, 且拥有自主虚拟经济系统的开放平台^[6]。在该平台上, IBM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 公司曾购买虚拟地产建立销售中心, 麦克马斯特大学图书馆、北卡罗纳州立大学图书馆等近百所高校图书馆利用该平台建立了虚拟图书馆, 实现了在虚拟空间进行参考咨询、虚拟教学培训等图书馆服务的实践探索^[7]。随后, 包括《头号玩家》等影视化作品对元宇宙概念进行了具象化影视呈现。2021年以来, Roblox、Facebook、苹果、谷歌、阿里、腾讯、字节跳动等各大公司年度加速在元宇宙的抢滩布局, 因此2021年被称为元宇宙元年。可以说, 是5G通信技术、人工智能以及包括VR (Virtual Reality)、AR (Augmented Reality)、MR (Mixed Reality) 等交互技术的突破性进展, 为元宇宙的加速出圈带来了技术保障^[8]。为了统筹元宇宙相关技术领域的协同发展, 我国先后建立了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元宇宙产业委员会 (China Mobile Communications Association Metaverse Consensus Circle, CMCA-MCC) 以及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元宇宙工作委员会, 以引导并推动“元宇宙”产业的有序、健康发展。

1.2 元宇宙的概念要素

元宇宙的产业化发展虽源于游戏但却不止于游戏。正如“互联网+”的热潮席卷了各行各业, 元宇宙也在催生行业开展新一轮的融合创新与升级变革。领域专家学者、各大企业纷纷研究探讨, 但对元宇宙的定义莫衷一是。清华大学王儒西等学者认为, 元宇宙是在新技术集成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虚实空间融合的一种新型社会形态, 其融合了虚、实世界的经济、社交以及身份系统, 并通过开放平台促进所有用户参与世界编辑与内容创作^[9]。总的来说, 元宇宙是通过集成扩展现实、区块链、人工智能、网络与运算、物联

网、数字孪生等先进技术搭建的一个可提供沉浸社交、支持经济交易、开放内容编辑的创新平台。它构建了一个区别于现实世界却也基于现实的社会生态, 打破了原有的虚实空间边界, 重新定义了时空属性并为现实资源与虚拟数字资源的多元融合、视觉呈现与沉浸体验创造了可能。

1.3 元宇宙的关键性支撑技术

“元宇宙”为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沟通与融合搭建了桥梁, 是由多元技术与技术应用平台构成的虚实相融的复杂时空场域。邢杰、赵国栋等人在《元宇宙通证》^[10]一书中提出了元宇宙的六大类支撑性先进技术, 具体包括了网络与运算技术、区块链技术、物联网技术、电子游戏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交互技术六大类技术。而图书馆数字阅读空间的搭建以及扩展离不开技术平台的支撑, 可以说“元宇宙”的出现为图书馆数字阅读空间的发展样态带来了新的构想。

2 元宇宙技术与图书馆数字阅读空间建设

基于元宇宙平台建设图书馆数字阅读空间有利于解决当前图书馆实体阅读空间建设所存在的两个空间矛盾点。首先, 图书馆具有先天的资源优势, 但同时实体资源存储空间有限, 日益增长的实体资源总量与有限的实体存储空间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 且这种矛盾会随着资源剔旧效率的降低而不断加深。其次, 不同用户群体对于所需阅读空间的动态需求与图书馆阅读空间种类单一、家具设备不足、空间数量较少之间存在矛盾^[11]。图书馆用户的阅读空间需求具有多样性和易变性, 虽然已有很多图书馆不断在其空间重构/空间再造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 但囿于成本压力以及空间资源有限, 从实体空间角度进行革新存在效果、持久性不强的问题。而元宇宙技术平台的出现为解决这一现实存在的空间矛盾带来了契机。

早在2006年, 图书馆界便在被称为元宇宙雏形的“第二人生”上启动了“第二人生图书馆2.0”这一新型虚拟图书馆平台。联盟图书馆系统 (Alliance Library System, ALS) 通过该虚拟图书馆平台为“第二人生”的虚拟用户提供了阅读探讨与培训交流的空间。随后, 麦克马斯特大学 (McMaster University) 图书馆也在“第二人生”平台上创建了高校虚拟图书馆, 并在虚拟图书馆内提供了与实体图书馆文献资源相

对应的数字资源索引链接,同时基于该平台试验评估了高校图书馆提供虚拟参考咨询的可行性^[12]。借助元宇宙平台扩展图书馆阅读空间已有了实践基础,未来,随着数字孪生技术、交互技术(VR+AR+MR+传感技术+全息影像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成熟发展,图书馆将吸纳、融合多样技术成果,基于用户动态变化的空间需求在元宇宙平台上不断延展实体阅读空间、打造创新型虚拟阅读空间,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图书馆实体阅读空间的现实矛盾。

3 元宇宙与数字阅读空间的技术要素联结

元宇宙的技术要素与图书馆数字阅读空间要素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勾连。在元宇宙的关键技术要素中,网络与运算技术、区块链技术、物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以及交互技术同时也是图书馆数字阅读空间搭建的关键技术要素,具体如图1所示。包括5G/6G、边缘计算以及云计算在内的网络与运算技术为数字阅读空间提供了基础网络环境,是图书馆数字阅读空间的基础网络保障。区块链技术中非对称加密等技术是虚拟空间认证机制创建的技术支撑,为图书馆数字阅读空间的用户身份认证提供了保障。物联网技术帮助实现了万物互联平台的建设,通过传感器、物联网管理系统等将现实世界的时空状态信息相互连通,并与虚拟世界关联融合,是虚实世界联结的关键所在,能够为图书馆数字阅读空间与实体阅读空间的互联通信提供保障。交互技术提供了虚实交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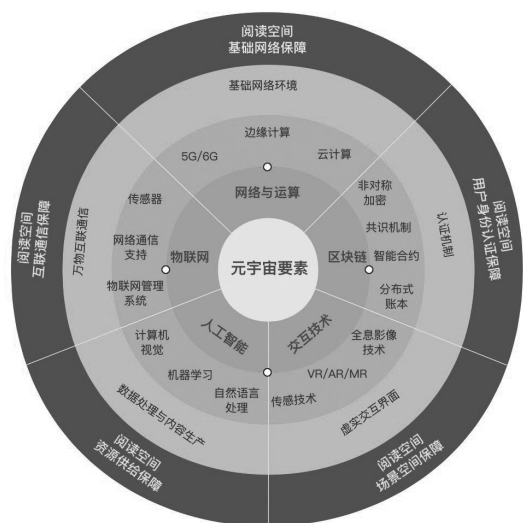


图1 元宇宙与数字阅读空间的要素联结图

界面,能捕获人类的视听感受与躯体感觉,为元宇宙平台提供信息渠道,实现虚拟、现实世界的融合、切换,是图书馆数字阅读空间的场景空间保障,为提升数字阅读沉浸感提供了重要技术依托。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人工智能技术帮助有效促进数字阅读空间内用户信息与数字资源的整合处理与审查发布,且在数字内容生成上更加智能高效,有助于数字阅读空间实现无边界的、自发式增长,也为数字阅读空间的资源供给提供了基本保障。

4 元宇宙 + 阅读：数字阅读元宇宙的模型样态

4.1 数字阅读元宇宙的基本维度与空间构型

元宇宙与图书馆数字阅读空间之间的要素联结为数字阅读元宇宙的搭建提供了技术与平台保障。数字阅读元宇宙是依托于元宇宙平台,基于网络与运算、人工智能、交互技术、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融合构建的虚实相融的空间场域。数字阅读元宇宙的构建包含“从实向虚”“从虚入实”两个维度、“虚拟/孪生阅读空间”“虚实融合阅读空间”两种空间构型,具体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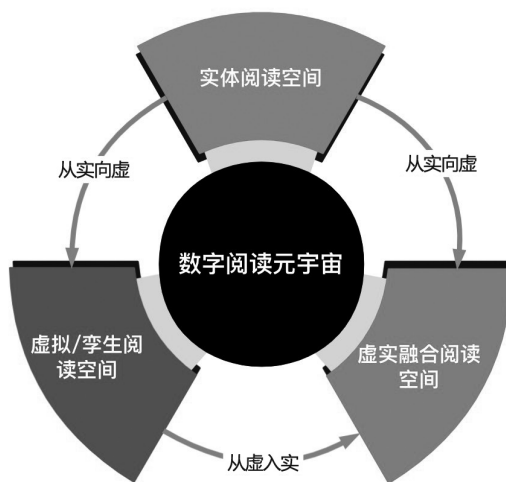


图2 数字阅读元宇宙的空间转化图

“从实向虚”是基于现实世界图书馆阅读空间的基本样貌对虚拟阅读空间的模拟建设,即构建实体阅读空间的虚拟孪生体,通过交互技术设备实现感知接管从而增加虚拟阅读空间的现实体验感与沉浸感。本质上是图书馆实体阅读空间的一种数字化、现实化的虚拟体验。例如,哈佛虚拟图书馆提供虚拟浏

览服务,其“货架视图”业务版块可实现图书馆空间的3D虚拟呈现,用户足不出户便可浏览各分馆的文献资源^[13]。“从实向虚”的数字阅读空间建设实现了实体阅读空间的虚拟扩展,拓展了读者在虚拟阅读空间的感官维度,提供了沉浸式的视觉、听觉与触觉体验。

“从虚入实”即脱离实体阅读空间现有的场景束缚,完全基于图书馆以及用户群体自身的空间想象进行空间创造。虚实融合阅读空间即在实体阅读空间内融入虚拟元素,或通过交互技术设备等塑造临场阅读体验。例如,在未来的元宇宙阅读空间,虚拟数字人可连接人与虚、实场景间的交互,代替图书馆员提供各类服务,减轻馆员的工作压力。同时,虚实融合阅读空间的塑造能为实体阅读空间带来真实流量,提高图书馆实体阅读空间的用户体量。

4.2 数字阅读元宇宙的模型样态

4.2.1 数字阅读元宇宙的关键要素

元宇宙图书馆沉浸式体验的达成有赖于“人”“场”“物”的要素重构^[14],对于图书馆数字阅读元宇宙而言,“人”“场”“物”也是构建的关键性要素。

“人”是数字阅读元宇宙的核心主体,无论是享受服务的用户群体还是提供服务的图书馆员群体,他们在数字阅读元宇宙中都能创建与个体身份相对应的虚拟身份。此外,在元宇宙空间中还可创建独立于现实世界的虚拟数字人,且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虚拟数字人也将自主生长拥有越来越饱满的人格特质与技能属性,未来通过虚拟馆员为个体用户提供一对一的个性化服务也将成为可能。

“场”即数字阅读的场景空间,在数字阅读元宇宙中,用户以及图书馆员都拥有自由创建空间场域的权利,数字阅读元宇宙的空间场域将会更具丰富性与多样态,不仅包括与实体阅读空间相映射的孪生空间,还可根据用户的多样化空间需求,在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技术的智能辅助下生成个人虚拟阅读空间,建设私人定制化的虚拟阅读书架。此外,虚拟阅读空间具有高度灵活性与适应性,用户可以根据需求的动态变化进行编辑拓展。

“物”代表了数字阅读空间的资源集合,包括数字信息资源与设施设备资源。数字阅读元宇宙中的数字信息资源一方面来源于图书馆主体,涵盖实体馆藏资源的数字化部分以及图书馆所购买的数据库资源。

另一方面来自于用户主体,即由图书馆用户生成的数字内容。用户在数字阅读元宇宙中具备内容分发自由度,拥有信息发布与共享权限后,便可实现自由构建基于用户生成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UGC)的私人/开放内容平台。此外,由人工智能技术也将智能生成海量、差异化数字内容(人工智能自主生成内容,AI Generated Content,简称AIGC)^[15]。随着内容生成体量的不断扩大,数字阅读元宇宙的资源丰富性也会随之增长。除了数字信息资源以外,设施设备资源也是数字阅读空间的关键资源。设施设备资源包含虚拟书架、虚拟桌椅等虚拟家具设施,以及各类具有空间装扮属性的虚拟物件,这些虚拟资源对于数字阅读空间的个性化布局具有重要作用。

4.2.2 数字阅读元宇宙的模型样态

通过对数字阅读元宇宙基本维度、空间构型以及关键要素的分析,笔者构建了数字阅读元宇宙的模型架构(见图3)。其中,底层技术架构层为网络与运算技术、AI技术、区块链技术、交互技术、物联网技术等数字阅读空间构建的关键支撑性技术。第二层为平台应用层。随着元宇宙技术布局与应用规划的逐渐成熟,元宇宙专有平台以及配套系统软件、应用软件、可穿戴设备等平台应用也将逐渐成熟。第三层为数字阅读空间架构层。数字阅读元宇宙极大地扩展了图书馆原有的空间界限,它既包括了实体场馆、实体资源的孪生阅读空间,也包括了完全平行于实体阅读空间的、由用户主体的阅读空间想象所勾勒的虚拟阅读空间,以及借助AI、XR(Extended Reality)与AR等技术所构建的融合叠加了虚拟数字人、虚拟场景空间以及虚拟资源要素的虚实融合阅读空间。通过虚实空间、资源的融合与叠加,丰富了数字阅读空间的内涵与使用边界,为图书馆数字阅读空间发展描绘了多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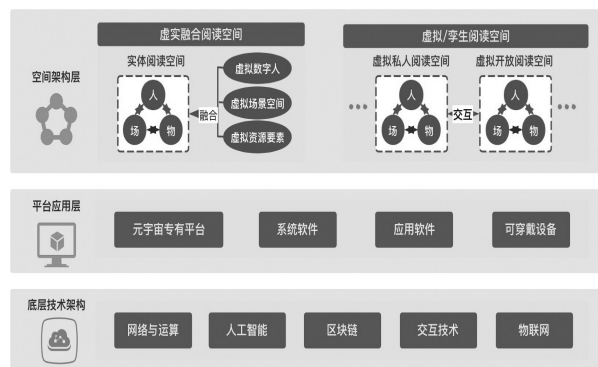


图3 数字阅读元宇宙的模型架构

模态。

无论数字阅读空间是否依托于原有实体空间,用户都能够在元宇宙平台上创建其专属的个性化阅读场景空间^[16],并可在权限允许的范围内根据需求自由编辑,构建多元场景属性的阅读空间,并可以根据隐私需求选择开放或加密私人阅读空间。相比于现有实体图书馆阅读空间,数字阅读空间增加了社交属性,私人加密/开放阅读空间与公有开放阅读空间之间可

实现实时交互,用户在阅读空间内的社交沉浸感增强,阅读空间的功能性也得以提升。例如,用户可以通过向指定用户开放私人虚拟阅读空间进行读书分享、专题研讨与交流,且在异地也能够获得沉浸式阅读体验。可以说,数字阅读元宇宙具有无限的自生长特性,伴随用户不断地进行自发性空间创新以及空间之间的沉浸交互,数字阅读空间将会积累越来越丰富的细分场景与更加多元化的发展样态。

参考文献:

- [1] 杨新涯,钱国富,唱婷婷,等.元宇宙是图书馆的未来吗?[J].图书馆论坛,2021,41(12):35-44.
- [2] 夏翠娟,铁钟,黄薇.元宇宙中的数字记忆:“虚拟数字人”的数字记忆概念模型及其应用场景[J/OL].图书馆论坛:1-9.[2022-03-22].<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4.1306.g2.20220311.1518.002.html>.
- [3] 何思倩,覃京燕.从VR/AR到元宇宙:面向α世代的沉浸式儿童绘本交互设计研究[J/OL].图书馆建设:1-14.[2022-03-22].<http://kns.cnki.net/kcms/detail/23.1331.G2.20220215.1946.002.html>.
- [4] 娄方园,邹轶韬,高振,等.元宇宙赋能的图书馆社会教育:场景、审视与应对[J/OL].图书馆论坛:1-9.[2022-03-22].<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4.1306.G2.20220210.1144.002.html>.
- [5] 李默.元宇宙视域下的智慧图书馆服务模式与技术框架研究[J/OL].情报理论与实践:1-7.[2022-03-22].<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1762.G3.20220111.1104.002.html>.
- [6] 向安玲,高爽,彭影彤,等.知识重组与场景再构:面向数字资源管理的元宇宙[J/OL].图书情报知识:1-10.[2022-01-24].<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2.1085.G2.20211119.1637.002.html>.
- [7] 宁岩,王群.国外图书馆基于Second Life的服务实践研究[J].图书与情报,2012(5):70-74.
- [8] 郭亚军,李帅,丁菲,等.美国大学图书馆的虚拟仿真应用实践——对美国TOP100大学图书馆VR/AR应用的调查[J/OL].图书馆论坛:1-9.[2022-01-24].<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4.1306.G2.20211119.1131.006.html>.
- [9] 搜狐网.清华大学:2021元宇宙发展研究报告[EB/OL].[2021-09-17].https://www.sohu.com/a/490523841_407401.
- [10] 邢杰,赵国栋,徐远重,等.元宇宙通证[M].北京:中译出版社,2021.
- [11] 陈定权,尚洁,汪庆怡,等.在虚与实之间想象元宇宙中图书馆的模样[J/OL].图书馆论坛,2022(1):1-7.[2022-01-24].<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4.1306.G2.20211210.1651.002.html>.
- [12] 刘妍,柴玉燕.高校图书馆空间再造与创新服务:现状·问题·思考[J].图书馆学刊,2021,43(11):35-39,102.
- [13] 宁岩,王群.国外图书馆基于Second Life的服务实践研究[J].图书与情报,2012(5):70-74.
- [14] 李洪晨,马捷.沉浸理论视角下元宇宙图书馆“人、场、物”重构研究[J].情报科学,2022,40(1):10-15.
- [15] 孙树明.国联证券:元宇宙基础设施初具规模 工业和消费应用场景萌发[EB/OL].[2022-01-12].<https://www.sgpjbg.com/baogao/59336.html>.
- [16] 张姝末,朱波,王飒.图书馆多元交互智慧阅读空间构建研究[J].河南图书馆学刊,2021,41(11):108-110.

作者简介: 田一斐,忻州师范学院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馆管理与服务。

收稿日期: 2022-02-24

本文责编: 郑秀花

· 文献学研究 ·

《酒小史》非宋人著作*

邱志诚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浙江温州 325035)

摘要:《酒小史》一书最早见于百二十卷本《说郛》，研究者均沿其说视之为宋伯仁著作，据以探讨宋代或元代酿酒业发展。然该书实非宋氏所撰，而为明末《说郛》增辑者陶珽托名其下的伪作。主要依据有三条：一是该书所记真腊、假马里丁等外国酒为包括宋伯仁在内的宋人所不可得而知者；二是书中所记地方名酒名称基本上是三字且俗，不同于宋酒之二字雅名，并且很多是明代才产生的名酒；三是书中所记宋代皇室、官僚之酒及宋以前历史名酒文本与明人《焦氏说楮》《说略》《骈字冯霄》高度重合，换言之，即自三书抄录、综合而成。

关键词:《酒小史》；宋伯仁；《说郛》；陶珽；酒谱

中图分类号: G256.22

文献标识码: A

Little History of Wine not Written by Song Boren

Abstract *The Little History of Wine* was first discovered in the 120 volumes of *Shuo Fu*. All researchers regard it as the work of Song Boren to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rewing industry in the Song or Yuan Dynasty. However, the book was not written by Song, and was a fake work by Tao Ting, the editor of *Shuo-fu*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ere are three main reasons: Firstly, the wine of Chenla, Carimata and other foreign countries recorded in the book were impossible for Song Dynasty people to know. Secondly, most of the famous local wine names recorded in the book are three characters and vulgar, different from the elegant name of the Song Dynasty wine with two characters, and many of them are famous wines produced in the Ming Dynasty. Thirdly, the text of the wine of the royal family and bureaucrats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 historical famous wine before the Song Dynasty in the book is highly consistent with *Jiao Shi Shuo Ku*, *Shuo Lue*, and *Pian Zi Ping Xiao*. In other words, *the Little History of Wine* is a synthesis of the relevant content of the three books.

Key words *The Little History of Wine*; Song Boren; *Shuo Fu*; Tao Ting; Jiu Pu

《酒小史》一书最早见于百二十卷本《说郛》，署名“元宋伯仁”^{[1] 94, 4334}，故学界大多沿其说而视之为元代酿酒类著作^①。宋伯仁又有《梅花喜神谱》一书，该书在美术史上享有一定声誉，初刻于宋理宗嘉熙二年（1238年），今存最早版本为宋景定二年（1261年）金华双桂堂刻本，据此可知宋氏为宋人，因此少数学者即以为《酒小史》为宋代酒类著作^②。要之，均认为《酒小史》为宋伯仁所撰，而据以探讨宋代或元代酿

酒业情况。笔者经过研究，认为该书并非宋氏著作，实为明末陶珽托名其下的伪作。兹试为申说，敬请方家教正。

《酒小史》名为一卷，实际上是一篇短文，所记仅酒名及产地，可以说与北宋张能臣《酒名记》一样，也是一篇“酒名记”，区别在于其不仅记当世名酒，也记历史上的名酒，故书名不称“记”而称“史”。作者宋伯仁，因未历显宦，故生平不显，清以前载籍仅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宋代农书研究”（项目编号：15BZS06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两宋名贤小集》“宋伯仁，字器之，茗川人。有《雪岩集》《马塍稿》”^[2]、《自号录》“雪岩（宋伯仁，字器之）”^[3]数字而已。最早考述其生平者，为四库馆臣及清代著名藏书家黄丕烈，前者较之《两宋名贤小集》，所增仅多“嘉熙中为盐运司属官，多与高九万、孙季蕃唱和”^[4]一事；后者虽近百字，但除去虚饰之语，所增亦仅“举宏词科，历监淮扬盐课”^[5]黄丕烈《跋》：3b一事。今人研究涉其生平者多承此而简略介绍^③，或径云事迹不详，稍为考详者似仅程杰^[6]、张东华^[7]二氏。笔者在其基础上再为穷搜，略有所得，乃兼以理证，将宋氏生平整齐如下：

宋伯仁，字器之，号雪岩、雪岩耕田夫，茗川（湖州别名）人^[8]。据宋氏列于“嘉熙戊戌（二年，1238年）家马塍稿”下的《四十》一诗：“役役人间世，齐头四十年。读书虽未已，作事亦徒然。宦业蕉中鹿，生涯叶底蝉。愿逢时务好，一榻醉时眠”^[8]，可知其生年为庆元五年（1199年）。则《说郛》将《酒小史》署为“元宋伯仁”的确应予更正——即或宋氏身入元朝，也已78岁高龄）。有学者谓其为北宋人^④，当然亦属错误。致误之由可能是《诗衡》有云：“宋伯仁《过烂溪有作》……措辞何等旷达。尝以诗献东坡，东坡云：‘有才如此，独不令我一识面耶？’”^[9]实际上苏轼此语是为晁补之的堂弟晁咏之而发^[10]。宋伯仁绍定六年（1233年）曾任泰州拼桑榷场税监，端平三年（1236年）受代未得新任^⑤，乃入京谋职。遂有其《雪岩吟草》卷首自注之事：“嘉熙丁酉（元年，1237年）五月二十一寓京遭焚，侨居西马塍，故曰《西塍》。”^[8]宋氏虽锐意功名，始终位居下僚，故黄丕烈云：“（宋伯仁）禄位不显，（国）事已难为，故语多慷慨。”^[5]黄丕烈《跋》：3b。“（国）事已难为”不可理解为黄丕烈之意为南宋亡国、宋氏入元。倘已入元，焉能“语多慷慨”？理宗宝祐三年（1255年）就有人在朝门上大书“阎马丁当，国势将亡”^[11]，是南宋晚期人人皆知“（国）事已难为”矣。为昭己志，宋伯仁酷爱梅花，自谓有“梅癖”，因作《梅花喜神谱》一书。正如其自序所指出，不可徒视该书之作为以“闲功夫作闲事业”，而是有“动爱君忧国之士，出欲将入欲相，垂绅正笏，措天下于泰山之安”之意存焉^[5]《序》：3a-4b，^[12]。此外，宋伯仁还有《西塍集》（一作《西塍稿》，内容与《雪岩吟草》重复）、《烟波渔隐词》等著作及《烟波图》等画作。

上文较为清楚地介绍了宋伯仁的生平，即可知

《酒小史》断非其作，主要有三条依据。

其一，《酒小史》记外国酒云：

苏禄国蔗酒。南粤蒙枸酱。高丽国林虑酱。河陵国柳花酒。西域葡萄酒。乌孙国青田酒。彭坑酿浆为酒。东西竺以椰子为酒。北胡消肠酒。南蛮槟榔酒。答刺国酿茭棒为酒。真蜡国有酒五，一曰蜜糖酒，一曰朋牙四，一曰包棱角，一曰糖鉴酒，一曰茭浆酒。暹罗国酿秫为酒。假马里丁酿蔗为酒^[1]引94，4335-4336。

其中真腊五酒最早出自元周达观《真腊风土记》：

酒有四等：第一等唐人（中国侨民）呼为蜜糖酒……其次者土人呼为朋牙四，以树叶为之。朋牙四者，乃一等树叶之名也。又其次以米或以刺饭为之，名曰包棱角。盖包棱角者，米也。其下有糖鉴酒，以糖为之。又入港滨水，又有茭浆酒。盖有一等茭叶，生于水滨，其浆可以酿酒^[13]。

《真腊风土记》是周达观元贞二年（1296年）至三年（1297年）出使柬埔寨后撰成的（至晚不超过1312年）。假马里丁之名最早见于《星槎胜览》：“假马里丁……酿蔗为酒。”^⑥《星槎胜览》是费信（约1388—1436年以后^[14]）随郑和下西洋（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1405—1433年）之后撰成的，一般认为成书于正统元年（1436年）。显然，《酒小史》中记载的部分外国酒是南宋人宋伯仁绝不可能知道的——宋氏要获知真腊五酒，须寿逾百岁；要获知假马里丁酒事更须寿至238岁；极而言之，就令《星槎胜览》成书于郑和下西洋首航之年，即永乐三年（1405年），宋伯仁也须寿至207岁，仍然绝无可能。

其二，酒之命名，各代皆有其风尚，如唐人多以“春”名酒：

《（唐）国史补》云：酒有……蒙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梁）[冻]（“梁”应作“冻”，下同）春、剑南之烧（香）春……云安曲米春……松醪春。唐人多以春名酒也^[15]。

唐人多以春名酒。如曲米春……老春……抛青春……松醪春……金陵春……梨花春……又富平有石（梁）[冻]春^[16]89。

宋代酒名基本上都是两字雅名，且均不加“酒”字。如玉液、玉醪、玉髓、琼浆、琼液、琼波、仙醪、仙醇、金波、银光、银液、玉泉、瑶泉、舜泉；个别三字酒名基本上称为“××堂”，如玉瑞堂、甘露堂、清心

堂等^[1]号94, 4336-4337。而《酒小史》所记,除宋以前历史名酒及宋代后妃、宗室、戚里、公卿等上层阶级所造酒品有相同之处外(此部分酒名来自宋代及宋以前之书,自然相同),其余所谓宋代各地名酒与张能臣《酒名记》有很大差异——两书所载地方名酒几不互见。张能臣为北宋后期人,宋伯仁为南宋中后期人,两宋之间不当有如此大的差异。更重要的是,《酒小史》所载宋酒中多有明代才产生的常见名酒,如平阳襄陵酒、淮南菰豆酒、淮安苦蒿酒、池州池阳酒、杭城秋露白、金华府金华酒(“金华府”亦明代才有其称)、处州金盘露、华氏荡口酒、顾氏三白酒、成都刺麻酒等^⑦。

明酒基本上是三字俗名,顾起元(1565—1628年)《客座赘语》恰好备载当时之酒,兹引录以见:

自余所耳目市酤所有,惟……曰细酒……士大夫所用曰金华酒……后始有市苏之三白酒者……

计生平所尝,若大内之满殿香,大官(《酒小史》作“燕京”)之内法酒,京师之黄米酒,蓟州之薏苡酒(《酒小史》作“薏苡仁酒”),永平之桑落酒……济南之秋露白酒(《酒小史》舍此而从下揭《说略》)……麻姑之神功泉酒,兰溪(《酒小史》作“处州”)之金盘露酒,绍兴之苕酒,粤西(《酒小史》作“苍梧”)之桑寄生酒(《酒小史》无“桑”字),粤东之荔枝酒,汾州(《酒小史》作“山西”)之羊羔酒,淮安之苕酒、苦蒿酒,高邮之五加皮酒……无锡之华氏荡口酒、何氏松花酒,多色味冠绝者。若市酤,浦口之金酒,苏州之坛酒、三白酒……皆品在下中。内苏之三白、徽之白酒间有佳者,其他色味俱不宜入杯勺矣。若山西(《酒小史》作“平阳”)之襄陵酒、河津酒,成都之郫筒酒,关中之蒲桃酒……博罗之桂酒(《酒小史》作“桂醕”),余皆未见……若四川之咂麻酒(《酒小史》作“成都刺麻酒”),勿饮可也^[17]。

与此相同,《酒小史》所记地方酒名基本上也是三个字,且第三字为“酒”,名亦较“俗”,如苦蒿酒、五加皮酒、茅柴酒、搗酒、池阳酒等,绝异于宋酒之二字雅名,并且其中很多是明代才产生的名酒。即使有个别酒名宋代偶或一见,然实为地方小酒,几无知者,如产于南康军建(章)[昌]县的麻姑酒,宋代文献惟其乡人洪迈《夷坚志》一见^[18],至明代则发展成名特产品^[19],“天下驰名”^[20]——以明代地方名酒冒充宋代地方名酒正是《说郛》增辑者陶珽制造此类伪书之一贯手法,如同样为其伪作的田锡《曲本草》^[21]中所

载南京瓶酒即明代产量很高的官造名酒,桂萼还将之作为“十二事”之一专门上奏请罢之:“免解瓶酒以省烦劳。臣会议得南京岁造瓶酒虽系旧规,但法久弊生,虚费钱粮,无补国用……”^[22]《曲本草》中也载有淮安绿豆酒、处州金盆露(即金盘露)等。既知《酒小史》所谓“宋代地方名酒”多为明酒,则其为“三字酒名且俗”之由可知:

(隆)庆、(万)历间,士大夫家间有开局造酒者,前此如王虚窗之真一、徐启东之凤泉、乌龙潭朱氏之荷花、王藩幕澄宇之露华清、施太学凤鸣之靠壁清,皆名佳酝。近日益多造者……又有号菊英者……金盘露者……于是市贾所酤,仅以供间阎轰饮之用,而学士大夫无复有索而酤之者矣^⑧。

也就是说,《酒小史》所记为明代市酤名酒,这些酒因缺乏士大夫参与,故不得佳名亦不能为佳名矣。

其三,《酒小史》所记宋代宫廷、宗室、外戚、官僚之酒及宋以前历史名酒皆有所本,与《焦氏说郛》《说略》《骈字冯(同“凭”)霄》明人著述高度重合,换言之即自三书抄录、综合而成。焦周(1564?—1605年,焦竑子)《焦氏说郛》辑录宋代皇室官僚之酒云(与《酒小史》相同之处以单下划线标示,地方名酒、外国酒相同亦标出):

宋人小说酒有:若下,谓乌程也。九酝(《酒小史》作“九酝酒”),谓宜城也。千日,中山也。蒲萄,西凉(《酒小史》作“西域”)也。竹叶,豫北也。土窟春,荣阳也。不冻春,富平也。烧(香)[春],剑南也。桑落,陕西也。乌孙国,有青田核酒(《酒小史》作“青田酒”)……又以黄柑酹酒,曰洞庭春色(《酒小史》前加“安定郡王”)。此古人名酒者也。(宋)诸后殿、亲王府与王第勋戚之家例许造酝,间赐以美名:惠恭后殿曰仪德,宁德后殿曰坤仪,德隆殿曰月波,澜圣后殿曰坤珍,宣仁高后宅曰香泉,钦圣后宅曰天醇,钦成朱后宅曰瑞绿,昭怀刘后宅曰玉腴,明达刘后宅曰瑶池……肃邸曰兰旨,昌王宫曰瑞露,潞王宫曰亲贤,李遵勗曰金波,王师约曰源瑶……曹诗曰成春,曹(成)[晟]曰保平,潘正夫曰源庆,曹澍曰介寿,蔡京曰君臣庆会醕(《酒小史》略作“庆会”),蔡绛曰棣萃,童贯曰褒功。又官府所造,开封曰瑶泉,洛口曰金泉^{[16]89-90}。

顾起元《说略》则备述历史名酒与外国名酒(与《酒小史》相同之处以单下划线标示):

历代酿酒名家……春秋时有椒浆酒；汉时西京有金浆醪；晋时阮籍有步兵厨酒……宋昌王有八桂酒，一名瑞露；南唐时腊月酿酒，四月成，名曰腊酒。宋时有齐云清露，杭新城有秋露白，处州有金盘露，刘拾遗家造玉露春，宋德隆造酒名月波，曹湜有酒名介寿，曹晟名酒曰保平，宋刘后有酒名玉腴，秦桧造酒名表勋，潞州烧酒名珍珠红。宋时有酒名银光，相州有酒名碎玉，宋开封有酒名瑶泉，王师约有酒名瑶源，刘后有酒名瑶池，东坡有酒名罗浮春，范至能酿酒于成都，用八桂法，名万里春……梁简文有酒名鳧花……广南有香蛇酒，道士杨世昌造蜜（《酒小史》作“密”）酒，西凉（《酒小史》作“西域”）州造葡萄酒，肃王有兰香酒，汉武帝时有兰生酒，蔡攸造棣花酒，陆士衡有松醪。广西有风藤酒，又有椰子酒；淮南有菜豆酒，名曰绿珠香液。黄州有压茅柴（《酒小史》作“茅柴酒”）；孙思邈造醪醑酒；段成式有造醪醑法，为湘东美品……唐魏征家有酒名醪醑翠涛，十年不败。宋高后有酒名香泉……

名酒最古者关中之桑落……

前酒名未备，今更疏之……隋炀帝得法于胡人，造酒曰玉薤。唐名酒有……新丰、南陵……又干和、五（穀）[酸]、宣城之九酝（《酒小史》多“酒”字）、河东之桑落……汉大官有桐（《酒小史》）作“桐”）马酒……又宋南渡御库有流香，三省缴赏库有碧香，殿司有凤泉，祠祭有玉练槌……

外夷之酒：……乌孙国有青田核酒……河陵国有椰树花酒……南蛮有槟榔酒……扶南国有椰浆（《酒小史》作“石榴酒”），又有甘蔗、土瓜根酒，辰溪蛮有约藤酒，赤土国有甘蔗酒，苏禄国有蔗酒，高丽国有林卢浆（《酒小史》作“林虑浆”）。真腊国有蜜糖酒；朋牙四酒，以树叶为之；有包稜角酒，包稜角，米也；有糖釜酒；有芰浆酒，芰叶所成（《酒小史》仅言酒名）^[23]。

徐应秋（生卒年不详，万历四十四年即1616年进士）《骈字冯（同“凭”）霄》亦多记包括宋酒在内的历代名酒（与《酒小史》相同之处以单下划线标示）：

鳧花清（梁简文酒也）。琼琯酎（岭南酒也）……玉薤（隋炀帝酒也）。醪醑翠涛（魏征酒也）……霹雳春（闽中酒也）。桐马酒（汉大官酒也——《酒小史》作“桐马酒”）……李花酿（唐宪宗酒也）。昆仑觞（魏

贾鏐接黄河源水所酿也——《酒小史》“贾鏐”作“贾将”）……九酝酒（张华以指星麦酿曲所制也……）。金浆醪（西京名酒也）。含春（冯翊酒也）……玉窟春（荥阳酒也）。不冻春（富平酒也）。玉露春（刘拾遗酒也）。腴玉（刘后酒也——《酒小史》“刘后”作“宋刘后”）。烧春（剑南酒也）……万国春（范至能）……棣花酒（蔡攸酒也）……林虑浆（唐时名酒也）……石榴酒（甘蔗酒、土瓜酒，扶南酒也）。槟榔酒（南蛮酒也——《酒小史》“槟榔”作“檳榔”）……唐时玉练槌（唐时名酒也……）。珍珠红（潞州酒也）。谢家红（汀州酒也）……荔枝绿（王公权酒也）。绿荔枝（谢侍郎酒也）……瑤珞膏（燕昭王酒也，见王子年《拾遗记》）。缥玉酒（梁孝王酒也，见《西京杂记》）……桂醪（博罗县酒也）。梨花酒（杭州酒也）……玉窟春（荥阳酒也）。……郛筒（郛县酒也）。香蛇酒（广南酒也）……兰生酒（汉武帝酒也）。干和（邠州酒也——《酒小史》“邠州”作“汾州”）。宜春（安成酒也）……竹叶（苍梧酒也）……醪醑香（西京酒也）^⑨。

可见，《酒小史》必抄录自上述三书。

《酒小史》最早见于《说郛》，此前未见任何著录、征引。《说郛》初为百卷，编者为陶宗仪（约1320—约1403年），其卒在焦周、顾起元、徐应秋出生之前，显然他不可能是作伪者。明末陶珽（1575—约1639年）增辑《说郛》为百二十卷，焦、顾、徐三书皆得为其所见，故伪作《酒小史》必为其人。这也正是《酒小史》见于百二十卷本而不见于百卷本的原因。陶珽为何要伪作《酒小史》？因为陶宗仪编《说郛》久佚，而杨维桢序有“陶九成取经、史、传记，下迨百氏杂说之书二千余家之说”^⑩，故不得不广采博收，甚至伪作以符其数。有学者早已指出：陶珽增辑的百二十卷本“明人之书或伪本窜入者有之；一书而分立数目者亦有之；甚或杜撰名，诡标撰人，无其不有”^[24]，《酒小史》不过是又一个例证而已。陶珽为何要伪托于宋伯仁名下？因其于同卷刚刚自林洪《山家清事》析出《新丰酒法》独立成书，可能由此了解到宋伯仁与林洪是好友，则其好酒、写酒当然不让人生疑。同时，宋氏也是较为著名的画家，完全伪托于籍籍无名之辈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正因为是伪作，所以该书篇幅较小且仅记酒名、产地，这当然是成本最低的作伪手法。

注释:

- ① 如袁翰青《酿酒在我国的起源和发展》(《中国化学史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第94页),祝慈寿《中国古代工业史》(上海:学林出版社,1988年,第623页),洪光住编著《中国酿酒科技发展史》(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年,第189页),徐海荣主编《中国酒事大典》(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93页),杨印民《帝国尚饮:元代酒业与社会》(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01-202页),徐兴海、胡付照《中国饮食思想史》(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80页),王赛时《中国酒史》(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8年,第424页)等。
- ② 如姚伟钧、刘朴兵、鞠明库《中国饮食典籍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88页),李劲松、赵翰生《黔桂衣食传统技艺研究与传承》(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第207页)。
- ③ 如朱仲岳《馆藏宋刊〈梅花喜神谱〉及诸版本》(《上海博物馆集刊》第7期,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第326页),徐建融、徐书城主编《中国美术史(宋代卷)》(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第202页),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42页),顾志兴《南宋临安典籍文化》(杭州:杭州出版社,2008年,第39页),王世襄《中国画论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115页),邵晓峰《中华图像文化史(宋代卷)》(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16年,第350页),张曼华《中国画论史》(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8年,第257页)。
- ④ 如张哲永、陈金林、顾炳权主编《中国茶酒辞典》(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第547页),王进玉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丛书(化学与化工卷)》(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646页注④)。
- ⑤ 张东华《格致与花鸟画:以南宋宋伯仁〈梅花喜神谱〉为例》(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5年,第301页)。按:张书认为宋伯仁是主动“辞官”,非是。
- ⑥ 费信《星槎胜览》卷1,李枏辑《历代小史》卷102(《影印元明善本丛书·景明刻本历代小史》第31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叶三b)。按:《星槎胜览》有初刊两卷本及四卷修订本两个版本,此见于修订本中,成书时间更晚。
- ⑦ 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49(明万历间刻本,叶一六a)、《凤洲笔记》卷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1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本,第536页)均作“刺麻酒”,“刺”恐为手民误植。四库本《弇州四部稿》卷49即作“刺麻酒”(《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27页)。
- ⑧ 顾起元撰,谭棣华、陈家禾点校《客座赘语》卷9(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04-305页)。按:原文标点作“庆历间,士大夫家间有开局造酒者……”,则诸酒悉成宋酒矣。
- ⑨ 徐应秋《骈字馀论》卷19(《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0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影印本,第134-137页)。按:《酒小史》为产地在前、酒名在后。又,田艺蘅《留青日札》卷24《酒名》亦多记包括宋酒在内的历代名酒,但该书语脉混乱、文意不畅,当不为作伪者参据。
- ⑩ 杨维桢《说郛叙》,(明)陶宗仪等编《说郛三种》百二十卷本卷首,第1页。按:杨氏本谓“千余家”(《说郛三种》百卷本卷首,第2页),陶琨所见为讹本。

参考文献:

- [1] 陶宗仪.等.说郛三种[M].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 [2] 陈思.两宋名贤小集[M]//纪昀,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664.
- [3] 徐光溥.自号录[M]//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第3309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20.
- [4] 永瑤,等.四库全书总目[M].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65:1405.
- [5] 宋伯仁.梅花喜神谱[M].刻本.金华双桂堂,1261(宋景定二年).
- [6] 程杰.中国梅花审美文化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8:471.
- [7] 张东华.格致与花鸟画:以南宋宋伯仁〈梅花喜神谱〉为例[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5:21-22.
- [8] 宋伯仁.雪岩吟草[M].景宋钞本.毛氏汲古阁,清:1a.
- [9] 陶元藻.全浙诗话[M].蒋寅,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421.

- [10] 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13112.
- [11] 佚名.宋季三朝政要[M].王瑞来,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7:214.
- [12] 韩丛耀.图像论[M].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17:416-428.
- [13] 周达观.真腊风土记校注[M].夏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158.
- [14] 王杨红.《星槎胜览》的版本、刊行及价值[M]//徐祖远.国家航海:第10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47-149.
- [15] 赵令畴.侯靖录[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207.
- [16] 焦周.焦氏说楮[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13册.影印本.济南:齐鲁书社,1995.
- [17] 顾起元.客座赘语[M].谭棣华,陈家禾,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304-305.
- [18] 洪迈.夷坚志:丙志[M].何卓,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414.
- [19] 陈循,等.(景泰)寰宇通志[M]//郑振铎,辑.玄览堂丛书续集:第53册.影印本.台北:中央图书馆,1947:5a.
- [20] 陈克昌.麻姑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04册.影印本.济南:齐鲁书社,1995:123.
- [21] 李华瑞.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5:47.
- [22] 桂萼.修省十二事疏[M]//陈子龙,等辑.明经世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1841.
- [23] 顾起元.说略[M]//纪昀,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6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786-788.
- [24] 朱仲岳.馆藏《说郛》的两种版本[M]//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集刊:第5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75.

作者简介: 邱志诚, 历史学博士,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瓯江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宋史、农学史、文献学。

收稿日期: 2022-03-04

本文责编: 李芳

(上接第71页)

- [2] The World Through Picture Books(Expanded 2nd edition,2015)[EB/OL].[2022-04-02].<https://repository.ifla.org/handle/123456789/656>.
- [3] 黄苑,张丽,汪聪.香港地区公共图书馆低幼儿童阅读推广实践及启示[J].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21(3):22-27.
- [4] 顾苇苇.基于儿童心理特征的绘本阅读推广实践模式探索:以青浦区图书馆为例[J].河南图书馆学刊,2021(8):26-28.
- [5] 郭春燕.公共图书馆儿童阅读推广模式的探索:以深圳市宝安区图书馆为例[J].科技视界,2018(18):12-15.
- [6] 张颖君,刘青.德国公共图书馆童书荐读服务的实践经验与启示[J].新世纪图书馆,2021(7):88-92.
- [7] 武娇.美国公共图书馆1000BooksB4K早期阅读推广项目[J].图书馆论坛,2021(5):152-159.
- [8] 朱雅芬.绘本阅读让低年级孩子爱上图书馆[C]//李君.大数据环境下公共图书馆服务深化思考与探索.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9:80-85.
- [9] 文海.公共图书馆与儿童阅读推广[J].卷宗,2021(7):195.
- [10] 郭婷婷.让绘本开启阅读人生:公共图书馆绘本阅读服务的实施策略探究[J].西域图书馆论坛,2015(4):30-35.

作者简介: 舒睿, 上海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研究方向为图书馆阅读推广。

收稿日期: 2022-05-18

本文责编: 李芳

· 文献学研究 ·

鲍廷博迁居桐乡新证

夏春锦 沈思佳

(桐乡市图书馆 浙江桐乡 314500)

摘要:清代著名藏书家鲍廷博曾寓居杭州,后迁居桐乡。学界普遍认为鲍氏迁桐的时间为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但根据新见的清嘉庆年间初修的《青溪严氏家谱》中鲍氏的序言和嘉道年间宋咸熙所辑《桐溪诗述》中的相关史料可知,鲍廷博在定居桐乡乌镇杨树浜之前,早于乾隆三十一至三十二年(1766—1767年)之间就在桐乡县西北运河边的冶塘一带暂住。鲍氏在冶塘有绣溪寓舍,并在此藏书、校书。在寓居冶塘期间,以鲍廷博为主的藏书家群体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的交际网络,是清代乾嘉时期私家藏书与刻书繁荣风貌的重要剪影。

关键词: 鲍廷博;《青溪严氏家谱》;《桐溪诗述》;冶塘

中图分类号: G256

文献标识码: A

New Evidence of Bao Tingbo Moving to Tongxiang

Abstract Bao Tingbo, a famous book collector in the Qing Dynasty, once lived in Hangzhou and later moved to Tongxiang.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that Bao moved to Tongxiang in the 49th year of Qianlong's reign (1784).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newly discovered preface of Bao in the *Qingxi Yan Family Tree*, which was first revised in Jiaqing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lev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the *Tongxi poetry* compiled by Song Xianxi during the period from Jiaqing to Daoguang of the Qing Dynasty, it can be seen that before Bao Tingbo settled in Yangshubang, Wuzhen, Tongxiang, As early as the thirty first to thirty second years of Qianlong's reign (1766-1767), he lived temporarily in Yetang area near the northwest canal of Tongxiang County. Bao has xiuxi apartment in Yetang, where he collects and proofreads books. During the period of living in Yetang, a benign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network was formed among the book collectors, mainly Bao Tingbo, which was an important silhouette of the prosperity of private collection and engraving during the period from Qianlong to Jiaqing in the Qing Dynasty.

Key words Bao Tingbo; *Qingxi Yan Family Tree*; *Tongxi poetry*; Yetang

关于清乾嘉时期著名藏书家鲍廷博从杭州迁居桐乡的时间,历来说法不一,刘尚恒^[1]、周生杰^[2]两位先生都有专文加以论述。学界普遍认为鲍廷博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迁居桐乡,所据为清代赵学敏所作“知不足斋丛书”序言之夹注“先生甲辰岁移家樵李”^[3]。周生杰、杨瑞所著的《鲍廷博评传》^[4]和刘尚恒所著的《鲍廷博年谱长编》^{[5]146-167}都沿用了此说。但鲍氏具体何时迁居桐乡,笔者新近发现了相关史料中的不同说法,现将爬梳整理的资料著录加以辨析,以供学界进一步探讨。

1 鲍氏序《青溪严氏家谱》

《青溪严氏家谱》原名《严氏家谱》,共十卷,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刻本,现藏于上海图书馆,桐乡市图书馆藏有复印本。此谱由桐乡乌镇的严辰在其从伯祖严师曾留传的钞本基础上续修而成。

严师曾(1750—?),字省吾,号鲁斋,于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初修此谱,严氏曾延请已寓居乌镇杨树浜(又称杨树湾、杨树滨)多年的鲍廷博为之作序,

鲍氏欣然命笔，并于嘉庆十七年（1812年）孟夏完成为《青溪严氏家谱》所作序言。因该序为新发现的佚文，故将全文著录如下：

氏族之有谱，由来尚已。自宋眉山苏氏之谱出，而谱系始详备。盖将以明亲疏远近，辨尊卑，分长幼，后嗣子孙阅是谱者，咸有水源木本之思焉。严君鲁斋，汉子陵先生之裔胄，明季忆椿公由武林迁居乌戍，迄今二百余年。宗族日盛，寔昌寔炽，窃谓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其支分派别，一脉相延。使按图瞭如指掌，当自叙昭穆始，鲁斋如法详辑之，以示予。予乔寓兹十一有年，素仰家风之美，登其堂，尊卑长幼秩如也。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世泽之长，其来有自。余既深服鲁斋孝友之敦，而又庆其宗支之繁衍也，遂为弁言如次。若夫墓祭之说，礼无明文，惟《周礼》有墓大夫一官，夫墓者，慕也。原以启后人思慕之心，其与谱，有相为维系者，本俗六之。聊兄弟即次于坟墓之后，非此义欤？鲁斋因辑宗谱而并绘之，尤足见教孝之深意。至其渊源世系之长，姚君镜塘已备志之，兹不赘述。嘉庆十七年（1812）孟夏歙西通介老人鲍廷博谨记序，时年八十有五^[6]。

鲍廷博在序言中表达了对严氏“家风之美”的仰慕和赞美之情，此为鲍氏在桐乡文化界颇有声望的又一实证。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序中提及“予乔寓兹十一有年”，按落款时间“嘉庆十七年（1812年）”推算，则鲍氏寓居乌镇的时间应当为嘉庆七年（1802年）。这一说法虽由鲍廷博自述，但笔者对此持有不同见解。现已有多种确凿的史料表明，鲍廷博早在乾隆五十年（1785年）前后就已寓居桐乡。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夏，吴騫乘舟从海宁小桐溪往乌青镇访鲍廷博，留下诗作《夏夕，从小桐溪泛舟径硖石至乌青访渌饮道中即事二首》。乾隆五十年（1785年）三月，吴騫又作有《小寒食同兰坻乌青泛舟即事三首》。由此可见，迁居乌镇后的鲍廷博与嘉兴地区师友的来往因为地理距离的拉近变得愈加紧密。

乾隆五十年（1785年）正月十九日，鲍廷博在康熙刻本《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的题识中即署“青镇寓庐校”，这是目前文献可考的鲍氏以“青镇”落款的最早题识。另有数条题跋中反复出现“校于乌镇寓馆”“校于青镇寓舍”“青堆寓舍”等字样。“青镇”“乌镇”“青堆”，皆为今桐乡乌镇辖区。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三月，萧山汪辉祖入

京谒选，舟抵湖州后“迂道乌镇别以文，同至吴门”^{[5]153}。汪辉祖是鲍廷博在杭州时相交多年的老友，此次北上，专程绕道乌镇道别，可见迁居桐乡的鲍氏，地理距离的变远并未使其疏远在杭的老友。对此，汪辉祖不仅在后来的自传《病榻梦痕录》中记上一笔，当时还专门作了四首诗以纪事，其一云：

纤程中别绪，世味辨咸酸。

扫壁方题凤，回航恰卸帆^①。

相逢真倒极，出语总非凡。

幸许窥奥秘，临行更启函^{[5]154}。

据此诗可知，当日鲍廷博正准备放舟前往“桐乡”，此处的“桐乡”当指桐乡县城，可能是去拜访住在县城的金德舆、方薰、赵怀玉等好友。据已有史料显示，鲍氏寓桐期间，与其一众好友过从甚密，常常“晨夕相处，日以校勘经史为事”^[7]。

一以言之，关于鲍氏序《青溪严氏家谱》中提及的“予乔寓兹十一有年”，笔者认为存在以下两种可能：一是家谱刊刻时出现了脱字，二是鲍廷博所说的“兹”特指乌镇杨树浜。而后一种的可能性更大。

2 鲍氏与《桐溪诗述》

清嘉道年间担任桐乡教谕一职的宋咸熙^②辑有《桐溪诗述》二十四卷，其中收录了不少鲍廷博的相关资料，如第二十一卷中收录鲍廷博的小传和诗作四题，小传中谈及其“寓居青镇之杨树滨垂四十年”^{[8]1710}，此为新近发现的关于鲍廷博寓桐时间的又一说法。

按此说法，以鲍廷博的卒年（嘉庆十九年，1814年）往前推算，则鲍氏移居桐乡乌镇杨树浜的时间约在乾隆四十年（1775年）前后。这个时间比“甲辰岁”（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约早了八至九年。

在《桐溪诗述》凡例中，宋咸熙谈及自己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出任桐乡教谕一职后，在鲍廷博和顾修的怂恿下于次年（1815年）开始着手编撰此书，并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编成，前后历时四年时间。遗憾的是在编修《桐溪诗述》期间，鲍廷博与顾修先后谢世，“书成而二先生已不及见矣”^{[8]802}。值得一提的是，宋咸熙不仅在《凡例》中对鲍、顾二人的提议表示了感谢，书前的“校订搜辑各姓氏”中也在第二和第三的位置写上了两人的姓名爵里（首位是潘

奕隼)。

由此可知,宋咸熙与鲍廷博是关系甚密的忘年交,以嘉庆三年(1798年)鲍廷博就将宋咸熙之父宋大樽的《茗香诗论》刻入“知不足斋丛书”第二十集来看,他们的相识应在宋咸熙任职桐乡教谕之前,所以其说法是较为可信的。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笔者在翻阅《桐溪诗述》第十三卷时,发现陈沅所作的《冶塘棹歌》中有一首诗直接提及了鲍廷博,该诗云:

水阁松亭分外清,客舟到处酒旗迎。

醉中绿饮题佳句,占断溪山风月情。

诗后有注:“水阁,浜名;松亭,村名。新安鲍以文号绿饮,曾寓冶塘,《咏酒旗》云:‘招邀风月归花县,点染溪山入画屏。’”^{[8]1357}由此可知,鲍廷博在定居乌镇杨树浜之前,曾寓居在离杨树浜不远的冶塘这个地方。这为上文根据《青溪严氏家谱》序中所推测的鲍氏乔寓杨树浜“十一有年”提供了佐证。

《冶塘棹歌》又称《柞溪棹歌》,在宋咸熙《桐溪诗述》所引第一首诗的尾注中解释道:“柞溪居民治釜为业,故名冶塘,又名炉溪。”^{[8]1353}可知在这一带,柞溪和冶塘是可以相互通称的。此地如今位于桐乡市区东北面的金牛塘两侧,南临京杭大运河,水运交通便利。昔时当地遍长柞树,故名柞溪。明朝时有沈氏自吴兴竹墩村迁居至此,开设冶坊,后产业壮大,“除在近地设店销售外,还在松江、嘉善、平湖、嘉兴、硖石、湖州等地各大杂货店挂牌经营沈氏冶坊铁器。其时镇之两端,炉火熊熊,昼夜不绝。地名亦因之渐称炉头”^{[8]168}。清时此地分属清风乡和永新乡,鲍氏家族“以冶坊为世业”^[9],早年因生意上的联系,或许早就到过此地。民国间此地为皂林乡、杨园乡,新中国成立后属炉头人民公社,1983年改炉头乡,1985年改乡为镇,后又再设为龙翔街道,今已划归乌镇镇管辖。

3 鲍氏寓居冶塘的时间和位置

首先,关于鲍氏寓居冶塘的具体时间,据傅增湘云鲍廷博曾手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二十卷,该书“每卷后有淳典堂、芦浦寓庐、知不足斋、绣溪寓舍等志,均在乾隆丙戌、丁亥间(三十一至三十二年,1766—1767年),皆绿饮(亲)笔也”^{[5]69}。这是目前可见的鲍廷博最早以“绣溪寓舍”落款的题跋。此后数年间,出现次数更多,以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至

三十六年(1771年)为例: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1769年)五月,借振绮堂所藏元林景熙《霁山先生集》五卷,用以自校已藏的汪士鋐刻本。据张扬云:“此文四卷,始校于乾隆己丑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始毕,日尽一卷,有‘绣溪寓庐记’二行。”^{[5]72}

同年七月,传抄并校正振绮堂本宋刘安上《刘给事文集》五卷《附录》一卷,鲍廷博连续作有题跋:

“乾隆己丑七月,传钱塘汪氏振绮堂本,二十六日完。知不足斋识。”“乾隆己丑十二月朔,绣溪寓舍。”(卷一末)“己丑十二月朔,午后校于绣溪寓舍。”(卷二末)“己丑十二月初二日,晨起校于绣溪寓舍。”(卷三末)“乾隆己丑十二月已刻,校于绣溪寓舍。”(卷四末)“乾隆己丑十二月初二日,校于绣溪寓舍,已刻毕。”(卷五末)^{[5]73}

十二月,抄校宋孙复《孙明复小集》一卷《附录》一卷:“乾隆己丑十二月初五日,校于绣溪寓庐。”(见诗后)^{[5]74}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仅见一处提及,即十一月二十七日“补录”清叶奕苞稿本《金石录补》跋文“于绣溪旅舍”。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七月至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五月,在鲍廷博校读的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上,留下了数十处题识,其中有“绣溪”字样的就达十四处之多。

从以上鲍氏的落款可知,在乾隆三十一至三十二年(1766—1767年)之间,鲍廷博经常居住在“绣溪”寓所,尤其是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十二月初,一连住了五天。

其次,关于“绣溪”的具体位置,《桐溪诗述》卷十五收录方驾所作诗《桐川四时棹歌》四十首,其一云:

黄花开遍秀溪湾,森森凉波浸白鸥。

佳节又逢重九日,沈壶携酒上东山。

诗后有尾注:“秀溪在县西北。”^{[8]1441}笔者查考相关地方志得知,秀溪又作绣溪,是金牛塘的别称,其区域与上文所说的冶塘大体重叠。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溪上建有绣溪桥,几经兴废,至今沿用此名的是一座大型钢筋混凝土桥梁,名作秀溪桥。据民国《乌青镇志》记载,“秀(禾郡吴《志》:‘一作绣’)溪桥,又名三里桥,在皂林塘口。”^[10]因是明朝抗倭将

领宗礼的殉难处,明末清初名士周拱辰尝作《绣溪桥吊宗将军赋并序》。稍后的诗人汪绍昌又作有《绣溪桥吊宗将军诗》,其中有“岂料中丞专阃外,何堪猛士死桥边”之句。

再次,鲍廷博寓居冶塘绣溪寓舍期间,不仅勤于校书,并与周围的书友交往甚密。如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五月初十,“桐乡方兰如(薰)、金云章(德舆)二君过寓,观唐摹《十七帖》,并借去文丞相(天祥)遗墨一卷以去”;“十二日……大雨,欲往桐乡回(访)方(薰)、金(德舆)二君不果。”^{[5]80}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二月十五日,鲍廷博冒雨前往海宁送别即将去徽州休宁的吴騫。吴騫说“淶饮自绣溪至,即移舟来送”^{[5]92},可知那时鲍廷博也是住在冶塘的。

吴騫有感于好友的真情厚意,还作了一首《雨渡钱江却淶饮》诗,以记其事。

综上所述,鲍廷博在定居桐乡乌镇杨树浜之前,早在乾隆三十一至三十二年(1766—1767年)之间就已经开始在桐乡县城西北运河边的冶塘一带暂住。鲍氏在冶塘不仅拥有自己的住所“绣溪”寓舍,还在此贮藏了一定数量的藏书。在寓居冶塘期间,鲍氏勤于校勘,并与附近的师友时相往还,加深了与桐乡、嘉兴一带藏书家之间的交往和交流。毋庸置疑的是,在清代乾嘉时期藏书与刻书异常兴盛的环境下,以鲍廷博为主的藏书家群体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的交际网络,促进了桐乡、嘉兴、杭州等地乃至全国的私家藏书与刻书风貌的繁荣。

注释:

- ① 原注:余到门时,淶饮先生之桐乡,正欲解维而淶饮还舟。
- ② 宋咸熙(1766—1834年),字德恢,又字小茗,浙江仁和(今浙江杭州)人。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举人,官桐乡教谕。好藏书,建有思茗斋。曾参与阮元主持的《经籍纂诂》编修工作,著有《惜阴日记》《耐冷谭》《思茗斋集》,辑有《古易音训》《桐溪诗述》等。

参考文献:

- [1] 刘尚恒.鲍廷博由杭州迁桐乡时间考述[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0(1):6-7.
- [2] 周生杰.鲍廷博迁居桐乡考:兼补证刘尚恒先生“鲍廷博由杭州迁桐乡时间考述”[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2(4):75-77.
- [3] 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5-7.
- [4] 周生杰,杨瑞.鲍廷博评传[M].江苏:凤凰出版社,2014:26-27.
- [5] 刘尚恒.鲍廷博年谱长编[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
- [6] 严辰.青溪严氏家谱十卷[M].刻本.1892(清光绪十八年).
- [7] 赵怀玉.亦有生斋集[M].刻本.1796—1850(清嘉庆至道光).
- [8] 宋咸熙.宋咸熙集[M].杨叶,校点.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
- [9] 钱泳.履园丛话:上册[M].孟裴,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13.
- [10] 董世宁,卢学溥.乌镇志[M].桐乡市档案馆(中共桐乡市委史志研究室),整理.北京:方志出版社,2021:197.

作者简介: 夏春锦,桐乡市图书馆工作人员、浙江外国语学院浙江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特聘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藏书文化和现代文学史料学;沈思佳,硕士,桐乡市图书馆助理馆员,研究方向为古籍整理与保护。

收稿日期: 2022-06-09

本文责编: 孙晓清